

浙江大学

博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 裨治文与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作者姓名 张施娟

指导教师 龚缨晏教授 包伟民教授

学 科 中国古代史

所在学院 人文学院

提交日期 二〇〇四年二月

提 要

本文主要研究第一位来华美国新教传教士裨治文和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正文分上、下编，共六章。上编有三章，研究裨治文在中国的生活；下编有三章，论述有关《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各种问题。

在第一章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裨治文的生平，特别是在中国的活动。第一节介绍了裨治文的早年生活以及来华经过。另外四节则分别研究了他在中国的一系列活动，包括他所创办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和他发起组织的“中国益智会”、“马礼逊教育会”、“中国医药传道会”等，以此来说明裨治文在出版和组织方面的非凡能力，同时说明了裨治文和其他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医务等方面的贡献。

如果说第一章的内容着重的是，裨治文在中美文化交流方面的活动和作用的话，那么，第二、三章的内容主要关注裨治文在中美外交舞台上的活动。在第二章，笔者以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言论为基础，阐述他极力反对鸦片贸易，同时支持英国以武力“开放”中国的矛盾心理。这部分还着重分析了裨治文在签订《望厦条约》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章的内容主要讲述裨治文来到上海后的晚年生活。作者以裨治文造访天京的活动为中心，展现裨治文等传教士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变化的变化。欧美社会从欢迎和支持太平天国，转变为冷漠甚至反对的态度，可以说是裨治文等西方人士实地考察太平军辖区的结果。在裨治文晚年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则是翻译中文《圣经》，它对后来的中国基督教事业有过一定的影响。

笔者在下编较详细地介绍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背景、内容和影响等内容。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到底是怎样一本书呢？裨治文为何撰写此书？……本文在第四、五章详细回答了这些问题。在第四章，笔者从裨治文的写作动机着手，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版本的流变、协助写作之华人、出版机构等一一进行研究。裨治文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人在“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支配下，对美国认识不清，所以撰写了这部著作，目的是要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笔者在该章还分析了目前学界对此书版本认识混乱的原因，对裨著的各个版本作了考订。

第五章试图梳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全书的内容、写作特色和翻译上的一些失误。笔者认为，裨治文为了向中国读者展现美国并非蛮夷之邦，而是可以与中国媲美的文明国家，所以他在著作中极力展现美国社会高度文明的方方面面。正因为如此，裨治文在书中回避和淡化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黑奴问题。另外，裨治文在描述过程中，为了能使中国读者理解美国社会，在行文上表现出强烈的“中国化”。这种“中国化”的写作手法，一方面便于中国人理解闻所未闻的异邦，另一方面也使中国人产生了一些误解。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呢？笔者根据自己在众多十九世纪中文著述中所找到的一些新资料，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述。人们已经注意到，裨治文的著作对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合省国说》、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书有很大影响，而笔者则发现，除此之外，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还有少数中国知识分子受到裨治文的影响，如吕调阳、李慎儒、斌椿、志刚、

傅云龙等人。此外，裨治文所翻译的一些中文词汇，在现代汉语中留下了一些痕迹，所以裨著也是现代学者溯源近现代汉语新词的重要参考资料。

不过，本文在结论部分强调指出，由于盲目的白人和文化优越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热情，因此，裨治文的著作仅对少数知识分子起了较大作用，而对大多数中国人并无太大影响。笔者不想因为研究这部著作而夸大它的影响。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ists of two sections; one is “The Life and Labors of Bridgman in China”, the other is “The Study of Bridgman’s *Meilige heshengguo zhilue*(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ingapore, 1838)”.

In the first section, the author describes Bridgman’s effort to alter Chines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for further Western missionary and commercial interests in the Middle Kingdom. First, the author points out Bridgman’s achievement in the culture of Sino-western through *the Chinese Repositor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etc. Then, the author spells out Bridgman as diplomat and as Bible translator during and after the Opium War. Bridgman’s revision of the Scriptures is introduced in the last chapter.

In the second section, the author studies Bridgman’s *Meilige heshengguo zhilue*. First, the author analyzes why and how Bridgman writes *Meilige heshengguo zhilue*.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t edition. Then, the author generalizes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 of Bridgman’s writing. At last, the author shows reader how important is Bridgman’s *Meilige heshengguo zhilue*.

In the end of the paper, the author conveys her meaning that the importance of Bridgman’s writing is limited.

目 录

导 言.....	1
一	1
二	9
上编 裨治文在中国	13
第一章 裨治文在华早期活动	13
第一节 裨治文来华	13
第二节 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18
第三节 裨治文与“马礼逊教育协会”	23
第四节 裨治文与“益智会”	27
第五节 裨治文与“中国医药传道会”	29
第二章 裨治文在鸦片战争中的活动	32
第一节 对鸦片贸易的批判	32
第二节 支持林则徐禁烟运动.....	34
第三节 对鸦片战争的态度	36
第四节 参与中美《望厦条约》之签订	38
第三章 裨治文的晚年.....	44
第一节 裨治文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活动.....	44
第二节 裨治文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的活动.....	48
第三节 翻译中文《圣经》	49
下编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研究.....	52
第四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写作与出版.....	52
第一节 第一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52
1、缘起.....	52
2、出版机构.....	54
3、版本.....	55
第二节 第二版《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	57
第三节 第三版《大美联邦志略》	58
1、《大美联邦志略》的版本.....	58
2、《大美联邦志略》的内容、文辞等方面的变化.....	59
3、修订《大美联邦志略》的华人助手.....	64
4、出版机构.....	65
第四节 《小方壶斋輿地丛抄》中辑录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66

第五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内容和特色.....	68
第一节 内容.....	68
1、对美国史地的介绍.....	68
2、对美国社会制度的介绍.....	72
3、对文化教育方面的介绍.....	74
4、对印第安人的介绍.....	76
第二节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语言翻译上的特色.....	78
1、裨治文的翻译技巧.....	78
2、翻译的偏差.....	80
第六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传播与影响.....	84
第一节 对中国世界地理著作的影响.....	84
1、《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海国图说》.....	84
2、《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海图四说》.....	87
3、《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瀛寰志略》.....	91
4、对其他人的影响.....	94
第二节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近现代汉语形成的作用.....	99
第三节 对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影响.....	103
结论.....	106
表 1 《中国丛报》刊登文章分类.....	20
表 2 《大美联邦志略》上卷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下篇对照表.....	60
表 3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20 州译名对照表.....	68
表 4 《海国图志》百卷本引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情况.....	85
表 5 《合省国说》引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情况.....	88
表 6 吕调阳注释的《海录》引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情况.....	95
附录:	
参考文献	
相关图片	
刘路生点校本勘误表	

导 言

—

本文研究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和他的中文著作《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提出论题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近代以前中国人认识美国的历史过程。

“美国”是我们今天对“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简称。其实在中国认识美国的漫长岁月中，中国人对美国的称呼有很多，单单在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中，就出现了米利坚、弥利坚、美利哥、亚墨理驾合众国、兼掇邦国、联邦国、育奈士迭等各种称呼。^①从这么多的称呼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了解美国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和曲折。本文认为迄至19世纪末，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16世纪起至“中国皇后号”来华之前。相对欧亚大陆的文明古国而言，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到1492年，才有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发现美洲。此后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纷纷来到这块新大陆，英国在1497年就到达北美。但对中国人来说，认识美洲则是比较晚的事情。

最早把美洲介绍给中国人的是1582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他在1602年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对南北美洲作如下介绍：

……若亚墨利加者，全为四海所围，南北以微地相联，……南北亚墨利加并墨瓦蜡泥加，自古无人知有此处，惟一百多年前，欧逻巴人乘船至其海之地方知。然其地广阔而人蛮滑，迄今未详审地内各国人俗。

在利玛窦地图中，还出现了许多新地名，如：北亚墨利加、新拂郎察、新以西把你亚、加拿大国、小以西把你亚、古巴岛、可尔得勒亚尔地、亚伯尔耕国、大入尔国、墨是可等等。

从一些地名上可以看出，当时涉足北美的欧洲殖民国家主要是法兰西和西班牙。比如，新拂郎察，即新法兰西，指此区域为法兰西所有；新以西把你亚，即新西班牙，则指这地方为西班牙所有。

利玛窦地图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北美地理，从此中国人知道地球上有了北美洲，汉文中有了“加拿大”、“古巴”、“牙买加”等美洲地名，这些地名沿用至今。

虽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但在利玛窦等人来华时，他们本身对北美也知之甚少。利玛窦等人知道“墨是可”国，“地产各色鸟羽，人辑以为画，山水人物皆妙”，也知道“夜义国”的居民（对照地图应指现在格陵兰岛上的爱斯基摩人，笔者注）“穴居，皮服，不知骑”。但是毕竟北美尚未完全开发，许多地方还“未有人至，故未审其人物如何”。^②而且《坤舆万国全图》没有点明哥伦布。

最早明确提到哥伦布的是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o Aleni)在1623年撰写的《职方外纪》。

^① 徐继畲《瀛寰志略》，页273。

^② 以上均采自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注文。

《职方外纪》介绍了哥伦布（书中称为“阁龙”）发现美洲（书中称“亚墨利加”）的情况，作者写道：

初，西土仅知有亚细亚、欧逻巴、利未亚三大洲……至百年前，西国有一大臣名阁龙者……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气味，忽有省悟。谓此非海水之气，乃土地之气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国土矣……阁龙遂率众出海，辗转数月，茫茫无所得……阁龙志意坚决，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船上望楼中人大声言：“有地矣！”众共欢喜，欲谢天主，亟取道前行，果得一地……

《职方外纪》共五卷，其中卷四专述“南北亚魔力机和墨瓦蜡泥加”。与利玛窦地图不同的是，《职方外纪》还介绍了新大陆命名的原因。书中写道：

亚墨利哥（指亚美利哥·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者，至欧逻巴西南海，寻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亚墨利加。

利玛窦、艾儒略等人的著作向中国人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是除了个别人士对此作出过一定的吸收外，大多数人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作为正史的《明史·意大利亚传》就称利玛窦的《坤輿万国全图》“其说荒渺莫考”。^①《清朝文献通考》甚至不承认美洲的存在，贬斥西方传教士宣传的“五大洲”说是“语涉诞狂”，“盖延战国裨海之说”。^②

虽然中国人对耶稣会士所介绍的包括北美洲在内的地理知识持怀疑或否定态度，少数接触过这类新知识的人对美洲或忽视，^③或弄错，^④但在18世纪，还是有一个中国人到过美洲，并留下可信的记载，他就是随耶稣会士艾若瑟（Jos. Ant. Provana）去罗马教廷的樊守义。^⑤

1707年，樊守义等人从澳门出发，绕过好望角，因舟中乏水，曾经到过亚墨里加洲巴以亚府（今巴西萨尔瓦多城）。樊守义回国后，在其追忆写成的《身见录》中描绘了他对巴以亚府的认识。

樊守义是第一个有史可查到过美洲的中国人，《身见录》则是第一篇中国人的美洲游记。^⑥遗憾的是，樊守义仅至南美，并没有提及北美。

第二阶段：从1784年起，止于19世纪中期或1840年鸦片战争前。

中国人真正开始认识北美是在美国建国以后。

1783年，英美签订凡尔赛和约，美国独立。美国建立后就十分重视发展对华贸易。1784年就有“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首航广州，12月27日驶离，次年5月10日返抵纽约。^⑦此后，跟随“中国皇后号”纷至沓来的美国商船，在整个18世纪，共有118艘之多。^⑧

18世纪的美国人在中国沿海的活动不引人注目，但是进入19世纪，随着来华美国船只的增多，美国人在中国沿海的表现越来越活跃，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英美两国之间因为在广州的矛盾和斗争也开始尖锐起来，多次发生军事冲突，互相掎

^① 《明史》卷326，《外国传·意大利亚传》。

^② 《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六》。

^③ 雍正年间陈伦炯所著《海国闻见录》即是如此。《海国闻见录》是当时中国人对外国情况了解和介绍较多的一部著名的书。从陈伦炯的自序看，此书依据有二，一是与其父亲“出入东西洋”等地所耳闻目见之知识；二是对相关书籍图文的阅读查询。但是该书上册虽有《大西洋记》，但对大西洋沿岸的美洲，却一无所记；下卷地图六幅，虽有《四海总图》，但也不见美洲所占之西半球。

^④ 乾隆时期名士杨复古在《海国闻见录》跋中，把加里曼丹岛和菲律宾群岛的班乃岛、宿务岛等地当作南北美洲。

^⑤ 樊守义（1682-1753年），亦作守利、守和、诗义，字利如，山西绛州（今新绛县）人。

^⑥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页43。

^⑦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页9-11。

^⑧ 汪熙、邹明德《鸦片战争前德中美贸易》，页95。

获商船的事情时有发生。^①1814年英美船只甚至角逐到黄埔江面，因此中国政府曾不得不受理英美两国在中国境内冲突的案件。

另一方面，美国船只在中国沿海也有多次与中国接触之行为。美国在30年代就多次派遣船队到达中国。其中主要有，1832年巡洋舰“泼托马克号”（Potomac）来广州访问，当时中国当局命令美国领事“勒令该船开帆驶回本国”；^②1832年11月，美国派遣的埃德蒙·罗伯兹（Edmund Roberts）远征队曾在广州靠岸；^③四年后，罗伯兹乘“孔雀号”又到澳门靠岸。^④期间，还有1821年（道光元年）发生的“德兰诺瓦事件”，使中国当局与美国商人直接发生联系。^⑤“德兰诺瓦事件”使中美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出现了仅有的中断。

那么，在上述背景下，中国人对美国了解多少呢？

“中国皇后号”来华，事实上使广州的中国人开始与美国人接触。在相貌、衣服、语言上都和英国人相仿的新来的美国人初到广州时，除了个别有经验的行商，经过打交道，才会识别并称呼美国人为“新国民”，其他人对美国还是不清不楚。

“中国皇后号”管货员山茂召（Shaw Samuel）在其日记中记载了中国人被告知英美乃是两个不同国家之后，对这些远道而来的“新人”既友好又好奇的情形：

你不是英国人吧？”

不是。

但是你讲英文，所以当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说不出什么区别；但是现在我很明白了。在我跟英国人讲价钱的时候，他说：这么多——买吧，算了吧。我告诉他说：“不，朋友，我给你这么多。”他看着我：“滚开，瘪三；怎么！你到这儿来，给我的货定价钱吗？”的确，大班先生，我看得很清楚，你不会是英国人。所有中国人都很喜欢你们的国家。

至此为止，山茂召写道，我敢说这个人的评语是使我满意的。可是为公道计，我还不得不加上他的结语，“人们初来中国时，都是非常好的君子，都像你一样。我想你多来广州两三趟，你也变得跟英国人一模一样了。”^⑥

至1795年，美国人到广州十年了，而美国人的广州贸易在1790年就已“站稳了脚跟”^⑦。中国官吏还把他們和英国人混为一谈，最终英商向两广总督提出要求说：

呵嘍哩嚙（即美国人）也会我们的话，也是我们这样衣服，另有旗号，不要和他们混到一块。

受理此事的两广总督长麟曾陪伴马嘎尔尼使团，素以通夷务著称，还算通情达理，对其请求加以改善后予以同意。他批复道：

^① 如嘉庆十五年十月，“所有英吉利船常被米利坚在夷洋拿获”。（见《粤海关志》卷二十九，页14）。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p. 9-10.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11, p.11.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228.

^⑤ 1821年，发生在黄埔美国商船“艾米利号”（Emily）服务的意大利籍水手德兰诺瓦（Terranova）的事件。德兰诺瓦丢弃或投掷一个瓦罐，碰在一只小船商的民妇的头上，致使落水而亡。中国政府要求把德兰诺瓦交出，但被拒绝，因此遂停止美商贸易。在广州官员封舱的威胁下，美国船长只得听任中国官员商船逮捕肇事水手，经过审判，处以死刑；美国政府事后也默认了中国政府的处置。

^⑥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页77。

^⑦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页14。

此条应存记备查，遇有事件，自应查明旗号办理，不致牵混影射。^①

可见，中美实际上的频繁接触，并没有让中国人知晓美国。

在中国人认识美国的第二个阶段，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群体向中国人介绍美国，那就是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

1807年，英国伦敦会^②派遣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到中国传教。一般认为，马礼逊是来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来华的1807年是新教向中国传播的开始。1812年伦敦会又派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③来到中国。米怜到达澳门后，由于受天主教势力的排挤和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反对，转到广州；数月后至马来亚，后来定居马六甲，致力于创立英华书院，还开办了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和英文刊物《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伦敦会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④和戴尔（Samuel Dyer）^⑤后来也加入了马礼逊和米怜的传教工作。

受英国伦敦会的影响，美国海外传教理事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⑥于1810年成立。美部会的权力机构叫“咨询委员会”（Prudential Committee），设在波士顿。咨询委员会由美国公理会、长老会和归正会的著名人士以及热心于传教事务者组成，一般在12人左右，每周举行一次会议。委员会的主要功能是实施美部会的规章制度，调查可能传教的区域，标明发展传教事业的地区，而后决定这些传教团的规模并监督指导他们。另外，委员会还直接任命、指示美部会的传教士。而具体操作这些功能的是咨询委员会秘书。

美部会成立不久就派人与伦敦会联系，希望与之合作，被拒绝，委员会决定开创自己的传教事业。1812年1月，美部会派遣第一批五名海外传教士到印度。^⑦之后，美部会迅速发展，到1833

^① 《粤督批英商啞嘍所禀十一事件》，许地山编《达衷集》，页169-170。啞嘍，Brown，英国洋行大班，乾隆五十七年来华经商。

^② 1795年博格（Dr. Bogue）等人成立伦敦传教会（London Missionary Board），开始把目光转向远东，宣称“惟一目的是在异教徒和其他蒙昧民族中传播基督教的知识”。伦敦传教会由英国国教会、公理会和长老会等组建而成。该会规定开展“超宗派”（non-denominational）海外传教活动为该会的基本原则。（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p.54-55）伦敦会传教士米怜曾对该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进行过一段阐述。他认为该会的旨趣不在于把它办成国教会、公理会和长老会的海外传道差会，而是要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使其不带有任何一个单独教派的特征。因此，它的事务就不是由哪一个教派的机构来决定，而是“由一个理事会来管理，该理事会的成员，每年一次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两个国教会、各个不从国教者的团体，以及该会所派出的，分别来自不同教会团体的传教士中选拔”。（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p.5-6）

^③ 米怜（1785-1822），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生于阿伯丁郡，1812年受牧师职。曾将《旧约圣经·申命记》、《旧约圣经·约伯记》译成汉文。

^④ 麦都思（1796-1857），英国伦敦会传教士。生于英国。1816年离英东渡，翌年抵达马六甲学习东方语言，协助米怜管理印刷所，1819年于该地任牧师，后去槟榔屿和爪哇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在华侨中进行传教活动，几近二十年。1835年抵广州，并时北游中国沿海地区，探悉风俗民情，散发传教书刊。鸦片战争结束后，于1843年起定居上海，开设墨海书馆。1848年违反《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越出上海县界，到青浦县散发传单，受到群众抵制而酿成“青浦教案”。1854年任英国驻华公使包令（John Bowring, 1792-1872）的译员，并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收集情报，供英国政府参考以决定对太平天国的策略。曾参加《圣经》汉译，并编写《汉英字典》和《英汉字典》等，有中、英、马来文著作九十余种。1856年回国述职，次年病逝于伦敦。其子麦华陀后任英国驻上海领事。1904年伦敦会在上海设麦伦书院（Medhurst College），以他命名，作为纪念。

^⑤ 戴尔（1804-1843），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青年时就读于剑桥大学，1827年到槟榔屿，1835年定居马六甲，管理伦敦会设在那里的印刷机构，并往来于槟榔屿、新加坡、香港、伦敦等地，从事教会活动。1843年死于澳门。有中英文著作5种。他在中文出版史上有一重要贡献，就是用中文活板铅字代替以前的木刻雕版。

^⑥ 美国海外传教理事会英文名，缩写为A.B.C.F.M.，在华称“美部会”、“公理会”、“纲纪慎会”等

^⑦ Phillips, *Protestant America and the Pagan World*, p.32-33, cited by Lazich, *ibid.*p.35.

年，它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 60 个传教站，所属传教士 100 人。^①

虽然初期伦敦会拒绝与美部会合作，但是两个组织后来还是密切联系，其中，马礼逊就起着枢纽作用。

由于英国当时存在反对海外传教士去印度和远东的思想，^②东印度公司害怕传教士的活动会损害他们与中国的贸易，^③并且对新教传教士怀有敌意，所以拒绝传教士搭乘他们的船只。因此马礼逊无法直接乘船到南洋和印度，只好取道美国去中国。

马礼逊在 1807 年 4 月 20 日到达纽约后访问了费城，并发表一系列演讲。马礼逊的演讲引起美国基督教会对外传教的关注，也赢得美国政府及美商对马礼逊传教事业的资助。美商奥立芬为马礼逊提供免费舱位到中国，而国会议员麦德逊(J. Madison)给美国驻广州领事卡灵顿(Carrington)的介绍信，要求“在美国利益许可的情况下，给予这个英国人尽可能细致的帮助”^④。

马礼逊乘美国商船到达中国后，又寄居美国商馆达一年之久，因此，有学者说：“马礼逊博士著名的传教事业中，美国人所做的贡献颇值得注意。”^⑤

马礼逊等人来华后，面临的是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清政府的禁教政策，除了政治的原因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人思想上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的“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

在中国朝野弥漫着天朝上国观念的气氛下，一部分传教士认为必须采用世俗的手段，来拯救中国人的灵魂。推广世俗知识的首要步骤就是让中国人懂得外国历史和地理，所以从 1815 年传教士所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杂志《察世俗每月统记传》^⑥起，地理知识就成为一大部分内容。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介绍的世界史地知识、民情风俗，大多语言简略，但新鲜知识不少。其中就有对美洲和美国的介绍。比如在卷六《论亚墨利加列国》一文中，作者介绍了美洲的地理，并特别表彰了哥伦布的功绩。在卷七《论北亚墨利加之列国》中，又简短、准确地介绍了美洲年轻的国家——美国。

麦都思编的《地理便童略传》^⑦对美国的形成历史和政治制度方面的特点也有所介绍。其中第八回即为“论亚墨利加”，譬如有问：

花旗国本来如何？

答曰：花旗国本来是旷野的地方，惟自初见知亚墨利加地以后多人从英吉利国往到那边，但凡在本国困苦、被害、想要出外者，连商贾等人，都往彼处。或此处几百人，那处几千人，耕田、筑城而住，成为十余小国。后来英吉利王要他们都纳关税，他们不肯，就合聚成一大国，自设朝廷，而不再于英吉利国管下。英吉利王差兵伐他，不胜，故此到如今，他自立为一国也。

^① *Missionary Herald*, vol.30,p.8. 转引自吴义雄前揭书，页 63。

^② Ride Lindsay, *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 Hong Kong Uni. Press, 1957, p.4.

^③ 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涅特认为是因为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政策存在差异：英国大概不想因为传播基督教而使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从而获得与中国知识平等等机会，致使英国不能在中国获得厚利。见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页 64。

^④ E.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1, p.131.

^⑤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中译本，页 57。

^⑥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 年 8 月 5 日在马六甲正式创刊，由马礼逊筹办、米怜负责编辑，是近代第一份中文杂志，刊载内容主要是宗教方面，其次是世俗方面。该刊从第二年开始刊载一些有关地理学的内容。

^⑦ 《地理便童略传》，麦都思编，1819 年在马六甲出版，共 21 页，是一本供小学生用的简明教科书。全书分 8 回 60 问，对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边界、面积、物产、人口和宗教情况都作了介绍，包括美国和俄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

还有问：花旗国之朝廷如何？

答曰：花旗国之朝廷，略像英吉利之朝廷，都有两大会议，治理法律、粮税等事，惟花旗国无王，只有一人称总理者治国家的事，其在任四年，然后他人得位。^①

《地理便童略传》本身篇幅不大，而且可能极少流入中国，今天从传世文献中几乎没有发现它在国内有什么影响。^②

对后世有一定影响的是，郭实猎在 1833 年 8 月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西方文化，改变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印象。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号来说，其主要文章计有：序^③、东西史记和合^④、地理、新闻、东西洋并南洋图。其中的《东西史记和合》系麦都思将东西方历史上的人事，自远古以至 1820 年对照排比，藉此向华人显示世间另有悠久的高度文明。

为介绍西方地理知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创刊号起就设有专栏，较多地介绍世界区域地理知识，也有些篇幅介绍地震、气候和人文地理方面的内容。此外有时发表的专文以及个别新闻报道中也有叙述各国地理。迄至戊戌九月号（1838 年），共载世界地理类文章达 35 篇，但是主要是东南亚、南亚和欧洲各国的史地知识，^⑤涉及北美或美国的仅有《北亚米利加》、《地理全图之总论》、《列国地方总论》等为数不多的几篇文章，还有地图若干。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较为详细地提到美国的只有两篇文章。一是道光丁酉年五月之《论》。该文共约 880 个字，简略介绍了“花旗国”的发现、独立战争的爆发，以及公会（国会）和魁首领（总统）制度等。^⑥二是 1838 年 7 月的《北亚墨利加办国政之会》，该文也有 800 余字，介绍了美国的政治制度。^⑦

还有提及美国的是一些新闻类文章，如：“北亚墨利加兼列国殷殷兴隆，独有二邦与列国不相合”。^⑧其他相关新闻还有《亚米利加兼合国》、《北亚米利加合郡》、《华盛顿言行最略》^⑨等等。

其它有关美国甚或北美的文章大多是在述及欧洲等国家的历史地理时稍有提及，比如《列国地方总论》、《欧罗巴列国之民寻新地论》、《新闻纸略论》^⑩。

通过新教传教士的传播和中美实际的接触，中国人对美国应该说有了一些了解。1817 年，两广总督蒋攸銮在向朝廷报告有关美国船只走私鸦片问题时，称美国来华货船较多，亦最为恭顺，

^① 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 115-116。

^②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页 26。

^③ 除了创刊号有《序》外，其它各号（1833—1835）也常刊登《论》为其卷头语。

^④ 《东西史记和合》是麦都思于 1829 年在巴达维亚出版的小册子（《天下新闻》也曾刊登其摘要）。《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从创刊号开始至乙未五月（1835 年 6 月）号，就一直连载该书。该书将中外历史依年代分成上下两段比较记述——上段为中国史，下段为西洋史。郭实猎如此重视《东西史记和合》，目的是要让读者明白西方的历史十分悠久，有源可溯，并不逊于中国。至于介绍地理、科学知识与穿插彩色地图，正如前面所述一般，无非是要扩大中国人的眼界，让他们知道中国人还有不少东西得向西方学习。

^⑤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页 17。

^⑥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 231。

^⑦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 389 上。该文称呼美国为“美理哥”、总统为“统领”，与神治文《合省国志略》中的用词一致。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差不多同时出版，完全有可能就出自神治文之手。《华盛顿言行最略》中也用“美理哥”。

^⑧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 93 上。

^⑨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 348 上、页 297 下、页 319 下—320 上。

^⑩ 爱汉者等著，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页 101 下、页 234 下、页 76 下。

并谈到美国没有国主，头人四年一换，并注意到美国政体与一般国家不同。谓及：

该夷并无国主，止有头人，系部落中公举数人，拈阄轮充，四年一换。贸易事务，任听各人自行出本经营，亦非头人主持差派。^①

但是，国人对美国的历史、地理位置、政制等情况，还是模模糊糊，并不确切。被称为“一代硕学”的阮元在撰修《广东通志》时，尚“不知（英吉利国）何时占据北亚未利亚”，^②误把南北美洲混为一谈，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境内，云：

利未亚为五大洲之一，其地……有马逻可弗沙、亚非利加、奴米弟亚。亚米利加即亚非利加，有陆路通小西洋之如德亚，今分南北。^③

这里，把当时称呼非洲的名字“利未亚”和非洲的全称“亚非利加”当作两个地名，而又把“亚米利加”和“亚非利加”当作一个地方，从而错误地认为“亚米利加”是陆路，与如德亚（即巴勒斯坦）相通，属于利未亚（即非洲）的一部分。更在《广东通志·外蕃传·案语》云：

利未亚，在欧逻巴之西南，……今之大英吉利、米利坚等国，皆利未亚也。”^④

学问广博而又关心世界大事的开明之士梁廷柅于道光年间撰修的《粤海关志》中沿袭旧说，把美国说成是在非洲。他写道：

若加那英吉利（即加拿大），若米利坚，则利未亚之地也。^⑤

显然阮元等人对美洲或美国的确切位置毫无所知。

叶钟进的《英吉利夷情记略》（约1834年）虽然没有上述错误，而且称誉美国“沃衍宜五谷，周亦数千里，人勤力作，常以余粮济各国”，但是对美国的历史沿革、政治体制等情况并不清楚。他把北美独立战争的描述成：“英夷常起兵攻之，十余年不能胜”。对政制的描述则为：“设十二酋以理事，一酋死，复公举之……”^⑥

林则徐到粤之前，同中国知识界的大多数人一样，对外国史地、世界形势几乎茫然无知，竟然以为都鲁机（即土耳其）属于美国。^⑦

在鸦片战争前，也有个别中国人亲历美国，归国后写有游记，主要是谢清高^⑧的《海录》^⑨。

《海录》于1820年在粤刊刻，介绍了英、法、普、奥、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美利坚等国。在“咩哩干国”和“亚咩哩隔国”条下，简略地描述了美国和南美各国的情况。

虽然在“咩哩干国”条下，谢清高对美国的风俗、物产、交通工具等都有正确的介绍，但是谢

^① 《两广总督蒋铨奏报美鸦片船被抢现量予赏恤并晓谕严禁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一册，页20。

^② 《广东通志》卷330，列传63，《英吉利国》。

^③ 《广东通志》卷330，列传63，《咪喇坚国》，页60。

^④ 《广东通志》卷330，列传63，《咪喇坚国》，页61下—62下。

^⑤ 梁廷柅《粤海关志》，卷二十四《市舶》按语。

^⑥ 叶钟进《英吉利夷情记略》，载《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乙编，页789。

^⑦ 这是林则徐在1839年12月接见英国医生喜尔(Dr. Hill)等人时，闹出的一桩笑话：……讲至出产都鲁机（即土耳其）鸦片时，钦差即问：“都鲁机是否系米利坚地方？抑系美利坚所属之地？”我等回答：“不，只离中国约一月水程”。钦差同各位大官员，尽皆似是惊讶。《鸦片战争》（二），页426—427。

^⑧ 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金盘堡人。早年受雇于外国商船，历海上诸国，习其语言，凡十四年（1782—1795），后以双目失明返，流寓澳门，以通译为生。后来碰到同乡杨炳南。两人相与谈论海事，发现所述与外界流传多有不同，于是由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著成《海录》一卷。

^⑨ 由于樊守义的《身见录》埋没不彰，所以人们多以为“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自谢清高始”。吕调阳序，载谢清高口述，安京校释《海录校释》，页331。

清高又把美国说成与英吉利相同，“亦海中孤岛”，而且“疆域稍狭”，^①可见，所述内容并不确切。

上述情况表明，鸦片战争前，美国人到广州五十余年来，代表清政府在广州办理外事的两广总督们，并非没有机会了解美国，亦非没有碰到需要他们调查处理的和美国人有关的事；可是，他们缺乏了解外部世界的热情，致使虽知“省城有儿国夷人”，^②但是除了应允遇事查明旗号办理以外，对发生在外洋的事概不过问，对发生在“内地洋面”而不能不问者亦不深究，借口“无从查考”，却无法把这些“夷人”完全分清。

中国人对美国依然认识不清，一方面源于闭关自守的环境中“天朝上国”观念的滋生。另一方面是因为西方人自己撰写的中文著述对美国的介绍不全面。早期米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出版物对美国的介绍，相对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而言，当然更加详细、准确，但是这些介绍比较零散，内容不多。而且在这些出版物中，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外，其它很少流入中国内地，所以他们的影响不是很大。系统介绍美国历史沿革、地理位置等各方面内容的当属裨治文——美国第一位米华传教士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第三阶段，从 19 世纪中期（1840 年）到 19 世纪末。

中国人比较准确，而且比较多地了解美国，是在鸦片战争后。

1840 年和 1860 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使得更多中国人睁开了眼睛。统治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感到有必要修改对外政策，学会和外国打交道，开始主张了解外洋情况，培养外事人才。中国人了解美国及至世界的途径增多。也就是在此阶段，中国才开始真正认识美国。

中国了解美国的渠道，首先是西学的书籍和报刊越来越多。在这阶段，新教传教士继续向中国传播西学，译介了许多书籍，创办了许多报刊，其中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两次重版。这些报刊书籍传递了大量有关美国的信息。

中国人了解美国的另一个渠道是中国人走向世界，亲眼目睹西洋文明。1847 年第一批留学生包括容闳在内的三人赴美，到 1872 年则有首批官派留学生 30 人赴美。期间，清政府多次派人到欧美游历。从 1876 年起，清政府还开始在欧美各国和日本派驻公使和领事。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出洋游历章程》，当时出洋人员均须撰写出使、游历日记，抄送总理衙门，以备刊刻。正因为如此，这些出使游记也就有了特殊的价值，成为中国人了解美国的一个重要渠道。但是这些介绍，还是显得比较分散、凌乱。

以上两个渠道中提供的美国知识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其中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仍是中国了解美国的重要材料。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合省国说》、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书都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重要参考资料。到十九世纪后半叶，不少中国学者就是以裨著为底本校释其他史地著作，日本、美国、中国三国史家在撰写中文美国史著作时都曾受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影响。

因此，在中国人了解美国的历史中，裨治文是一个关键的人物，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

^① 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页 264。所以从其所述来看，不能确定谢清高曾亲历美洲。同时，该书当时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② 《广东巡抚为黄亚胜被夷人戮伤身死事下南海县札》，载许地山编《达衷集》，页 87。

可是，目前学术界对裨治文和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研究十分有限。1985年，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著名学者费正清，在谈到关于新教传教士的研究状况时说：“在19世纪中西关系中，新教传教士是研究得最少，却是最有意义的人物。”对鸦片战争前来华的早期新教传教士的研究尤其如此。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有所改变，但相对于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研究而言，还是薄弱得很，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数量都很少，论者大多是在论述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时顺带略述，对裨治文其人其书作专门论述的更少。

裨治文（E. C. Bridgman）是美国派遣来华的第一个新教传教士，自1830年来华传教后，长期居留中国，长达30余年。

裨治文在华期间，创办了影响深远的西文月刊《中国丛报》，他长期担任《中国丛报》的主编，并发表了大量文章。《中国丛报》颇负盛名，许多西方传教士，以及西方商人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对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美国最早的中国学杂志，是当时美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载体。

裨治文等早期来华传教士为了向中国人传播基督教，力图改变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观念，所以采用译书办报、创办学校、设立医院等世俗的方式为基督教打开大门。这些方式被称为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在华事业的三大支柱。裨治文恰恰在这些方面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他对“益智会”的成立、“马礼逊教育会”的创始、“医务传道会”的成立、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支会的筹办成功都有极大的贡献。另外，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美国传教士作为少数了解中国语言、习俗的西方人中的主体，对美国政府介入中国事务，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或改变，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裨治文就曾作为西方人的代表参观林则徐虎门销烟，参与美国政府专使顾盛的使团，同清政府签订第一个中美条约——《望厦条约》，又曾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亲赴太平天国占领地区考察，可以说，裨治文在近代中美关系史上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外最早介绍裨治文的著作应属裨治文夫人在1864年裨治文逝世三年后编写的《裨治文的生平与工作》（*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这本著作作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其次是，英国传教士兼学者伟烈亚力在1867年编辑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这部著作按每个传教士来华年代的先后顺序编排，汇集了1867年之前所有来华传教士的传记资料，其中就涉及裨治文的生平和著作。此书是后人学习研究的重要材料，但比较简略。

以上这些著作的作者与早期传教士有密切的联系，所以给大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传教士的了解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1996年慕瑞·鲁宾斯坦的《英美在华传教事业的起源》（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出版，此书对鸦片战争前伦敦会和美部会传教士在中国华南的传教活动作了详细的探讨，比较透彻地研究了两个差会传教士在华早期活动的起源、具体事实和演变过程。其中第六、七、八章节介绍了裨氏的家庭背景，皈依经历，世俗教育和职业训练，以及被中国传教团征召的经历，并且详述裨治文在1840年前在马礼逊的帮助下建立美国传教士基础的活动。遗憾的是，鲁宾斯坦没有论及1840年以后传教士们的活动。2000

年又有 Michael C. Lazich 出版了《裨治文，美国第一位赴华传教士》（*E.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是学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裨氏的著作。该书运用丰富的资料按时间顺序全面描述裨氏生平和工作。作者认为裨治文之所以来华传教是受到霍普斯金（Samuel Hopkins）的神学思想的推动，这是全书的特色所在。

国内在有关新教传教士人物传记方面，关于早期来华传教士的人物研究，基本上没有专著出版。比较有影响的属 198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该书选择 29 位比较有影响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分别为之作传，其中之一即为裨治文。该书主要参考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和裨治文夫人所编之《裨治文的生平与工作》来梳理裨氏基本生平和活动。

1993 年 9 月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化中国论文集》，由台北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推出，其中载有《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牧师与早期中美关系——纪念裨治文牧师到广州传教一百六十周年》。该文对裨治文在华之传教事业、创设之组织及贡献、对中美文化交流之贡献，以及支持林则徐禁烟运动和参与签订《望厦条约》都有论述，只是受篇幅限制，所述并不详细。

2000 年，广东教育出版社推出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此书在内容上基本涵盖了这段历史的各个方面：新教传教士的宗教活动，他们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他们从事的医疗和教育活动，传教士与西学的传播，传教士与近代西方的中国学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其中不乏对裨氏其人之介绍。

至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国内极少有人能看到原书。1997 年《近代史资料》（总 92 号）刊登了刘路生点校本，该本自称以道光十八年新加坡坚夏书院藏板为蓝本。刘路生点校本存在一些明显不足，在内容上，不但漏掉原著上卷两章，还把对两个不同州的情况编排成一个州，加以介绍（笔者已对此作一勘误表，见附录）。

由于没能阅读到原文，导致部分学者产生一些错误认识。如一些学者在阐述《海国图志》所载有关美国的内容时，误认为是魏源直接所言，其实大多辑自《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又如裨治文在《合省国志略》有一章专门介绍西方文字，认为：

二十六字母，散之则无穷，合之则有限，其用不测，然虽三尺儿童，亦可学习。凡天下事物皆赖二十六字详说之。其始岁历几百，稿三易而成，故虽盈千累万之书，亦不外此二十六字母也。”^①

这段文字被魏源辑入《海国图志》卷九十四“西洋器艺杂志”，但有学者误以为是魏源认识到英文的优点而所作阐述。

一些学者误以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附有介绍地球和美国的地图，^②其实这只在《目录》和《凡例》中提及，而全书不见任何地图。

也有学者竟误以为“美里哥”是裨治文的别名。^③从而把“美理哥合省国”点校成“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美理哥志略”则成“美理哥《志略》”。

众多学者，包括能比较容易地阅览到此书的美国学者，对版本情况的说法也十分混乱。比如美国学者 Lazich 在其研究裨治文的专著《裨治文：第一位来华美国传教士》一书中对于《美理哥合

^① 高理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二“土音本源”。

^② 如陈胜彝《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页 53。

^③ 骆驿《前言》，载梁廷枏著，骆驿点校《海国四说》，页 2。

省国志略》的版本问题，显然就直接引自熊月之先生的文章^①，而后者可能只是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一段相关文字的译述。^②其实伟烈亚力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回忆录》对裨治文的著作介绍并不非常准确。

论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较多的相关著作或论文不是很多。有比较系统的研究可以说近几年才开始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③、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④以及何大进的《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晚清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历史考察》。专门的论文则仅有复旦大学李晓杰未刊论文《十九世纪早期在华传教士所描绘的美国：高理文及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⑤、尹文涓《裨治文笔下的美国形象——从〈美联邦志略〉的前后两个版本说起》^⑥。

邹振环的《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以一种穷尽式的研究，几乎将一百年间的所有地理学译著一网打尽，^⑦对西方地理学的传播过程与影响作出有根有据的论述。对于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亦不例外。作者先是介绍《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作者及其所属的中国益智会之出版计划和成果，然后罗列国内各家版本之说，对早期版本和修订版（指1861年版）内容和影响自然不在叙述之外。邹振环的著作有两处为别人所无：一是提出王锡祺编辑的《小方壶斋舆地从钞》第12帙所收高理文著《美理哥国志略》，很可能是转抄于《海国图志》。至于《海国图志》收录的个别内容未见于王锡祺书，最合理的解释是王锡祺的漏抄。^⑧二是善于发掘史料，发现江苏南京人管嗣复（？—1860）对1861年修订版出过人力。^⑨遗憾的是，在内容的介绍方面，由于邹振环未能看到初版，而是主要依据《小方壶斋舆地从钞》所收《美理哥国志略》来分析，所以有些地方不确切。

李晓杰论文，对版本情况作了细致的梳理。作者大胆推测协助裨治文撰写《大美联邦志略》的中国文人宋小宋即为管嗣复，笔者颇为欣赏。不过，李晓杰认为裨治文撰写此书的动因之一是受郭实猎的《大英国统志》的影响。对于这种推测，笔者不敢苟同。

尹文涓论文，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和《大美联邦志略》两个版本的内容、文辞等方面作比较，从中揣摩裨治文二十余年来的心路历程，颇有新意。

正是在上述学界先行成果的基础上，笔者依据哈佛燕京学社制作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中文著作总汇》缩微胶片所收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初版（胶片编号F34），1844年香港藏版（胶片编号F35），1861年沪邑墨海书馆版（胶片编号F36），以及日本江做老皂馆藏本（胶片编号F37）等等，来展开论述。笔者试图对裨治文在中国的生活，还有《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版本、内容的流变及其对后世的传播与影响作一较细致的梳理，以期对裨治文与他的著作《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① Lazich, *ibid.*, p.154.

^② Alexander Wylic,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70.

^③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④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

^⑤ 本稿即将完毕之际，由龚纘晏老师襄助，于11月中旬辗转得到李晓杰此未刊论文，在此对作者、龚老师等人表示感谢。

^⑥ 《国际汉学》第八辑。

^⑦ 周振鹤《一度作为先行学科的地理学》，载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序，页4。

^⑧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页148，注42。

^⑨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页84。

本文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限于资料和时间，笔者未能全面阅读裨治文等传教士发回母国的报告和书信，对裨治文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时所依据的参考资料，没法核实；由于同样的原因，笔者对裨治文生平部分的研究大多只能立足中文文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缺憾。这种缺憾在笔者撰写裨治文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活动时，感觉最为强烈。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流传到底有多广呢？笔者虽然已经找出一些材料证明了裨治文的著作对十九世纪中、美、日史家的影响，但是限于时间，笔者未能做到相对完整的统计。

研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中国近现代新词的形成的作用，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如果能全部排列、比照《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全书4万多字，可能会使遗漏新词的比率降到最低限度，但是笔者还是限于时间和精力，没有做到这一点。同样的，如果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比它更早出版的新教传教士的出版物，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等，作细致的比照，那样，新词部分的研究内容会更加充实。

上编 裨治文在中国

第一章 裨治文在华早期活动

裨治文 (E.C. Bridgman) 是第一个受美国教会派遣的来华传教士, 他在中国进行过一系列的活动, 对中美文化作出过较大的贡献。

第一节 裨治文来华

裨治文, 中文又名高理文^①, 1801年4月22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贝尔彻城 (Belchertown)。

裨治文少年时期, 在他父亲的农场平静度过。据他兄长回忆, 裨治文自小品质良好, 他兄长说: “我所知道而且能证明的是, 在他青少年时期, 他总是待人友好, 听话, 真诚守信, 努力工作以帮助父母, ‘他在精神上热忱地为上帝服务。’”^② 以他为荣的兄长显然全忘裨治文可能存在的缺陷。

裨治文在1822年到阿默斯特学院 (Amherst College) 学习之前, 一直在贝尔彻镇父亲的农场工作并在期间接受基础教育。他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序言中写道:

……及至力强年壮, 助父于农圃牧之间, 四季日工而晚课, 并无虚度片刻韶华。^③

裨治文接受宗教教育的条件是得天独厚的, 他父母都来自非常虔诚的清教徒家庭。在信奉上帝方面对他言传身教, 特别是他母亲。虽然其母在1814年10月裨治文13岁时就去世, 但裨治文经常与他妻子爱莉萨 (Eliza J. Gillett Bridgman) 提及他母亲及其对他的影响。^④ 其母对这个儿子倾注了大量的感情, 非常关注他的精神生活, 作为一名信仰坚定的清教徒, 她殷切期盼裨治文能早日皈依上帝。裨治文不负所望, 在11岁时 (1812年), 就皈依了基督教。^⑤

裨治文在阿默斯特学院学习了四年, 1826年毕业后进入安多弗神学院 (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在此接受了三年严格的神学训练。

裨治文进入安多弗神学院不久, 就表示愿意做一名海外传教士。他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提到:

我想,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我成为传播福音的教士。我要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工作, 世界是我的田园。我最渴望和每天祈祷的就是如此。^⑥

裨治文向往的“田园”在1829年变成了现实中的中国, 令裨治文想不到的是他一辈子都会在这块“田园”里工作, 直至生命的消逝。而使他实现这个愿望的契机是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提供的。

^① 裨治文、高理文俱为广东语名。高理文为其中名 (Coleman) 译音, 据德雷克分析, 此名通常在他的朋友之间应用。例如, 《贝切尔镇历史学会书信集》中, 大部分署名为“Coleman”, 见德雷克著, 任复兴译《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 页118。

^②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

^③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

^④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3.

^⑤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3.

^⑥ *Bridgman to Lucretia, Andover, Dec.30,1826. cited by Lazich, ibid., p.38*

如前所述，马礼逊到达广州之前，就与美国教会联系密切。马礼逊来到中国后，仍然与美国宗教界保持密切联系，向他们发送在中国传教的情况，他的信件经常在美国公理会的著名期刊《传教士先驱》(Missionary Herald)上发表。

1820年，马礼逊被聘为美部会通讯秘书(corresponding secretary)，负责向美部会提供有关对华传教资料，以便美部会决定是否派遣传教士到中国。^①

马礼逊刚到中国时，就希望美国基督教会能派一个人来广州与他共事，他在1807年12月28日的信中说：“如果我们的美国教友熟悉一位适合到中国传教的人，他又很愿意承担这项工作，也许教会最好还是默许”。^②人约在1809年，马礼逊曾给美国传教会写信建议向亚洲派驻美国教会。^③

马礼逊失去米怜(1822年去世)后，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独立工作，更加孤独，所以，马礼逊更加希望美国教会能派人到中国传教。

1827年11月中旬，马礼逊向美国教会发出一封公开信，要求美国教会派遣能用英文讲道的传教士来中国。^④几天后，他又给美国公理会写信，希望他们考虑中国的请求。

马礼逊的呼吁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传教士先驱报》1828年10月载文说：“为什么不派人去帮助他，为什么美国的教会不应当派人去，这是没有充分理由的。”^⑤1829年，美国海员之友会(Seaman's Friend Society)在年度报告中也呼吁有关方面注意，“每年有三千个美国和英国海员访问中国广州港口，”^⑥并且决定一旦有合适人选就立刻派往广州。美部会秘书则在给马礼逊的回信中说：

……大约在10月中旬，公理会在纽约举行了年会，它对海外传教事业具有一种新的且是特别的推动作用。所谈及之处，特别能体现美国人事业心的地区是中国……只要我们找到两位适合这项工作的人，我们就派他们前往，去开展你提出的各项有益的计划。^⑦

在马礼逊的强烈呼唤下，美部会终于选中裨治文和雅裨理^⑧(David Abeel)到中国传教。

1829年9月23日美部会助理秘书格林(David Green)向裨治文表示希望他到中国做一名传教士。经过考虑，裨治文同意接受美部会的派遣到中国传教。10月3日，按照美部会秘书伊瓦慈签发的文件，裨治文被授予圣职。^⑨1829年10月14日，裨治文和雅裨理等人从纽约港启程赴华。^⑩

^①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p.196.

^② E.A. Morrison, Vol. I, p.185.

^③ E.A. Morrison, Vol. I, p.353.

^④ 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p.220-221.

^⑤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页83。

^⑥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页83-84。

^⑦ E.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1, p.405.

^⑧ 雅裨理，1804年6月12日出生在新布伦瑞克城(New Brunswick)，家道殷实，属于美国的上层社会。15岁时报考美国西点军校被拒，只得转向另一种职业生涯。他在新布伦瑞克的一所医学院学习满一年后，受他叔父影响，到新布伦瑞克神学院学习，这是美国荷兰归正会的精神中心所在。毕业后，曾作为独立传教士到太平洋上的维尔京群岛(Virgin Islands)传教，但失意而归。美部会在开始讨论中国传教事务后不久，就与专门向海外美国商船聚集处派遣牧师的美国海员之友会联系，希望该组织物色人选，与美部会的传教士一道去中国传教。雅裨理就成为候选人，但是他提出条件只为海员之友会服务一年，期满后，如果美部会接受，他将转而成为该会的成员。雅裨理到达中国后，不满一年，因为健康原因结束在广州担任牧师的生涯，同时也结束与海员之友会的关系，到东南一带传教。1833年离开南洋，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才再次来到广州。

^⑨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10-15.

^⑩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8.

在出发前，裨治文收到美部会秘书签发的一封很长的“指示”信，要点如下：

致裨治文牧师 亲爱的先生：公理会咨询委员会任命你为美国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感到这是他们指定你去担任具有巨大利益和责任的一项事业……

终有一天，福音将在中华帝国获得胜利，它那众多的人民将归向基督。你要以此自勉，让那神圣的热情在你胸中燃烧，竭尽所能和坚忍不拔。作为基督的一个战士，你要抱着希望，在这个成就中高兴地有你的份。

关于在这样一个从未试验过的地域，你的处境将如何，本委员会感到无法掌握足够的情况，因此，要对你的计划和工作下指示就不可能很具体，如何行动必须要在上帝的引导和帮助下，由你自己来判定。你特别要向伦敦传教会的马礼逊牧师请教……一切重要的行动，你都应当和他商议……

本委员会料定你的注意力将有数年时间放在掌握中国语言文字上……希望广州或澳门能作为你常住或永久居住的地方。

本委员会要你做的另一项工作，就是希望你利用一部分时间去散发传单和书籍，特别是《圣经》。因为中国政府不会容许公开传教，介绍福音知识的最好手段，乃是印好的传单和书籍……

除了别的工作外，要牢记你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国人中间推广福音……当前拦住去路的障碍必须扫除，准备工作必须完成。我们仍然认为，不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福音的影响就将在中国觉察到，虽则我们并不企求奇迹的出现，可是上帝的旨意会迅速打开一个宽敞而有效的门户。过去三十年的政治革命，可作为他人的先驱，其影响将扩充到那些建立得最长久、最安全的政府中去。因此，要抱着希望而工作……

由于你要去的地方范围大、利益广，你将比几乎所有的兄弟们有更多的便利，为此，在你工作和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要求你把有关中国人民的特征、状况、风俗、习惯等等，特别要对这些情况受他们的宗教影响，向美部会作出完整的报告……^①

从这封指示信中，可以看出，美部会对中国的了解，显然是基于马礼逊对中国的了解。

须提及的是，促使裨治文和雅裨理成行的另一人因素是美国商人奥立芬的帮助。奥立芬(David W. C. Olyphant)，1820年开始来华贸易，1851年死于归美途中，他是少数不仅自己拒绝从事鸦片贸易，而且公开谴责这种罪恶勾当的商人之一。在裨治文来华前，奥立芬就提出由他免费提供裨治文一年的住宿。他写信给其合伙人塔博特(Charles N. Talbot)，要求给裨治文“提供一个房间、一位仆人、洗刷用品，并在你的办公桌旁添一把椅子，一切都算在我的开支中”。^②奥立芬长期支持在华传教事业，他经常免费给来华的英美传教士提供舱位，被誉为“中国传教之父”。他的几位儿子在他去世后，也展现出这种品性。容闳去美国时，就是搭乘奥立芬兄弟公司专来中国运载茶叶的“亨特利”(Huntress)号商船，自香港至纽约，不取船资。^③裨治文曾发感慨：“我从未曾碰

^①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0-27, 译文参考顾长声《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页22-23。

^②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37-38.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页12。

到过这样的人。如果每个商人都像他那样虔诚，传教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发展。”^①当奥立芬去世时，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撰文说：“这使传教事业失去了一位最热心的支持者和最精明的顾问。”^②

经过一百多天的颠波，裨治文等人终于在 1830 年 2 月 19 日到达伶仃岛。休息两天后，裨治文与雅裨理乘小船到澳门寻找马礼逊，得知马礼逊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商馆内，他们又设法于 2 月 25 日晚 9 点来到了广州的外国商馆。

在广州，裨治文与雅裨理受到马礼逊“父亲般最热忱的欢迎”。裨治文在给美部会的报告中写道：

马礼逊博士对我们非常友好，尽他所能提供一切帮助。除了给我一些个人建议外，他还给我有关他英国书商的订单以便拿到中国字典，这一直延续到我能从东印度公司图书馆借书。他还送我三、四十本中国书，以及其他很多急需要用的物品。^③

3 月 25 日晚，在马礼逊的介绍下，裨治文第一次与梁发相识，并一起作了祷告。^④裨治文在日记中用一句话描述了他对这第一位中国传教士的印象，“他有主耶稣的形象”。^⑤

裨治文刚来中国后的工作基本是：学习语言、布道、准备和分发书籍、教《圣经》和通信。^⑥

裨治文来华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马礼逊和一位中国人“罗先生”（Lo-seen-sang）曾充当裨治文的教师。

对于早期来华传教士而言，学习中国语言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东西方文化传承不同，语音系统迥异。而且传教士派出来时，一般已近中年，诚如梁发给伦敦会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他们的舌头太硬，难以调整语音^⑦。当时外国侨民中懂中文的只有 3 人——马礼逊博士；德庇时爵士，他是东印度公司商馆的最后一位主任；还有就是威廉·C·亨特^⑧。这是由于外国商人来中国的时间短，清政府又严厉禁止外人学习中文，所以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致力于学习非常难学的中文。而裨治文能借助的学习材料又极少，主要能利用的是马礼逊的一系列汉语研究著作。马礼逊一开始给裨治文找的资料就包括他自己编著的《华英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⑨在米怜的帮助下完成的中文《圣经》等。

裨治文在离开美国之前，没有机会接触中文，在来华的旅途中，才开始向同船伙伴、美国商人亨特学习中文，所以来华后，裨治文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中国语言上。据记载，自 3 月

^①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7.

^②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20, p.509-511.

^③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45.

^④ 麦洁恩称之为“第一次的中、美、英宣教士祷告会”。麦洁恩著，朱心然译《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师》，页 76。

^⑤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43.

^⑥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57.

^⑦ 麦洁恩著，朱心然译《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师》，页 140。

^⑧ William C. Hunter, 美国人，曾于 1825 年至 1826 年到达广州，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文。是《广州番鬼录》和《中国杂记》两书的作者。见威廉·C·亨特著，冯树钦译《广州“番鬼”录》，页 44。

^⑨ 《华英字典》分为三部，第一部题名《字典》，第二部《五车韵府》，第三部《英汉字典》，1808 年开始编撰，1815 年出版第一部第一卷，到 1823 年全部出齐，是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 年由东印度公司出资在澳门出版，全书分三部分，英汉字汇、汉英字汇、成语词组。

份起，“1830年所有的时间，裨治文都用来学习语言，还学习广州及其邻近地区的方言”。^①裨治文学习语言花费了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致要向父母亲解释为何没有回信，他说：“我希望朋友们不要以为我忘记他们了，要掌握中国语言，我必须全力以赴。”^②

裨治文在1830年11月雇佣了另一位教师，50岁左右的年纪，每月薪金为16美元。^③在艰苦的学习过程中，裨治文曾经考虑到马礼逊创办的位于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学习中文，被时任英华书院院长的吉德（Samuel Kidd）劝止。吉德认为裨治文在周围都讲广东话的地方学习广东话，比到英华书院的条件更有利^④。裨治文在吉德的劝说下，最终打消了念头。裨治文经过不懈的努力，最终成为当时成就最高的汉学家之一。^⑤

由于中国方言众多，不同地区的中国人也有可能完全无法理解对方的语言。这使新教传教士在语言上就很难向中国人直接传教。所幸的是，中国全国的文字统一，因此尽管方言复杂，彼此都能通过文字相互沟通。换句话说，对早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来说，尽管中国方言众多，只要掌握汉文，就能有效地达到传教的目的。正如米怜所说：

不管是以何种洗练的语言来表达，在传播人或有关神的知识上，印刷媒体显然要比其他媒体更占优势。作为加深理解的手段，中文书籍之重要性也许要比其他传播媒体还要大。因为，阅读中文的人口要远比其他民族为多。^⑥

裨治文也认为在中国的环境中散发大量书籍和小册子是传播基督教的惟一途径。他说：

既然中国政府不允许公开传播福音，那么传播基督教知识的最好方法就是印刷大量的书籍和基督教小册子……

因为

中国人好读书。他们有其自身的宗教、伦理和历史等种种门类，基督教书籍是他们所需的其中一种，而基督教书籍可以在这个帝国的下层民众中找到归宿。

所以裨治文等人在倾其全力学习汉文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翻译等以印刷媒体为传教手段的“文字播道”的工作上，希望中国人在阅读中接受基督教信仰。

裨治文等人通过掌握中国语言知识，出版单张书刊，是他们在华传教的最主要方式之一。有论者把这种传教方式称为“无声传教”（Silent Evangelism），^⑦也有学者把它被誉为“打造镀金的钩子”。^⑧

但是慑于清政府禁止传教的政策，传教士一般不敢亲自散发宣传宗教的文字材料（这包括传教小册子和中文《圣经》），而是利用与他们接近的或已经受洗的中国人做此项活动。裨治文就通过梁发为首的一小批中国人进行。裨治文指使梁发带着中文宗教宣传材料到广州附近的郊区散发。

^①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 p.9, ABCFM Papers, 16, 3. 11. 转引自吴义雄前揭书，页72。

^② Bridgman to Parents, Canton April 16, 1830. ABCFM, reel 233, cited by Lazich, *ibid.* p. 67

^③ Bridgman to Evarts, Canton, Nov. 13, 1830. ABCFM, reel 256, cited by Lazich, *ibid.* p. 73.

^④ Bridgman to Parents, Canton April 16, 1830. ABCFM, reel 233, cited by Lazich, *ibid.* p. 73.

^⑤ 威廉·C·亨特著，冯树铁译《广州“番鬼”录》，页14。

^⑥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p.153-154.

^⑦ 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页268-269。

^⑧ 林治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页257。

如果路途较远，裨治文还支付开支。^①

裨治文还在广州的欧美人士当中布道。他向美部会报告说：“雅裨理和我从抵达广州之时起，每个礼拜日都在美国商馆布道。”^②裨治文有时也到黄埔锚地为海员布道，夏季非贸易季节则在澳门举行这类活动。^③

在裨治文的早期在华生活中，学习语言、布道和散发资料是他的基本活动，对当时和后世产生影响的则是他在出版、教育和组织等方面的工作。

第二节 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裨治文到达中国后，发现在中国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为“报纸”，虽然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有他们自己的“邸报”，但只刊登与他们自己相关的内容，包括官员往来，他们参观了什么地方，强盗被逮捕、审判、行刑，他们甚至对许多事情不求真相。^④所以裨治文希望能在澳门或广州建立一个传道会印刷所。裨治文希望建立印刷所的目标有两个，一是把中国的文化告知西方人，以引起他们对其亿万民众精神和社会福利的兴趣并支持他们；二是希望把基督教基本教义广泛地传播到中国大地上。裨治文相信利用西方印刷技术能有利于在中国传教。^⑤

1830年5月，裨治文邮寄给美部会最初几期的“东方基督教观察家”(*Oriental Christian Spectator*)。“东方基督教观察家”，是美部会设在孟买的传教印刷所印刷的，主要刊登有关印度的历史风俗和信仰的文章，裨治文认为这份杂志对准备去印度的传教士会有很大的帮助，希望在中国也能创办类似的印刷所。但是美部会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建立印刷所风险过大。裨治文通过解释，终于获得在广州建立印刷所的许可并获得美商奥立芬的支持。

在奥立芬的资助下，一套印刷设备终于在1831年12月运到广州，不过，令裨治文遗憾的是，必须配备的字模没有一起带过来，这套字模直到次年4月份才由奥立芬的商船“罗马号”运到。裨治文每月拿出15美金雇佣一名印刷工人，建立一间办公室。这就是今人所称的“广州美国海外传教委员会出版社”。^⑥

在这个印刷所的基础上，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于1832年5月1日创刊。^⑦

《中国丛报》的创刊与马礼逊有着密切联系。马礼逊与米怜两人曾于1815年于马六甲发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8年在马六甲创设“英华书院”后，就由英华书院出版《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马礼逊等人除出版中文报纸外，还于1816-1821年间在马六甲发行《印支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⑧又于1826年发刊英文杂志 *The Malacca Observer and Chinese Chronicle*，^⑨每半个月出

^① 麦洁恩著，朱心然译《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师》，页96。

^②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7, p.178.

^③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 in China*, p.9, ABCFM Papers, 16.3.11.转引自吴义雄前揭书，页72。

^④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59.

^⑤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61.

^⑥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页94-95。

^⑦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74.

^⑧ *Chinese Repository*, vol.18, p.435. 1849年。

刊一次。1827年11月29日, *The Malacca Observer and Chinese Chronicle* 登出拟将发行英文季刊的启事一则, 大意是: 因鉴于西方人对中国缺乏认识, 有求进一步了解的必要, 拟发行季刊一种, 藉以增进西人对中国历史、文学、哲学、政治、风俗等各方面之了解, 并附登时事新闻, 评价有关中国之西文书籍。拟定名为 *Indo-Chinese Repository*, 由英华书院发行。^②由此定名与日的看来, 可证明马礼逊等人早具有发行类似《中国丛报》的心愿, 只因中国政府限制太严, 条件不够成熟, 所以迟迟没有实现, 直至裨治文来到后才切实行动。

《中国丛报》, 旧称《中国文库》、《澳门月报》等。《中国丛报》最初由“在华基督徒协会”^③ (Christian Union in China) 赞助, 使用上文提到的美部会印刷设备。奥立芬在经济上支持《中国丛报》的印刷和发行, 这是丛报能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裨治文在这份刊物上花费了大量心血。他在1832年7月写给父母的信中提到: “我每天忙于学习, 教学, 写文章, 印刷, 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没有上街了。”^④ 由于裨治文雇佣的印刷工是葡萄牙人, 用英语交流比较困难。于是裨治文要求美部会尽快派一名高素质的印刷工来华。

1833年10月, 或许是应裨治文和马礼逊之请求, 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和崔理时^⑤ (Ira Tracy) 受美部会派遣抵华。之后, 卫三畏在编务和印刷等方面长期协助裨治文, 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崔理时则以传教为主, 但是不久就离开广州去新加坡, 留居在那里。关于《中国丛报》的主要任务, 从裨治文执笔的创刊词中可知:

要对外国人出版的有关中国书籍进行评论, 旨在注意已经发生的变化……关于博物方面, 最适宜和有利的是调查下列情报: 气象, 包括气温、风、雨及气象对健康的影响; 土地, 包括矿藏、植物、畜产、土地肥沃程度及耕作状况, 还包括江、河、海中的出产; ……关于商业方面, 必须特别引起关注的是, 要调查其过去到现在的发展情况, 特别要考察当前商业状况的利弊; ……关于社会关系方面, 必须对社会结构详细调查, 在考察中国人的道德品质时, 要求对他们政治件的相互关系, 包括统治者与百姓、丈夫与妻子、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 进行仔细和长时间不间断地观察; ……我们对中国人的宗教特征也感到兴趣, 将给予非常强烈的关注。^⑥

可见, 裨治文等人创办《中国丛报》的目的是为了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况。报学史专家白瑞华 (Roswell S. Britton) 在谈到《中国丛报》时, 也认为其目的就是“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近地区的最可靠的和最有价值的资料。”^⑦而这份刊物创办的终极目标应该就是利于传播福音。这从裨治文公开发表的日记中可见一二, 他曾写道: “愿它无论在其开端, 还是在这之后, 都全然成为主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147-148.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149.

^③ 在华基督徒协会, 是裨治文自1830年到广州后, 会同马礼逊、雅裨理发起的。因为他们发现汇聚广州十三夷馆的欧美商人多奉基督教, 却没有宗教组织。该会首批成员包括裨治文、马礼逊、雅裨理、马儒翰 (J.R. Morrison, 马礼逊的儿子)、查理·金 (奥立芬的外甥), 其宗旨是“在追求基督教善行 (Christian benevolence) 的过程中互相提出建议并提供帮助”。裨治文曾在《传教士先驱》中进一步解释宗旨, “它并不妨碍个体、私人的行为, 反而向所有人提供意见和帮助, 并且担当几项属于基督教慈善事务的管理工作”。该会主要工作为联络各国教徒; 设立资料库及图书馆; 出版华文圣经教本; 承担开办《中国丛报》一年之经费。

^④ Bridgman to Parents, Canton, July 28, 1832, BPBHS, cited by Lazich. P.90.

^⑤ 崔理时 (Ira Tracy), 美国传教士, 早年在教会学校读书, 1832年被美部会授予圣职, 次年受遣来华, 10月26日抵达广州, 旋至新加坡主持出版事业, 历时6年, 1841年因病退休。有中文著作2种。

^⑥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 p.1-5.

^⑦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p.26.

的事业；愿它所有的篇章都充满着能增加神的荣耀和真理。”^①

从《中国丛报》的内容来看，裨治文所阐述的宗旨基本实行。丛报共刊登约 1242 篇文章（根据卫三畏的目录统计），对鸦片战争前后 20 年间处在激烈动荡和急剧变化之中的中国社会作了

全方位的报道，包括中国的历史、地理、政治、文化教育和风俗等。《中国丛报》特别重视报道关于中国的时事和对外关系，记载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译载许多如涪帝上谕、大臣奏折等重要文件，这些内容为后人研究鸦片战争前后 20 年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史开端和早期中外关系史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中国丛报》也详细报道新教传教士在华的各种活动。《中国丛报》所有文章中与中国有关的约占百分之九十，重点在中国国情方面，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丛报。有关《中国丛报》内容的具体分类见表格（表 1）。

表 1 《中国丛报》刊登文章分类^②

类目	总篇数	裨氏篇数
地理学	63	21
中国政府与政策	81	17
税收、陆军、海军	17	3
中国人	41	12
中国历史	33	19
博物学	34	无
艺术、科学和制造	27	7
旅行	27	13
语言文学等	94	30
贸易与商业	60	7
航运业	26	3
鸦片	55	16
广州外国商馆	36	11
外交关系	34	13
与英国的关系	38	16
与英国的战争	74	28
香港	22	4
与美国的关系	21	12
暹罗与越南	24	无
其他亚洲国家	21	4
印第安多岛屿	36	10
异教	53	4

^①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74.

^② 笔者根据卫三畏编的《中国丛报》目录统计。

传教	102	39
医药传教	48	6
圣经翻译	40	9
教育协会等	31	11
宗教	29	3
传记告示	38	8
尔撰	37	15
总计	1242	341
裨氏文章篇数所占比例		27.5%

《中国丛报》的作者主要以传教士为主，几乎这一时期的所有各教派的来华新教传教士，包括在南洋华人聚居地区活动的新教传教士，都向《中国丛报》投过稿，撰稿较多的是裨治文、卫三畏、郭实猎、伯驾等。但不容忽视的是，传教士以外的英美商人，如美国商人查理·金(C.W. King)、鸦片贩子因义士(Robert Inglis)，以及外交官如包令(John Bowring)、威妥玛(Thomas F. Wade)等人，都在丛报上发表过文章。梁进德也在《中国丛报》上发表过文章。^①正如白瑞华说的：“投稿人的名单实际上就是那时在华的所有英美人士的名单。”^②

在所有的作者中，裨治文发表的文章最多，可以明确是他写的研究性论文和评论就达 341 篇(看表 1)，而文章数量仅次于他的卫三畏只有 120 篇左右，相差悬殊。裨治文虽然没有研究中国的大部头著作，但是他在《中国丛报》上发表的数百篇文章，加上他撰写而且署名的消息评论，约有 2000 页以上的篇幅，基本涉及到中国问题的每一个方面，而且都有一定的深度，收集、保存了丰富的资料，是他那个时代西方当之无愧的中国问题专家。^③

《中国丛报》从 1832 年 5 月创刊，1851 年 12 月停刊，每月一期，从未间断。其中 1851 年 8 月至 12 月则合出一期，合计共为 232 期，外加索引一卷，共 20 卷，每卷 650 页左右。前 8 卷都是从 5 月到次年 4 月，20 期为一卷。第 9 卷从 1840 年 5 月到 1840 年 12 月只有 8 期，页数达 687 页，可见 1840 年事件之多以及裨治文等人对时局之关注。前两卷每期发行 400 份，到 1834 年第三卷时已增加到 800 份，第四卷已达 1000 份，第五卷则有 1000 多份。^④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算是比较可观的数字。

丛报最初两卷，每本 6 元，后面几期每本三元。^⑤鸦片战争后，在华各开放口岸涌现出大量外文期刊，《中国丛报》的发行量随之逐渐减少，到最后一年只有 300 个订户。另一方面，美部会领导人安德森并不支持发行《中国丛报》，他“似乎有轻视并终止所有的印刷所、学校和医院的倾向”。

^⑥裨治文等在华外侨经过商议，最终决定在 1851 年年底停刊。

据卫三畏统计，《中国丛报》一共印出 21000 册，在停刊后，还剩下不少，陆续卖出一些后，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p.505.

^② Roswell S. Bri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p.28-29.

^③ 蒋国珍《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把 *Chinese Repository* (《中国丛报》) 列为“外国商人的机关报”。其中第 4 项把编辑拼写为 B.Ridgman，(可能为印刷之误)。载《民国丛书》第三编，页 22。

^④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159.

^⑤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159.

^⑥ Frederick W. Williams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 180.

到 1856 年，还有 6500 册存于广州美国商馆，装箱未及运走，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因英军炮击而引起的广东十三行大火。^①

《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有关中国社会的各种调查报告，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提供了大宗的资料，不仅来华的西方人订阅，而且发行到欧洲和美国。以 1836 年发行的 515 本统计，其中销售中国 200 本，马尼拉 15 本，夏威夷 13 本，新加坡 18 本，马六甲 6 本，槟榔屿 6 本，巴达维亚 21 本，暹罗 4 本，悉尼及南威尔斯 6 本，缅甸 3 本，孟加拉，尼泊尔 7 本，锡兰 2 本，孟买 11 本，南非开普敦 4 本，汉堡 5 本，英国 40 本，美国 154 本。^②

《中国丛报》刊等的部分文章还被美国一些有影响的教会刊物和普通报刊转载。正如伦敦的“便士杂志”(*The Penny Magazine*)在 1837 年 8 月 5 日评论的，“这份期刊即便在英国也算是好的。”^③可见，外销占多的《中国丛报》对中西文化交流有极大之价值。

《中国丛报》的记载，在许多地方，弥补了档案的不足。许多学者研究这一段时间的中国历史时多引证该刊，对其评价颇高。

中国学者如罗家伦说：“研究鸦片战争的人，不能不参考当时广州英国人出版的定期刊物……名叫 *Chinese Repository*，这是一种重要的史料”。^④

李定一说：“这个著名的刊物，受到全世界所有有关学者的重视，成为研究当时中国历史的珍贵史料之一。”^⑤

谭维理说：“这二十卷的 *Chinese Repository* 不仅有当时极有价值的史料，且其有关中国之研究论文，今日仍有参考的价值。”“这是当时唯一的汉学杂志。”^⑥

而美国学者对其价值也颇为认同。丹涅特说：“(《中国丛报》)成为流传给我们的一部关于那段时期最确实可靠的编年史。”^⑦

赖德烈说：“这是有关中国知识的矿藏”^⑧，又说，“这是当时中国对外关系最好的史料”，^⑨是研究当时的中国“不可缺少的史料”。^⑩

综合以上许多史家的评论，可见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发轫和早期中外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受到很大的重视。

《中国丛报》还曾于 1941 年在日本被重新翻印，出版至第 15 卷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化而未印完。^⑪

^① Frederick W. Williams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178-179.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160.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159-160.

^④ 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武汉大学科学季刊，卷二，第三期，1931年3月。

^⑤ 李定一《中美外交史》，页50。

^⑥ 谭维理《1830-1920年美国人之汉学研究》，清华学报新卷二，第二期，页246-247。

^⑦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页473。

^⑧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265.

^⑨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40. Note 40.

^⑩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Early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180.

^⑪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页28。

第三节 裨治文与“马礼逊教育协会”

由于处在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夹缝中，马礼逊、裨治文等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无法向民众直接传道，转而借助于出版、教育和医药等方式传道。

在传教士看来，教育是传教最强有力的辅助手段，是传教士传道布教及训练宗教人才的重要措施。正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s）所说：“在中国办学是最省钱、最有效的传教方法。”^①

早期新教传教士来华后，很快就意识到，由于他们的基督教文化和以信仰佛教为主的中国传统宗教文化的距离实在太远，他们的福音传播方式难以引起中国民众的共鸣。为改变直接传教成效不大的状况，他们在中国非常注重教育。

伦敦会的马礼逊自1807年东来之后，即十分注意教育工作。1814年，米怜去马六甲谋划设立学校。^②四年后（1818年），马礼逊和米怜即于马六甲设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③1823年，新加坡书院（Institute of Singapore）成立，亦收容中国学童。至1837年，中国学生已达95人，因此，书院特设一专门学部，教授中国儿童。^④

在各地传教站实施教育也是美部会的传统。美部会1815年在锡兰（今斯里兰卡）、1819年在桑威夷群岛（夏威夷旧称）、西土耳其和土支那（土耳其西部港市伊兹密尔旧称）、1821年在巴勒斯坦、1822年在马耳他、1823年在叙利亚建立传教站。^⑤相应地，各地的传教士都办学校、建印刷所，意欲通过教育改变当地人的信仰，皈依基督，同时使异教社会的文化得益于美国文明。

裨治文相信，文明反对愚昧的伟人战争不仅包括获得宗教知识，也包括世俗知识，他说：

教育是提高人类精神文明和免除上帝惩罚的手段。^⑥

所以他也非常重视教育问题。

裨治文来华后不久就收中国少年学习英文。他在日记中经常透露相关的信息。1830年10月23日，裨治文测试了一名10岁男孩（Achun）^⑦。在1831年3月的日记中，裨治文记载了三个学生的年龄和名字，按年龄从大到小分别是阿强（Acheong）、阿吕（Achan）和阿德（Ateh）。^⑧

阿德就是梁发的儿子梁进德。阿德在1830年11月被送到裨治文处，是因为他父亲希望他能在裨治文处“学习英语，熟悉英文《圣经》，以便能帮着修改中文《圣经》”。^⑨裨治文教梁进德希伯来文，还教他完整的古典文学。梁进德后来一直跟随裨治文，1834年曾和梁发逃离广州，^⑩1835

^① 溪尔恩《在山东前线》，页227，转引自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

^②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p.214.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1, p.105.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7, p.307-308.

^⑤ Lazich, *ibid.* p.36

^⑥ Suzanne W. Barnett, J.K. Fairbank,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p.55.

^⑦ Bridgman Journal, October 23, 1830, cited by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54. 美国学者 Lazich 引用为“裨治文收养了十岁男孩 Achan”（Lazich, *ibid.* p.74），与裨治文1831年3月28日日记所载中三名学生（Acheong, Achan, Ateh）中的一个相同，本人认为不能确定为同一人。因为之前裨治文在1830年11月11日日记提到“我的一名学生 Ahing”，而 Ahing 并不在后来所记载的三人中。疑为收养学生之前有一个小测试，之后决定是否收留。

^⑧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59.

^⑨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55.

^⑩ 东印度公司终结后，英国于1834年派遣律劳卑（Lord Napier）来华担任商务监督，处理中英两国的商业和政治关系。马礼逊担任使团翻译。律劳卑坚持要和总督直接商议，但是中国政府只允许他同行商交流，中英间的商业

年回来后仍在裨治文家中学习。1835 年下半年，由于麦都思和史第芬人量分发书籍，引起官府的关注。官府随之发现裨治文与印刷书籍的事有关，于是要那位为裨治文作保的华商负责。那个商人辩护说这些书籍是从马六甲运来的，才得保清白。住在裨治文家里的梁进德则处境非常危险，于是被裨治文秘密地送到新加坡。^①梁进德结婚后，裨治文和马儒翰还负责这对夫妇的生活^②。奇怪的是，梁进德一生从裨治文等传教士处受惠极多，但他最终没有皈依上帝。裨治文在 1832 年、1833 年还收养了几个少年。^③

1834 年 8 月 1 日，马礼逊积劳成疾去世，裨治文和在广州和澳门的新教传教士和英美商人为纪念马礼逊，倡议成立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1835 年 1 月 26 日由裨治文等 22 个人签名发布通告。一个月内他们就筹集了开办费 4860 元美金，由洛宾逊（Sir George Best Robinson）、查顿（William Jardine）、奥立芬、颠地、马儒翰和裨治文等人组成临时委员会，以英国怡和洋行为司库，裨治文为秘书。^④

裨治文等人还接受了大量的捐赠图书，这是出于东印度公司的眼科医生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的建议。郭雷枢认为在中国推行教育事业应鼓励外籍教育界人士大量捐赠图书，在中国境内建立一所公共图书馆。到 1836 年 9 月，裨治文他们收到的捐赠图书已达 1500 册，其中，郭雷枢捐赠图书 700 册，利惠时（J. R. Reeves）捐 600 册；颠地、福克斯（Thomas Fox）、马儒翰等合捐 200 册。^⑤

1836 年 9 月 28 日，临时委员会在广州的美国商馆举行会议，讨论由裨治文起草的章程。11 月 9 日再次举行会议，宣布马礼逊教育会正式成立。会议选举了 5 人理事会，选出英商颠地为主席，英商福克斯为副主席，英商查顿为司库，裨治文为通讯秘书，马儒翰为会议秘书。马礼逊教育会实际由裨治文具体操作，类似于“总代理人”的角色，执行“理事会作出的建议和决策，处理信件往来，挑选教师、书籍等等”。^⑥会议通过了章程，选举了理事会。该会章程共有十三条，附则十七条。会议确定马礼逊教育会的宗旨是：

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在这些学校里除教授中国少年中文外，还要教他们英文，并通过这个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传到他们手中。^⑦

这是因为裨治文等人觉得，英语是中国人掌握西方知识的必要技术，有利于在中国传播福音。

章程还具体规定了受资助的对象：

任何年龄的中国男女青年，无论是居住在中国本土，均可成为本会资助对象；由理事会认可的学校，亦可接受本会资助。在可能的情况下，6 岁、8 岁或 10 岁的儿童，为优先考虑之对象。经理事会提议，经他本人和监护人许可，可将他们送往马六甲、印度、欧洲和美国去继续

关系就从 8 月 16 日起中断。律劳卑派人印行张贴一份中文声明，引起中国官员的注意。与外国人有关的中国人——特别是与马礼逊有关的那几个中国人——被政府密切关注。在此危险时期，恰值广州举行三年一次的乡试，梁发带着书籍到试场散发资料。政府逮捕了梁发。梁发向裨治文求助。最后，马儒翰付了八百元的巨款，赎回梁发等人，裨治文带梁发和他的儿子梁进德到一只开往伶仃岛的快船。后来梁发和他儿子坐船从伶仃岛去了新加坡。见麦沾恩著，朱心然译《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师》，页 100。

^① 麦沾恩著，朱心然译《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师》，页 110—111。

^② 麦沾恩著，朱心然译《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师》，页 118。

^③ *Bridgman to Anderson, Canton, Jan. 19, 1833, ABCFM, reel 233. cited by Lazich, ibid. p.76.*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373-381.*

^⑤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375.*

^⑥ *Chinese Repository, vol.5.p.376.*

^⑦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375.*

完成他们的全部学业。^①

裨治文则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他说：

教育肯定可以在道德、社会、国民性方面，比在同一时期内任何陆海军力量，比最繁华的商业刺激，比任何其他一切手段的联合行动，都会产生更为巨大的变化……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各部门作出改进的前景，几乎是无止境的……按照中国的俗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旦开始，就必须继续干下去。这样做，教育就会得到推广。如此，整个中国人将会受益，我们的事业最终也会成功。^②

从上述言语中，可以看出裨治文在中国推广教育的决心。

在马礼逊教育会建立起自己的学校之前，裨治文已经着手调查中国的教育情况，特别是初等教育，作为举办教育活动之参考。他们在广州附近所调查的内容分为 18 个项目：人口、社会阶层、男女比例、学校种类、男性识字率、女性识字率、儿童入学年龄、蒙学读物、教学法、儿童学习年限、每日学习时间、学校状况、学生人数、教师素质、教师薪金、考试、奖赏、惩罚。通过调查，他们获得了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③

另外，马礼逊教育会还向郭实猎夫人（Mary Gutzlaff）的私塾提供每年 312 元的资助。^④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曾写道：

古夫人所设塾本专教女生，其附设男塾，不过为马礼逊学校（Morrison School）之预备耳。马礼逊学校发起于 1835 年，至 1839 年成立。未成立时，以生徒附属古夫人塾中，酌拨该校经费，以资不助，是予本马礼逊学校学生而寄生于此者。^⑤

文中“古夫人”即郭实猎夫人，其中酌拨经费的应是马礼逊教育会，而非马礼逊学校。裨治文在郭夫人女塾开办前，曾前去拜访，相当满意书塾的配置。^⑥

马礼逊教育会成立后，裨治文等人立即向美国耶鲁大学致信，希望能“立即有一名教师，这位英文教师应该既年轻又有才华，能尽心尽力为教育传教事业工作的人”。同时致函设在伦敦的“英国和海外学校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希望从英国招教员到中国担任助手。

在裨治文的呼吁下，耶鲁大学推荐了该校毕业生布朗（Samuel R. Brown）来中国办学。1838 年 10 月，布朗偕夫人乘美国商船“马礼逊号”前来中国，次年 2 月到达澳门。

在裨治文等人的指导下，布朗夫妇在澳门创办起“马礼逊学校”。马礼逊学校刚开始只有六名学生，他们是：容闳、黄胜、李刚、周文、唐杰、黄宽。^⑦其中容闳、黄胜、黄宽三人后来随布朗先生到美国继续学习。容闳后来考入耶鲁大学，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风云人物。黄宽后来进入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学医，是中国第一位留英学生。

马礼逊学校按照当时欧美初级学校的模式和中国学生的特点，拟定教学课程表。学生学习的主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376-377.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 5, p.376, 译文参考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页 33.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p.232-241. 裨治文第一篇关于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在《中国丛报》1835 年 5 月刊号上就已发表。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p.230-232.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页 4。

^⑥ Bridgman to Williams, Macao, Aug.14, 1835, BPBHS. cited by Lazich, *ibid.* p.103.

^⑦ 容闳《西学东渐记》，页 7。

要科目分为三部分：一、基督教教义；二、各种近代西学知识；三、中国汉语。布朗设置别具一格的教学活动，他向理事会汇报时讲到：“我让他们半天读汉语，半天读英语，早上六点开始，晚上九点结束，其中读书八小时，其余三、四小时在露天场地上运动和娱乐……我们勉力待他们如亲生儿子，……简言之，我们是努力使他们感到是在家里一样……”^①

裨治文经常和布朗一起利用教学活动传播基督教。开始他们要求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写作，然后他们多次要求学生以写英文信件的形式比较中学和西学的区别。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就多次刊登这些学生的习作^②。

1842年鸦片战争后，马礼逊学校迁往香港，学生逐渐发展到三四十人。学校的课程渐趋正规，除中文课外，西学课还有英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音乐等。学校除了汉语课由中国先生任教外，其他各门课基本由布朗夫妇任教，采用英语教学。偶尔有几位在香港的美国人到学校短期兼课。学生经过三、四年学习之后，除熟悉中文外，对英语的读、写、听、讲和翻译，都有相当的基础，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有大概的了解，对数学、机械原理知识，也略知一二，同时还接受了基督教教义的灌输。1845年另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威廉·咩士（William Macy）来中国，协助布朗夫妇的教务工作。1847年布朗夫妇因健康原因回国，留下咩士坚持到1850年，最终因经费拮据而关闭。

马礼逊学校虽然从创办到结束不过前后11年，但是受它的影响，一些美国传教士也相继在中国开展教育传教活动。如第一个来华的美国女传教士叔未夫人（Mrs. Shuck）在香港创办学校，免费招收学生，不到三年学生人数就达26人。^③

马礼逊学校，在客观上冲击了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容闳、黄宽、黄胜等人都出自该校，多有贡献于晚清社会；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办，1872年容闳带领中国幼童留学美国等无疑是受到马礼逊教育会的影响。香港学者李志刚把中国幼童留学计划说成是“马礼逊教育协会工作之延续”。^④其影响与成就，在近代史中有肯定性的地位。马礼逊教育协会设立的图书馆，其中不少书籍，现存香港大学孔安道图书馆“马礼逊特藏”（Morrison Collection），以供学人研究参考。^⑤“马礼逊教育学会”所遗留的基金，在香港皇仁书院仍有“马礼逊奖学金”（Morrison Scholarships）颁发，奖励优秀学生。^⑥

马礼逊学校另有一个比较隐晦不显但非常重要的影响，即一部分中国人对西方人的印象有所改观，间接地为后来中国的教会学校铺下坦途。学校初成立时，人们不愿送其子弟入学。许多人均预料一旦入学必有恶果。其中一位家长于初送其子入学时，对布朗先生说：“我们不了解何以外国人愿意免费教养我们的儿女，却丝毫不要报酬。我们认为背后肯定存心不良。可能时先使他们与父母隔离，然后再偷偷运往他国。”^⑦但后来就逐渐改变。布朗先生在马礼逊教育会第七次周年报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15, p.608.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p.502, vol.11, p.339-340, vol.14, p.501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p.21

^④ 李志刚《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牧师与早期中美关系》，页3。

^⑤ Dorothea Scott, *The Morrison Library and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in the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1960-1961, Vol. 1, p.50-67. 转引自李志刚《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牧师与中美早期关系》，页45。

^⑥ Gwenneth & John Stokes, *Queen's College Its History 1862-1987*/(Hong Kong, Queen's College Old Boys Association, 1987) p.16,229,386. 转引自李志刚《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牧师与中美早期关系》，页45。

^⑦ *Chinese Repository*, vol.14, p.473-474.

告中提及这位父亲跟他说：“现在我明白了，我有三个儿子在贵校攻读，并未出问题。长子已经可以作译员谋生，另外两个也学得很好。最使我担心的宗教训练，却使他们品性更加良好。……我从此不再怀疑你们了。”^①

裨治文作为马礼逊教育协会的创办者和重要成员，功不可没。

第四节 裨治文与“益智会”

马礼逊和裨治文等新教传教士在广州所经历的隐居日子，使他们对中国官方直至民间的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自大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郭实猎的一段话基本可以代表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对中国人“天朝上国”观念的了解。郭实猎说：

尽管我们和他们（指中国人）有长期的交往，他们仍然公然表示是高于其他国家而位居世界第一，并视其他民族为“蛮夷”。这种无知与自傲严重影响了旅居广州的外国人的利益，妨碍了他们与中国人之交往。^②

可见，裨治文等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强烈地感受到了中国人看不起外国人的心态。为了促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工艺、科学及基本信条，改变中国人高傲和排外的观念，裨治文等人创设了“益智会”。

“益智会”，即“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的简称，是裨治文等广州外侨在1834年11月发起的组织。

11月29日，益智会的筹办会议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以英国商人孖地臣（James Mathson）为会长，裨治文和郭实猎为中文秘书，马儒翰为英文秘书，英国商务监督德庇时和驻广州各国领事为名誉会员。在以后的几年，查顿、特纳（R. Turner）、格林（John C. Green）先后任会长，孖地臣等任司库，委员也多有变更，但裨治文一直与郭实猎一起担任中文秘书。

顾名思义，“实用知识传播会”的目的就是要向中国人传播“实用”的知识，以帮助中国取得知识进步和社会进步，将西方近代科学文明作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介绍给中国人。裨治文认为通过向中国人传授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可以使中国人的产品质量提高，从而使“他们和我们共同得益”。^③裨治文自称“益智会”是站在“光明与黑暗两大地区”之间。

根据章程，“益智会”在中国的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出版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书刊。

裨治文等人认为要确定优先向中国人介绍什么知识，必须先弄清中国人目前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历史和地理书。因为这个如此排外的民族，所具有的人类历史和世界地理的观念是非常混乱和不准确的，因此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是占有优先位置的。^④

但是裨治文在“益智会”的第一次年会上，作报告称，“本会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版过一本书给中国人看”。

在1837年3月10日第二次年度报告中，裨治文代表“益智会”的委员会，开列了一份该会准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14, p.474.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186-187.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508.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p.335.

备出版的详细书目，包括历史、地理、哲学、神学、医学、力学、机械工艺以及回忆录和生活轶事等方面。裨治文认为，其中以历史、地理和自然史最为重要。^①

益智会在以后几年还不断提出一些出版计划，但是这些计划大都未见完成。益智会曾在第二届年会报告中分析出版计划未能实现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政府不友好态度”，导致印刷和出版工作无法正常工作；二是缺少能用中文编写书刊的西方人。^②但是益智会还是出版了一部分中文书籍，包括郭实猎的《古今万国纲鉴》、《万国地理全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广州方言中文文选》，以及后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等。裨治文和郭实猎几乎包揽了益智会的所有编著，他们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其中裨治文的作用更为明显。

裨治文编著的《广州方言中文文选》(*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正是在“益智会”斥资下出版。

裨治文的《广州方言中文文选》类似于中文词典。出于学习语言的需要，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编撰了各种中文词典。马礼逊曾在1815至1823年间在澳门陆续出版其编撰之《华英字典》，1828年还出版了《广东省土话字汇》；麦都思曾于1837年在澳门出版《福建省土话词典》；1838年戴耶尔出版了《福建省土话字汇》。据统计，在1849年之前，在华新教传教士编写的中西文词典和中文词汇对话方面的书籍共有17种。^③

裨治文出版《广州方言中文文选》的目的基本与益智会的宗旨吻合。他在导论中谈及此书有双重目的：

向欧洲人提供与中国人进行个人交往的工具，并在中国人中传播英语知识。^④

也就是说，要促进外国人与中国人之关系，便于友好交往。从实际情况看，前者体现得比较明显。

《广州方言中文文选》除导论外，有17章，共698页，收录的内容包括日常使用的各类对话、句子和字词等，涉及各行业、各阶层、各学科。17章具体类别如下：中文学习、人体、亲属关系、人民分类、日常生活事务、商务、技术事务、建筑学、农业、文学、数学、地理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医学和政府事务等。每章又有细分。比如最后的“政治事务”，有关清朝律例、皇帝、内阁、军机处、六部、理藩院等的内容都有涉及，并列出了462种官衔的英译名称。

裨治文在导论部分介绍了中国的语言文化，这是裨治文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重要学术内容，也是该书一大特点。裨治文向读者介绍广州方言的特征、汉字的注音问题，中文语法问题，按经、史、子、集的顺序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选出165种中国著作目录，以供学习参考，并向读者介绍学习方法。

《广州方言中文文选》分三栏编排，左边为英文句子和段落；中间为这些句子和段落的汉译，依广州方言译成，为便于西方人阅读，汉字全由左至右排印；右边一栏则用罗马字将广州话的发音拼出；每页下端附有注释。

《广州方言中文文选》之编排形式及内容不但有助于欧美人士学习中国语言，更有助于他们从中认识中国文化。该书对于需要在广东与中国人打交道，而又没有时间深入地研究中文和当地语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510-512.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509-512.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8, p.402-408.

^④ 《广州方言中文文选》导论，页1。

言的外国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书。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当时“美国人选写有关中国文化最具系统之书籍”。^①

须提及的是，《广州方言中文文选》并非裨氏独立著作，马儒翰和卫三畏等人亦对此书之编写、出版耗费较多心血。^②

在《广州方言中文文选》出版之年，美国纽约大学授予裨治文神学博士学位，^③表扬其在学术上的成就。

第五节 裨治文与“中国医药传道会”

为了改变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观念，有利于福音的传播，裨治文还和其他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发起组织了另外一个重要团体——“中国医药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医药传教，是裨治文等人在华的重要传教手段之一。

医药传教的手段也源于马礼逊。早在 1820 年，马礼逊就曾和东印度公司的李文斯顿（Doctor Livingston）在澳门向中国人发放药品。东印度公司的郭雷枢医生 1827 年在澳门设立一所药房，1828 年起还开办了一家较小的眼科医院，四年时间里病人数高达四千多人次。^④

受他们的影响，广州的传教士也设立了一家药房，向居住在广州的中国人发放药品。裨治文对此作过详细的描述，“每天一早，就会看到生病、瞎眼和瘸腿的男女老少挤在药房门口；还有无助的孩子抱在佣人的怀里——按照风俗，更确切地说是捆在年轻仆人的背上；瞎眼的老人拄着拐杖，由小孙子牵着过来；而条件较好的人，就坐着轿子米”。^⑤裨治文为这种状况感到欣喜和惊讶，他认为通过医务活动会有利于传教。^⑥因此裨治文极力建议美部会派遣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来广州建立一家传教士诊所。他在 1833 年 12 月 26 日写给美部会的信中提道：

参考《中国丛报》10 月份的报告，你就会知道这里需要医生。我在前面几封信中已经讲到过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广州能有这样一个人……当他治疗病人时，将会发现有大量散发小册子的机会。^⑦

裨治文的愿望最终得到实现，1834 年 10 月 26 日，伯驾医生^⑧（Dr. Peter Parker）搭乘奥立芬公司的“马礼逊号”（Morrison）船来到中国。1835 年 11 月 4 日，伯驾的“广州眼科医院”，在奥立芬的资助下开业。这个事件标志着以行医治病为主要手段的“医药传教”方法的正式确立，伯驾是使用这种方法的第一人。^⑨

伯驾医院以广州地区的下层群众为主要对象（后来其病人的来源有所扩大，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各个阶层），伯驾受过正规医学教育，拥有丰富的医学专业知识，这使他的医院在其开初阶段即获

^① 李志刚《美国第一位来华教士裨治文牧师与中美早期关系》，页 36。

^② 《广州中文文选》前言；Frederick Williams,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105.

^③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68.

^④ S. W.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p.344.

^⑤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p.276 (Oct., 1833).

^⑥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p.277.

^⑦ Bridgman to Anderson, Canton, Dec.26, 1833, ABCFM, reel 256, cited by Lazich, *ibid.* p.107.

^⑧ 伯驾，毕业于耶鲁大学的神学医学院，1834 年 5 月被授予圣职。

^⑨ William Lockhart,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p.122.

得很大成功，《中国丛报》报道说：“在六个星期的事件内，我们看到有 450 名病人得到了一个外国人的医治。”^①伯驾在广州的外侨和中国人中，一下子就名声鹊起。

裨治文很高兴伯驾在中国的成功，因此，他鼓励美部会派遣更多有医学技能的人来中国，认为他们的到来，能给广州居民提供有益的服务，从而提高传教士的声誉，为传播福音提供更多的机会。他说：

医院不仅能治愈病体，从而展现“蛮夷”的技术和善良，而且能有大量绝好的机会为有精神疾病的人服务。我们认为，应该采取措施让这种机构永远存在。^②

所以 1836 年裨治文和伯驾同郭雷枢医生共同倡议在广州成立医药传道会，呼吁各国派医药传教士到中国服务，借医务工作进入中国社会传教。^③

1838 年 2 月，中国医药传道会成立，郭雷枢任会长，裨治文、伯驾、查顿、因义士等人任副会长。裨治文与郭雷枢、伯驾一道起草并发表一份关于医药传道会的宗旨和规则，宣布该组织的宗旨是：

通过为中国人治病，向他们传授医学知识和上帝的福音，使他们消除长期存在的偏见和民族排斥情绪，使他们认识到他们所仇视的人有能力并且愿意帮助他们摆脱苦难。^④

可见，裨治文等人做医务工作的目的，还是为了消除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偏见，从而接受西方的基督教教义。

中国医药传道会成立后，为扩展欧美各地联系，又在美国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英国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地设立代理，至五月，已筹得 9366.75 美元作为开办费。^⑤

1838 年 4 月 24 日医药传道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在修葺广州眼科医院的几个月期间，让伯驾到澳门开一所医院。其时，郭雷枢医生因为个人原因被迫离开澳门，所以他建立的诊所暂时没有医生。在费心获得郭雷枢医生的房子中，裨治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837 年 8 月，他亲自到澳门去收购房子。^⑥1838 年 7 月 5 日，伯驾医生又在同一所房子重新开业。在伯驾开业 3 个月间，病人高达 700 人次，大多数以眼科为主。当伯驾回到广州时，由于没有合格的医生代替他，诊所不得已于 10 月关闭。

医药传道会在 1838 年 11 月召开了首次年度会议，1839 年后随着中英关系的不断紧张，该会活动一度中断。但鸦片战争期间，裨治文和伯驾等在华传教士仍力图维持该会事务。在裨治文的主持下，第二次年度会议于 1841 年 7 月在澳门举行，会议继续选举郭雷枢为会长，伯驾、裨治文等 10 人为副会长。^⑦

在医药传道会主办下，伯驾的广州眼科医院维持了好几年，它的病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给传教士提供了大量与中国人接触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敌视与偏见，也给后来的中美谈判带来便利，这是后话。

裨治文等人倡办的广州眼科医院，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西方医学院，孙中山曾就读该院，其后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p.386.

^② Bridgman to Anderson, Canton, May 2, 1836, cited by Lazich, *ibid.* p.108.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372, Dec.1836.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 7, p.32-44.

^⑤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p.32-35.

^⑥ *Bridgman Journal*, August 28, 1837, cited Lazich, *ibid.* p.109.

^⑦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448-453.

数度合并成为中山医学院。^①

由于医药传教比散发宗教小册子和在民众中直接布道更为显著,欧美各教会组织十分重视派遣传教医生来华工作,及至五口通商,医药传道会所属医生均在各地设立医院,如,玛高温(Daniel J. McGowan)、卡明(W. H. Cumming)在厦门,海茨博格(H. J. Hischberg)在香港。对于传教士创办的西式医院对中国的重要性,大家不难认识。陈邦贤谈及新教传教士开设的医院时说:

各医院之功绩不独为人治愈疾病,减少死亡率,而且训练甚多中国助手,翻译传布西国医学知识于中国,其功亦不少也。^②

而医药传道会向这些传教士开设的医院和药房提供资助。可以说,中国近代医院之发展,与中国医药传道会有直接联系。而裨治文在医药传道会的形成、组织中,起着主要的作用,犹如他对马礼逊教育会一样。

裨治文等人在教育、出版、医药等方面的活动,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用传教士自己的话说:

不仅使中国人同外国人更加广泛地友好交往,而且传播欧美的艺术和科学,最后向他们宣扬上帝的救世福音,消除盘绕在他们脑子里的迷信思想。^③

^① 高沂《中国高等学校简介》,页506-508。

^② 陈邦贤《中国医学史》,页189-190。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13, p.649.

第二章 裨治文与鸦片战争

裨治文在华三十余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时期。从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就活跃于中美外交舞台上，而他和其他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讨论影响了美国人对鸦片战争的态度。本章主要讨论裨治文对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的态度，以及裨治文在中美《望厦条约》中的作用。

第一节 对鸦片贸易的批判

在 1733 年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与船员就经常带鸦片到中国出售。^①作为传教士，除郭实猎外，裨治文等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基本上对罪恶的鸦片贸易持否定态度。他们从人类道德和基督教伦理的立场出发加以抨击和反对，裨治文则是其中的中坚分子。

裨治文充分利用其主编的《中国丛报》这一舆论工具，对鸦片问题进行讨论。据有的学者统计，从 1836 年到 1840 年，即中国的禁烟问题最突出的几年里，《中国丛报》发表了 48 篇有关鸦片问题的专题文章，^②此外还有大量的消息报道。裨治文作为《中国丛报》的主要作者，参考多种资料，包括西文书籍、私人手稿、奏折等，写了十几篇文章，并翻译了大量相关官方文件。这些文字几乎囊括了有关鸦片的一切文章，包括鸦片的种植和分布、对鸦片贸易的历史与现状、中国政府的鸦片政策和禁烟动态的评论和报道，以及对中国重要的禁烟文件的翻译，对鸦片贸易的道德性的评价等等。

早在 1836 年，裨治文就在《中国丛报》上发起关于鸦片贸易的是非问题的讨论，更于 1837 年 1 月在《中国丛报》上刊登启事，以一百英镑为奖金，征求有关鸦片贸易的最佳论文。^③要求该论文表明它在商务上的效果，民族和个人与之有关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利益，并指出他们应该采取的关于鸦片贸易的方针。由于一直没有获得非常满意的文章，评委会一直无法评出优胜者。裨治文作为编辑，积极应对此事，先后四次专门刊登启事，将征稿的期限向后推延，以求获得满意的文章。最后延期至 1841 年 1 月。^④

裨治文等传教士大量报道了鸦片贸易造成的悲惨后果，并大声疾呼反对鸦片毒害。裨治文说：

鸦片这个贸易，对我们来说，从来就好像是一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体面的人们也从事这种勾当时，我们的感情确实是惊奇与悲伤交集。^⑤

裨治文认为鸦片贸易是不道德的。他说，“英国号称为开明的基督教国家，竟然种植一种罪恶的媒介物，甚至以此牟利；中国是黑暗的、异教的国家，但她不屑以鸦片的收入来充实她的国库。这真是最奇怪的道德对比的一个展览”。他说，鸦片贸易对于基督教而言，是“伤风败俗的诱惑”。

⑥

^① 龚缨晏《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页 182。

^② 吴义雄《在宗教和世俗之间》，页 237。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413; p.573; vol.7, p.173-174; vol.8, p.310.

^⑤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120.

^⑥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1-9. (1839 年 5 月)

裨治文把鸦片贸易称为一场“充满罪恶的过程”。他说：

我们非常痛心听到，有些人极力图谋恢复鸦片贸易，……鸦片走私长此下去，必然成为戕生、荡产、败德的罪恶根源。……（吸食鸦片）不但造成生活中的不幸，而且带给受害者无穷无尽的灾祸。^①

裨治文认为这个道德上的重大问题，“应受到最密切的关注”。他说：“酗酒之害，现在引起西方严重注意。吸食鸦片，其害尤大，在中国看来还要人多几倍。”^②

裨治文还深入分析鸦片贸易之所以如此猖獗主要有三个原因。他认为“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在政治和商业关系中的不道德”是鸦片贸易的起源及迅速发展的第一个原因。^③

其次，是外国人不相信清帝国政府禁止此项贸易的愿望的真诚。他说：

三十九年前第一次禁烟，帝国政府就诚意表明要防止当时已经发现正在流行的恶习……但随后事实逐渐加以证明，恶习依然存在，仍在流布，于是颁发新告示，制定新法律……我们也不否认，帝国政府对这些官吏的行为是应负有一部分责任的……如果说，这些低级官吏受贿是不忠于职守，那么，对那些行贿者的行为，又当如何解释呢？如果一些律例禁令，分明是不公正的，那么，外人可以坚持基督教的道德原则，提出抗议。如果他怀疑帝国立法官的意图，那他也可以自行其是，而视帝国的布告等于空文。^④

第三个主要原因是西方政府对此间局势的发展无动于衷。裨治文评论道：

……一些西方国家……还没有作出适当的努力去建立一个高尚的外交可以依靠的基础，即高尚的、无可指责的道德品格基础。在中国人的眼里，我们的品格是下流的……现在省城没有外国国旗飘扬，外国政府的代理机构也没有一个悬挂国旗。西方各国的领事法规和领事惯例显然重视维护他们的国旗不受侮辱，而私人的越轨行为，则让私人去负责。但不幸的是，这些法规运用到中国事务上来，至今都是所有罪责归咎于西方政府。无怪乎有些代表不满意于他们所负的职务。令我们诧异的是，他们不立刻辞去委任，辞去所有职务，直至他们能在于己于国都体面的局面下才履行公职。如果西方政府要求他们的代表执行极可能招致公愤的方针和包庇个别不法分子的罪行，那么，从开始到现在，采取上述的做法，是再聪明不过的选择了。^⑤

裨治文认为，自禁止鸦片以来，鸦片贸易之所以仍能在中国人行其道，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地方官的庇护。他写到：

有些人员监视每箱鸦片的交接，从中受过箱费；而有些人则远离走私现场，听任禁令不行，私贩猖獗，从而每年收受包庇走私的贿赂……受贿的不单是衙门中低级官吏，而且有蓝顶的高级官员，甚至红顶的水师提督。总督对鸦片走私，不能说是一无所知……^⑥

裨治文等传教士还纷纷著文讨论吸食鸦片的危害。裨治文用文字展现了鸦片吸食者从健康富足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1-9. (1839年5月)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1-9. (1839年5月)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1-9. (1839年5月)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1-9. (1839年5月)

^⑤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1-9. (1839年5月)

^⑥ *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546-553.

的日子变成穷困潦倒的生活，^①以示抗议使用鸦片。他说：

吸烟祸害的帷幕只拉开一些，暴露出来的毒害就使人触目惊心了。然而，我们不得不相信，暴露出来的不及真相的二分之一，不，其实不及千分之一。^②

裨氏等人的观点和他们关于鸦片贸易种种弊害的报告，无论是对美国社会舆论，还是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们的报告对于美国人民的深厚宗教意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何况那时美国人又正处于大规模禁酒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美国舆论几乎一致指责英国用武力为后盾把鸦片输入中国，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曾于1841年12月发表同情英国的演说，他说：

中华帝国的基本政策是反对商务。……它闭关自守，拒绝与他国有商业交往。它不予他国平等地位，不承认其独立，自以为地球中心之天朝上国，而视其他各国为蛮夷藩属……我认为这才是中英两国政府间真正的争执所在。一般人以为英国进口若干箱鸦片，被中国以其违法而缉获遂引起战争的说法，我认为是错误的。这不过是一桩偶发事件，但不是战争的原因，正如同将茶叶投入波士顿海湾不是美国革命的原因一样。真正战争的原因是为了叩头（kotow）。^③

亚当斯的演讲引起全国舆论强烈的指责。《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的编辑认为这篇演说立论荒谬，竟拒绝将之刊登于该杂志上。^④

至于美国政府的公开政策，则反映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上。^⑤《望厦条约》明确规定鸦片为违禁品。条约第三十三款规定：

合众国民人凡有……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合众国官民均不得稍有袒护。若别国船只冒合众国旗号做不法贸易者，合众国自应设法禁止。

这项条款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参与中美谈判的裨治文等传教士的功劳。

第二节 支持林则徐禁烟运动

1839年林则徐到广州禁烟后，广州对外贸易局势随之逐渐紧张。《中国丛报》对此连续跟踪报道。裨治文本人则以“鸦片贸易危机”为主题在《中国丛报》上连续刊登文章，翻译相关官方文件等。^⑥

林则徐在3月10日开始采取行动，发出谕帖两道，给各国夷人，说明通商之利，贩烟之罪，例禁之严，私贩无望，饬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不得丝毫藏匿，并须“出具”夷字、汉字合同具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7, p.391. (1838年11月)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8.p.1-9. (1839年5月)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11,p.281.

^④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页94。

^⑤ 美国政府在任命列卫廉为全权公使时，又重申了它反对鸦片贸易的政策，训令列卫廉支持中国的政策并重申《望厦条约》中所载的反对鸦片的条款。列卫廉到达中国时，由于本国政府的训令和本人的见解，已经预存反对鸦片贸易解禁之心。但是，经过实地研究了这项贸易的一般情况以及在走私、违法、管理贿赂基础上进行的这种特殊贸易的种种弊端之后，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在他与中国官吏的会议中，他发现他的建议竟引起任何反应；因而，他就得出了一项结论，认为中国人想从鸦片贸易中取得税收的愿望比查禁的愿望更加强烈。1858年6月在天津，他有意从他所签的条约中删除了望厦条约所订查禁鸦片的条款。【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页199】

^⑥ *Chinese Repository*, vol.7.p.609(1839年4月); p.12-37 (1839年5月); p. 57-83. (1839年7月)。

结，保证“嗣后来船永远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声称法在必行，“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另一道给行商，历数他们勾结夷人，欺蒙官府的罪行，责令于三日内，将上述二事——缴烟、具结办到，否则即“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第二天粤海关监督布告，禁止省城夷人下澳，以待钦差大臣查办。到5月份，清廷共缴获英美鸦片走私贩二万余箱鸦片。

1839年6月15日，林则徐在虎门销烟。裨治文和美国商人查理·金夫妇以及弁逊（Benson）被林则徐邀请观看，这在林则徐的一篇奏章中可以得知，文中称：

……并有咪喇坚国之夷商别治文、弁逊等，携带眷口，由澳门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师提标游击羊英科递禀，求许入棚瞻视。臣等先行钦奉谕旨：准令在粤夷人，共见其闻，咸知震聩，曾经出使晓谕，是以该夷等遵谕前来，且查夷商经等，平系做正经买卖，不贩卖鸦片，人所共知。因准派员带赴池旁，使其看明切土授拦及撒盐燃灰诸法，该夷人等咸知一一点头，且时时掩鼻，旋至臣等厂前，摘帽敛手，似以表其畏服之诚，当令通事传谕该夷等，以现在天朝禁绝鸦片，新例极严，不但尔等素不贩卖之人永不可夹带，更须传谕各国夷人，从此作正经贸易，获利无穷，万不可冒禁营私，自投法网。该夷人等倾耳敬听，俯首输诚，察其情形，颇知倾心向化。随即公同赏给食物，欢欣只领而去。^①

裨治文之所以能被林则徐邀请观看，可能是由于裨治文的学生梁进德被聘为林则徐的译员，从而使林则徐对裨治文主张禁烟言论有些认识。因此林则徐在广州期间与裨治文接触较与其他传教士为多。

林则徐曾遣梁进德往澳门请裨治文送信给义律（Captain Elliot），裨治文要求在知道信件内容的前提下才做信使，遭拒，裨治文也拒绝做普通邮差。林则徐随后同意写信，但当裨氏准备离开时，信件尚未写好，故此信最终没有发出。^②此事说明林则徐想通过裨治文与义律接触。

林则徐还请裨治文代呈递照会英王，嘱禁英人制造鸦片及贩卖鸦片，虽为裨治文婉拒，但该照会被裨治文译载于《中国丛报》。^③

1839年9月，林则徐致函裨治文，约裨治文到虎门口，会见其代表。裨治文于9月11日到镇口会晤钦差大臣的代表，但没有公布谈话内容。^④

裨治文参观销烟现场后，“有撰为夷文数千言，以纪其事者。大意为天朝法令，足服人心”。^⑤其“夷文”就是指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写的关于这次观察的极为详尽的报告。报告前半部分讲检查销烟的情况，后半部分描述了林则徐接见他们的经过。^⑥在参观中，裨治文发现，“他们在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加忠实的了”。

^①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页18-19。

^② Frederick Wells, William, *The Life and Labors of Samuel, W. W., LL.D,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p.115.

^③ *The Chinese Repository*, Vol. VIII, p.9-12.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270

^⑤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四，页19。

^⑥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75-77.

第三节 对鸦片战争的态度

裨治文虽然强烈反对鸦片贸易，但是笔者发现他对鸦片战争，却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从裨治文当时的言行来看，他希望中国战败，相信战败后的中国一定会开放；可是从基督教道德出发，裨治文又不希望用流血的方式解决。

裨氏在与林则徐等人的交往中，流露出希望能尽力避免战争。1840年初，裨治文在《中国丛报》记载：

在去年六月和九月两次访问镇口时，对或许会发生战争，曾作为会谈的一个题目。我们方极力主张，目前存在的纠葛，不应当导致这样一个结果……每次争论都常常给我们反复地回答说：打仗不怕！打仗不怕！当我们亲眼看到他们显然准备孤注一掷于“战争的运气”，令我们很是痛心。^①

裨治文也不主张欧洲人到中国来占领土地，他表示“不希望看到中国的人民沦于外国人的统治，相反，我们乐于看到他们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幸福”。^②

但在禁教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夹缝中，传教士推广福音的工作收效甚微。因此，裨治文等传教士一方面强烈地谴责鸦片贸易，并不断报道“鸦片贸易的种种弊害”，一方面又希望采取武力，使中国能尽早向他们这些西方人“开放”。

裨治文认为使中国“开放”的方式有二：一是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二是西方各国联合起来。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上刊登不少关于如何使中国“开放”的文章。裨治文的态度可以从他为这些文章所作的编者按语中清楚地了解到。

早在1834年12月，广州的全体英侨呈英国国王书，要求派军队和军舰来华，强迫清政府签订条约，裨治文对此发表评论说：“我们衷心希望他们能达到他们所提出的全部要求。”^③

一个月后，裨治文又说：“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的交往。”裨治文提出英、法、美联合起来“打开并建立能在良好的规则下与中国自由交往，而外国人能受尊重”。^④

1836年2月，美国商人查理·金在《中国丛报》上发表题为《与中国人订立条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对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进行了抨击，主张使用武力与中国订立条约。该文写道：

……对于这样一个目空一切、独断独裁、半开化的政府，如果我们要依照基督教国家所惯用的规则，去把那些横加在我们和中国人交往的路上的障碍撤除的话，我们真不知要怎么办才好。就中国政府来说，我们越向它表示要亲善，他们却毫无例外地越看不起我们。和天朝有过交往的外国人，都曾被这样地幻想迷惑过。欣慰的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唯一的受骗者而已……我们不能通过词谦语卑的禀帖而取得什么；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文明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发生效力的。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8, p.444. 译文参考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页38-39。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6, p.390.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p.345-363.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p.418.

裨治文为该文写了编者按语：

我们完全同意我们的通讯员所说的，“我们还要学习应该怎样来对待”一个高傲的、半开化的、专制的中国政府的这句话，不过我们仍以为西方的国家，大不列颠、法兰西、美利坚以及其他等国，用不着再事迁延，而应该立即与中国开辟一条友好交往的坦途……我们是主张强有力的和有决定性的办法的……^①

1837年6月，《中国丛报》又刊登查理·金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美国在东亚设立领事馆的计划纲要”，裨治文文后作按语：

我们认为，我们的记者所提出的建立领事馆的意见是可行和理想的，对于维护和平和保障国际权益也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们诚心希望它能被立即实施。假若美国国会能派几艘最好的船远涉南太平洋，到这些东方水域考察，他们也会为建立有效率的领事馆而备受鼓舞。对执行这样的计划再也不应耽搁拖延了，美国荣誉和利益之所在，以及它对别国和别国人民的义务都要求它作如此之一举……

在裨治文等传教士看来，中国人违背了“爱邻人如爱己”的戒律：它自命为地球上的水陆中心，至尊主体；它将与之发生任何关系的国家一律视为其专制君主奉命维谨、纳贡称臣的外夷。因此，各国义务说服中国人履行其权力和义务。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有时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难以说服。说而不服，惟有征服，对此，裨治文有一段颇为精彩的的论述。他说：

国与国之间是互相负有义务的。而中国，在她与别国的关系上，是公然触犯要爱你的邻居如同爱自己这条法则的。中国这种态度，各国可以而且必须劝谏她，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去那里和她的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②

在中外局势紧张之际，裨治文极力主张西方各国联合起来解决危机。他说：

我们应当有一个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已经到来，它的标志就是，努力以西方世界联合起来的道德力量，用不可抗拒的压力，去冲破长期以来把中国和最文明最和平的基督教各国隔绝开来的高墙。……过去所作改善与中国交往的努力，其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这种努力是各图私利，他们没有依照国际公理与正义的普遍原则。欧洲各国使节，是单独争夺利益的代表。由一个各国组成的联合使团，进行对华贸易，就会呈现一个不同的面貌。它就不再是谋求狭隘利益的分裂的一组。这是西方世界对付中国，也是为了中国最好的办法。^③

鸦片战争爆发后，裨治文等传教士欢欣鼓舞，他们充满激情地欢呼到：

千百万……异教徒中间创办……传教事业，现在只有一个障碍了，而那个障碍是政治性质的，它可能在一天之内被除去。^④

倪维思明确无误地指出，“不管这场战争正当不正当，它是按照上帝的意志被用来开辟我们这个巨大的帝国关系的新纪元”。^⑤美国传教士雅裨理认为，鸦片战争是“上帝用来打开中国大门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4, p.449. (1836年2月)

^② *Chinese Repository*, vol.3, p.363.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8.p.1-9. (1839年5月)

^④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页115。

^⑤ J.W. Foster, *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Orient*, p.73.转引自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页122-123。

的手段”，他说：

必须派遣传教士到中华帝国，进入每一个可以进得去得地方，包括中国沿海每一个可以通商的市场。海岸必须侵入，海港必须进去，这是因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受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所驱使，这一条必须搜寻出来，每一个可以据守的阵地必须占领。^①

裨治文则说：“对（基督教）完全信仰自由迟早就要到来了。”^②他花费大量的精力关注这场战争。他在《中国丛报》上迅疾报道战况，和交涉的全过程，而且还编撰了每月大事记。他认为鸦片战争的结局将是英国打败中国，中国将向外国开放。他说：

我们正处在新时代的前夕，一场伟大的革命开始了。我们长时间地哀叹身边的荒凉，因为福音才是唯一的补救物。但是，现在，上帝已经开辟了一条能够传播福音的大道。^③

出于基督教道德的约束，裨治文又希望战争不要长时间地拖下去。他在6月25日日记中写道：“我们不希望战争长时间地拖下去。”^④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⑤，战争结束，传教士们欢呼胜利。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以及未来，作了一番评论：

“中央王国”——“天朝上国”——古老的、长时间与外隔绝——现在与地球上其他国家站在一道，与他们组成一个大家庭。

为了使中国更紧密地与“地球上其他国家站在一道”，裨治文不断向美部会、向美国公众呼吁，要求支持和扩大对华传教事业。他在1842年6月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强调，1700万美国人都应该为这个事业效力，“要训练大量有能力的、虔诚的传教士，为此要建立传教会，要开办学校，要设立有关机构，要号召全国所有的教派为此贡献智慧和力量”。他建议要采用一切方式，向中国人传教基督教，“在香港、厦门和舟山，已经可以和千万中国人自由接触；而且我们还相信，传播福音的使者在整个帝国的范围内得到自由和保护，受到衷心欢迎的日子也为期不远了”。^⑥

第四节 参与中美《望厦条约》之签订

裨治文等美国传教士在为英国欢呼胜利的同时，还积极利用中英之间的这场战争，为美国谋取利益。

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曾派海军少将加尼（Com. Kearny），率领两艘军舰到中国。加尼来华的目的有二：一是保护美国侨民生命财产；二为防禁美国船只和他国船只悬挂美国国旗走私鸦片。加尼所统率的“东印度舰队”（East India Squadron）1842年4月到达广州，1843年4月离华，历时一年。期间，熟悉中国事务的裨治文被聘为加尼的翻译和助手。从1842年5月起，“裨治文博士花了两个月的时间，运用他的能力，在黄埔和广州担任中文翻译，帮助加尼司令与广州总督

^① Benson L.Grayson edited: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 p.78-83.

^② *Missionary Herald*, vol.38, p.101. 转引自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页115。

^③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113.

^④ *Missionary Herald*, 1841, p.43, cited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114.

^⑤ 1836年11月，《中国丛报》刊登了格拉斯东印度协会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的一份《备忘录》，其中所提的八条意见，是为成为中英不平等条约的雏形。*Chinese Repository*, vol.5, p.334-336.

^⑥ *Missionary Herald*. vol.39, p.55. cited by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114.

(应指“两广总督”，笔者注) 祈禱谈判”。^①

裨治文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就建议加尼向清廷要求美国人应“同别国商人一样”，凡英国在中国获得的权益，美国亦应一体均沾。^②这是最惠国待遇的最初表现形式，首次写进了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

1843年5月，美国政府决定派出顾盛（Caleb Cushing）使团来华。1844年2月顾盛及其副手韦伯斯特（Fletcher Webster）率使团到达澳门。顾盛聘请裨治文和伯驾担任使团的秘书和翻译，后来又请卫三畏帮办中文函札事宜，裨治文还被推为使团的牧师。在这段时间，裨治文主要是和伯驾一起为顾盛起草和翻译文书，包括翻译《南京条约》中文本的条款，竭力为美国使团出谋划策。

1844年6月16日，顾盛在望厦村与耆英展开谈判，中方有布政使黄恩彤，肇庆府候选主事赵长龄，以及候补道潘仕成三人协助，美方则有伯驾、裨治文等相助。裨治文等人的作用可以从耆英的奏章中得到旁证。耆英上奏谓：

……缘英夷有马礼逊等，虽属狡黠，而粗通汉文汉语，有事可与商议。咪夷止有伯驾、裨治文二人，所识汉字无多，仅能为粤省土语，以致两情难以互通，甚为吃力。^③

从这份奏章中看出，中美双方语言交往有诸多不便，但裨治文和伯驾的作用还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裨治文和伯驾除翻译、起草文件和充当译员之外，还参与谋划。6月19日，耆英要求美国方面提供一个条约的草案。两天后，裨治文和伯驾等人就依照《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的条款草拟出一个中美条约方案。从6月27日起，裨治文等人又和黄恩彤、潘仕成等就条约的文本逐条商讨。^④

裨治文和伯驾都支持顾盛对清政府采取强硬手段，达到签约的目的。谈判期间，伯驾写信给顾盛指出：对于“这样一个傲慢的政府，应当采取正当、正直、无畏和明智的政策。他们显然不愿或者无意和一个外国较量自己的力量”。他还建议美国和法国联合起来，共同要求前往北京，将是对两国有利的策略。^⑤他所谓的“正当”、“正直”、“无畏”和“明智”政策的具体体现就是对中国发动猖狂的攻势，他又考虑美国一国势单力薄，所以主张与法国一致行动。

裨治文也给顾盛写信，促使顾盛立即采取行动。他说：

到月底，你在这里虚度了两个月有余，代理总督既不接见，也不向你慰问。我认为如果中国皇帝不能确保钦差大臣即将前来会晤，你务必在5月1日以前北上。^⑥

在裨治文、伯驾等人的建议下，顾盛“其语意时而恭顺，时而桀骜，情词甚为闪烁”，“动以北驶为挟制之词”。^⑦几经交涉，中美双方终于7月3日签订《望厦条约》。此约除无割地赔款等外，所有中英条约的事项，应有尽有，有些则为英约所无：如领事裁判权适用范围的明确而扩大；关税例则须与美国议允；中国港口官员须负责接待美国兵船；准美国人在五口自建教堂、墓地；条约十二年一修；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等等。

^① *Brie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in China*, p.81.转引自吴义雄，页258。

^② 军机处档，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祈禱单。

^③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二，页3-4。

^④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 118-120.

^⑤ 《伯驾致顾盛》，1844年4月19日；《伯驾致顾盛》，1844年4月20日。《顾盛文件》，转引自《中美关系第一页》页109。

^⑥ 《裨治文致顾盛》，1844年4月19日，《顾盛文件》。转引自《中美关系第一页》，页109。

^⑦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二，页2。

从其中有关“准美国人在五口白建教堂、墓地”的规定中可以确证，在望厦村谈判期间，裨治文、伯驾与卫三畏等三人对顾盛有极大的影响。^①

中美《望厦条约》第十七款规定：

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定地界，听合众国民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内民不得抬价捐勒远人。勿许强租硬占，务要各出情愿，以昭公允……

条约还载有准许外国人购买中国书籍和聘用中文教师的规定。其中第十八款规定：

准合众国官民延请中国各方士民等，教习各方语言，并帮办文墨事件，不论所延请者系何等样人，中国地方官民等均不得稍有阻挠、陷害等情；并准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

这两项规定充分体现了裨治文等美国来华传教士的利益和要求。其中允许“设立礼拜堂”一项无疑打开了清政府的禁教政策的一个缺口，成为后来法国要求天主教弛禁的先导；而允许购买中国书籍和聘用中文教师的规定对于以往在语文上一直感到有很大困难的传教士是特别有价值的，传教士可以通过聘请中国教师、仆役和采买中国书籍，同社会各阶层进行广泛的接触，为他们的传教活动提供相对便利的条件。

裨治文在《望厦条约》签订后，赞叹鸦片战争带来的巨大变化：

中美之间有关和平、敦睦和通商的条约终于签订了……彼此相隔这么遥远的两个国家，一个是东方最大的，一个是西方世界中最大的；一个是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一个是非常非常古老的，她们形成新的，令人瞩目的时代特征。中国政府的行为态度有多大的变化呀！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又有多大的变化呀！在华外国人的环境条件又有多大变化呀！

他评论道：

显然，一场伟大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为此欢欣鼓舞，但不是为了已经发生的那些事情的缘故，而是因为即将发生的一切。很显然，全能的巨手在指引着这些变化，使我们在实践神旨的道路上，可以前进无阻。^②

顾盛在签约后第三天向国内报告。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口气指出《望厦条约》较之中英条约的 16 项目“优点”。当时在华欧美人士亦都公认《望厦条约》对西方人士在华权益的规定，较之《南京条约》不仅详细周密得多，而且新增加了许多权利。正因为如此，《望厦条约》成为中国对法国、挪威和瑞典等欧洲国家订立条约的蓝本。从 1844 年到 1860 年为止，十余年的中外关系的实际发展，几乎完全是受《望厦条约》的规范。^③

顾盛能与清政府签订条约优于英国以战胜国的威力而订立的《南京条约》，其原因有三：第一，适值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于战祸，谈虎色变，不愿轻易起衅端；第二，是英国人对顾盛的帮助；第三，顾盛是律师出身的美国政客，对于谈判与草拟法律文书，白较朴鼎查高明。^④尚需强调的是，顾盛到中国以前，对于中国实际情况，所知虽然不多，他所订的条约之所以能赢得所有当时在华

^①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 127.

^②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 126.

^③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页 132。

^④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页 130。

欧美人士及后世欧美有关史家的一致称赞，裨治文和伯驾两位在华传教士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7月3日中美《望厦条约》签订前，裨治文和伯驾都是美国使团最忙碌的人物。根据古里克（Edward V. Gulick）研究，根据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顾盛文件，裨治文和伯驾所作的翻译工作基本相当。^①谋划条约内容方面，十分熟悉中外关系的裨治文也不会比伯驾的作用小。

裨治文和伯驾在条约谈判中所起的作用，可以从顾盛写给美国国会牧师的一封信中看出，顾盛写道：

事实是，此次和中国的谈判，美国传教士特别是裨治文和伯驾，所提供的服务，若非不可缺少，亦是最重要的。他们具备懂得中国语文的稀有资格，使他们能担任使团的翻译。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详细了解，使他们成为无法估价的顾问。^②

顾盛认为裨治文和伯驾为美国政府作出了“无法估价的服务”，因此向美国政府为裨治文和伯驾请功领赏。事实上，使节与中国政府往来文件的翻译与谈判工作，绝大部分都由裨治文、伯驾和卫三畏等三位传教士负责，长达40年之久。^③因为在《望厦条约》签订后20年（1863），美国政府才允许供给在华各使领馆译员各一名，但并未做到。迟至1899年，所有美国在华使领馆中，共仅专任译员四名。

望厦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1845年6月28日），裨治文和爱莉萨小姐（Miss Eliza Jane Gillett）。两人在香港教堂举行婚礼。^④

还要提及的是，对于《望厦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和美国一样欢欣鼓舞，因为终于阻止美国人北上。

耆英原反对“准许美人在五口地方自行建设礼拜堂以及墓地”一款，美方提出葡萄牙人有澳门，英国人有香港使“生者得以祈福，死者得以藏骸”，而美国人以未请中国“赏地”为理由，逼使耆英不得不答应。只是规定“不得强租硬占，致拂輿情”。^⑤关于允许美国人“延请中国各方士民等，教习各方语言，并帮办文墨事件”，“采买中国各项书籍”一款，与先前不准外国人聘师学习中文、不准购买中国书籍的禁令相悖。耆英在奏折中解释道，他曾“驳斥不准”，但美方坚持不让，考虑到海通已久，谓美商充当“通事”（翻译）者也“粗通文义”，教授中文、采买书刊之情事“恒有”，“久已无从稽察，自不妨如其所请”。^⑥

耆英此奏于7月18日送到北京。

8月15日，穆彰阿率军机大臣、户部、刑部堂官详奏会议情况，对条约各款均表示同意，特别称赞领事裁判权的内容可“杜民夷争端”；只对延请教师、采买书籍表示了同样的忧虑，并提出两项“治内”的稽查办法：

一，应令延请之人，将姓名、年岁、眷属，并呈明该地方官另册存案，方准前赴该夷寓馆。

二，其所购书籍，亦应各书肆另立簿册，将书名部数价值，于买定后，随时登载，年终汇交该

^①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p.122.

^②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130-134.

^③ 丹特涅《美国人在东亚》，页472。

^④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135.

^⑤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二，页17。

^⑥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二，页18。

地方官，呈送督抚查核。穆彰阿认为如此“按籍而稽，可为诘奸察远之一助”。^①

至于美国人设立礼拜堂和圈划墓地，他们认为既然条约规定不许美国人强租硬占。“自可通融照办”。不过“夷俗固然，但事属不经，见闻易惑，愚民喜新厌旧，难免效尤”。指示耆英应该转告各有关巡抚，设法禁止居民学习，使他们知道“夷言之不可效，夷礼之不可行”。在墓地方面，他们强调，地基一经划明，便不得“复以隙地无多，籍词占越”。^②

以上穆彰阿与耆英对于《望厦条约》的评述，可以代表当时大多数人士的见解。

参与谈判、签订条约的耆英、伊礼布、黄恩彤，和参与审核、复议条约的军机大臣、户部等部堂官们，及最后批准条约的道光帝，对亲手出让的权益都没有丝毫的觉察。传统的“天朝”观念，遮挡了他们的视野，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又使之看不见认不清真正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所在。

这里顺便还要提及的是，正是由于清廷对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致使在以后的中美交往中出现不少争端，1846年的裨治文租地案即为其中之一。

裨治文曾向广州居民罗仲衡租广州联兴街的一块空地。该地在裨氏租地前几年就曾引发官司。因为此地原属“广利行”，后被人火焚烧，有罗卢两姓争当业主，因为双方都无确凿证据，后被官府断归公众作为码头。后来，其中争当业主的罗仲衡，把此空地租给裨治文引起公众阻挠，官府把罗仲衡收监。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Alexander H. Everett）提出要求依照十七款（第十七款规定见本节上面内容），两国共同会办，并提出释放罗仲衡。

耆英等人则依据二十四款拒绝之。条约二十四款规定：

合众国民人因有要事向中国地方官辨诉，先禀明领事等官，查明禀内字句明顺，事在情理者，即为转行地方官查办。中国商民因有要事向领事等官辨诉，先禀明地方官，查明禀内字句明顺，事在情理者，即为转行领事等官查办。倘遇有与中国人因事相争，不能和平调处者，即须两国官员查明公议察夺。

耆英认为根据上述规定，裨治文租地案与美国人无关，无须他们过问。耆英等人认为：“此案乃系罗仲衡故违地方官断明之案，将公地作私产，以废契为影射，种种案情，均应向罗仲衡一人根究，并无应向裨治文质讯之处。即一切文案，亦均存中国衙门，贵国官员更无从悉其颠末，所以毋庸会办。如果产业断明，罗仲衡另有应与裨治文关涉质对之。”^③

两国对十七款的理解重点不同。美国方面紧紧抓住“合众国民人……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择定地基”这句话，认为不论何人何案，只与此款相类而不照此款办理者，就是违约。所以美方要求一定要两国官员共同办理。

耆英则认为二十四款是两国民人交涉词讼之“通例”。而十七款视为租地之“专条”。^④耆英把十七款全条写出，解释说明此条款是因为一方面担心有中国民人抬价捐勒，另一方面担心西方人强租硬占，所以才设立此条款。

中美双方相持期间，罗仲衡供认，因为契券焚烧无存，所以听从孀嫂罗关氏之语，捏造地契。

^①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二，页22-24。

^② 《覆奏亚美理驾合众国贸易条约摺》，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二，页21-25。

^③ 美使公文档，“钦差大臣耆英等致美使义华业照会，道光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载《中美关系史料》，页66。

^④ 美使公文档，“钦差大臣耆英等致美使义华业照会，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九日”，载《中美关系史料》，页68。

在美国的一再坚持下，耆英等人最终同意两国共同会办。因为该空地久经断归公众作为码头，所以是否愿意租给裨治文建楼，“应行按照条约，派人讯明公众，体察民情，会同贵国领事官商酌办理”，“除委员会办外，相应照请贵公使飭尚派领事官定期会办，以符成约”。^①美国派出伯驾和福士（Paul S. Forbes）办理，而中国则派出一名赵姓署道。

在裨治文租地案中，美国驻华公使义华业一开始就提出释放罗仲衡，实际上就是在干涉中国司法制度。虽然他解释为“一时心慈”所致。^②

在中国官府审讯罗仲衡的过程中，义华业又质疑耆英照会中“研讯”两字有刑讯逼供之意。要求查明中国官员在审查地契真伪中是否有刑讯逼供之情况。^③耆英自然又是一番解释，把“严讯”和“研讯”分别告知。严讯是近于强逼，而研讯则是详细询问之意。^④

此案历经二月余日，在伯驾等人的干涉下，最终释放罗仲衡。^⑤

因为裨治文租地而引发这么一件事件，可能是当时参与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的裨治文自己也没料想不到的。

^① 美使公文档，“钦差大臣耆英等致美使义华业照会，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廿一日”，载《中美关系史料》，页 70。

^② 美使公文档，“钦差大臣耆英等致美使义华业照会，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载《中美关系史料》，页 67。

^③ 美使公文档，“美使义华业致钦差大臣耆英等照会，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载《中美关系史料》，页 71。

^④ 美使公文档，“钦差大臣耆英等致美使义华业照会，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载《中美关系史料》，页 71-72。

^⑤ 美使公文档，“伯驾致制麟秦、施禹泉等函，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廿四日”，载《中美关系史料》，页 72。

第三章 裨治文的晚年

裨治文在1847年之前，基本在广州等华南地区活动，1847年因为修订中文《圣经》的需要，来到上海，从此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度过了他的晚年。由于中国历史在这个时候还是处于剧烈的动荡中，所以他的晚年生活依然丰富，影响最大的是他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表现。

第一节 裨治文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活动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爆发。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随即在此建都，并改南京为天京。这场运动引起了西方各国政府、各界人士，尤其是在华传教士的关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 Martin）曾经概括性地描述过这一情形：

旧都（指南京）落入任何一群叛乱者手中，当然是全世界所瞩目关心的事。但当知道那些叛乱者竟是基督教徒，他们不仅为中华帝国而战斗，而且对他们国内的偶像崇拜进行着十字军式的斗争，人们的兴奋就是无法遏止的了。商人们开始推测叛乱成功将对商业发生的影响；传教士们讨论着这个叛乱对推广福音可能有的关系；外交人员们则自认为是唯一能自由地亲自去叛区作考察的人，以寻求最早的机会，从一次访问南京中探知事件的真相。^①

由于清政府限制传教，而且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相标榜，在定都天京之后又广泛地印发《圣经》和其他宗教小册子，从而引起基督教传教士的密切注意和浓厚兴趣。大多数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热忱欢迎这个运动，他们认为太平天国的爆发与他们在华传教活动有密切的联系，他们长期从事的宗教文化宣传工作为这次运动播下了种子。

太平天国运动初期，除少数美国传教士持反对或怀疑态度外，大多数传教士都对这场运动表示欢迎和赞赏。^② 美国驻华公使马沙利（Humphrey Marshall）于1853年5月26日致书美国国务卿说：很热情的传教士看到太平军宣传上帝教的小册子，认为“在中国出现了比较开明的文明的曙光”。^③

裨治文在获知以基督教为旗帜的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消息之后，对这场运动“抱有千百倍更大的兴趣，不是语言所能表达”。^④ 裨治文对太平天国寄予无限的希望，希望借助这次运动使中国完全向“基督”敞开大门。裨治文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有助于在中国推进美国基督教传教事业。他预言：

一旦结束，我们希望，并相信，古都南京能成为一个新的首都，一个新的基督教性质的政

^① W.A.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p.129. 译文参考陈申如《英美传教士破坏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阴谋活动》，《江海学刊》，1963年第3期

^② 美国在华传教士中，白始便不以为太平军会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仅卫三畏一人。他在1864年写道：“从一开始我就不相信太平军会增进基督教的传播。”不过1864年6月清军攻破南京，太平军已经灭亡，卫三畏的言论，颇有事后先知之明的嫌疑。

^③ J.Davis,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er.1, vol.4, Nov., No.64.

^④ 裨治文致《北华捷报》编辑的信（1854年7月4日），在《北华捷报》1854年7月22日刊出。转引白马大正《外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革命》，载《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选集》（三），页783。

府，那样，政府主要领导将会要求、呼吁大量的基督教牧师和教师。^①

裨治文等人的态度以及他们接连不断地发回太平洋彼岸母会的报告，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倾向于太平天国的舆论，并且促成美国政府形成不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同时和南北两个政权建立联系，以谋取更多权益的对华政策。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英、法、美各国人士纷纷以各种方法访问过或试图访问天京。他们企图通过实地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对他们个人事业或国家利益在华的影响，以便采取相应的态度。

最早访问太平天国的西方国家是英国。1853年4月27日，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 Bonham）一行乘“赫姆士号”到达南京。此后是法国，1853年12月6日，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A. Bourboulon）带领随员乘“卡西尼”号兵舰到达南京。当然这两次造访与裨治文无关，裨治文是在1854年5月，以翻译和随团牧师的身份跟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MaLane）乘美国军舰“色士奎哈那号”造访太平军辖区的。麦莲之行是想进一步收集太平天国的情报，以决定美国的对华政策。

裨治文之所以被聘为麦莲使团的译员，是鉴于他的学术声望，以及他在十年前为顾盛服务时的优异表现。当麦莲雇请裨治文为其使团翻译及牧师时，裨治文欣然同意，同时提出要求与其一起翻译圣经的克隆存（M. S. Culbertson）一同工作。

5月21日，“色士奎哈那号”自吴淞启程，25日，到达镇江。镇江岸上的太平天国守军发出炮弹以示警告，军舰被迫停航。当时担任译员的裨治文与克隆存陪同杜尔上尉（Lieutenant Duer）与公使馆莱维斯·卡尔（Lewis Carr）等人，登岸与太平天国当局联系，并要求解释这一炮击。

太平天国镇江守将吴如孝在官府接待了杜尔一行。次日，吴如孝函复“色士奎哈那号”舰长布嘉南（Frank Buchanan），称已经了解美国人此行的“友好诚意”，但根据东王命令，外国来访必须先镇江停留，待奏准后方可前去南京。^②但美舰不予理会，5月27日驶抵南京江面，

同日，布嘉南向太平军发出这样一份照会，文中称：本军门现带领有本国大火战舰船名色士奎哈那号，另随行备用小火轮一号，已抵南京地面。美利坚合众国驻中华帝国公使阁下在色士奎哈那号船上，他渴望拜见太平天国军队的总司令、首相杨秀清阁下。^③并称美方人士将于明日瞻望南门外外的报恩寺塔。裨治文等人持这封照会上岸接洽。

布嘉南舰长的信没有立即得到答复，在此期间，也许为好奇心所促使，据说，裨治文曾独自进城，并被带到太平天国右贰检点胡海隆处，胡海隆交给裨治文一纸条，字条上强调带“通语识字之人”^④同来。也许是因为裨治文只会说粤语，而不能与太平军官通话。这字条我们在档案史料中可以找到有关记载，据说是递给裨治文的，但是在裨治文夫人写的裨治文传记中找不到相关记载。

第二天，因为又有八名美国人到南京城南门外观看报恩寺琉璃塔，胡海隆又向美国人写“札谕”表示责怪，其中再次提到裨治文前一日擅闯南京城之行为，认为裨治文“勿撞入城，大非理道”。

⑤

5月30日，布嘉南收到了太平军的复照。复照以太平天国地官又正丞相罗必芬和地官又副丞相刘承芳名义发出，文中声称布嘉南擅用照会，不合情理，因而拒绝将他的照会转呈东王。复照

^① Bridgman to Anderson, Shanghai, Dec. 16, 1853, ABCFM, reel 259, cited by Lazich, *ibid*, p. 325.

^② 吴如孝照会，据《太平天国资料》，页11。

^③ 朱士嘉《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页178。

^④ “太平天国右贰检点胡海隆札谕番邦兄弟”，咸丰四年五月初三日，《中美关系史料》，页162。

^⑤ “太平天国右贰检点胡海隆等札谕”，咸丰四年五月初四日，《中美关系史料》，页163。

说：

……今接尔布嘉南来文……擅用照会东王等语，实属大不合理。盖我东王九千岁恭奉天命，降凡为我天朝之辅佐，乃理万国之生灵。尔等身居海宇，同沾恩德，自当跪具禀奏，方合投诚之道理，以见来朝之忠忱。是以本大臣阅此照会，未呈东王金阙，诚恐触怒金颜，负罪匪轻。兹姑念尔等居于海宇，未知我天朝之礼制，犹可宽恕……我主天王为天下万国太平真主，则天下万国皆当敬天从主，知所依靠者也……我天朝视天下为一家，合万国为一体，自必念尔等之悃忱，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方得为天国之居民，永沐天朝之恩泽，安居疆土，做享荣光，本大臣有厚望焉。^①

从这份照会中可以看出，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在太平天国仍有深厚根基，太平天国的对外观念是变相的“华夷思想”。他们持“天下万国皆来降”的态度，其白人与无知，较鸦片战争前的清廷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裨治文作为随团翻译把此信译英文。^②5月30日，按照裨治文的翻译，布嘉南照覆，指责“米文言语，尽非友谊，并无尊重美国之辞，不得不暂止照会”。布嘉南随信附上的除了美国国旗的图纸之外，还有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以免日后恐有错误，认别邦为我国之差也”。^③

5月31日，色士奎哈那号离开南京溯江西上，一直航行到芜湖，直到6月3日返回上海。

在麦莲使团访问天京期间，麦莲自己并未直接与太平军将领发生往来，了解太平天国和重中美国在华利益和特权的主要执行者是同为使团翻译的裨治文和克陛存。

裨治文回到上海后，把在太平军辖区调查所得材料，写成一份长篇报告，分别刊登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和美国出版的《传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上。报告介绍和分析了太平天国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各方面情况。

裨治文等人发现，在军法管制之下，太平天国辖境内秩序良好；鸦片受到严禁；人人皆有职务；衣食无忧，精神焕发；长江两岸及湖北的粮食供应不断。^④但是，裨治文还发现：

一、他们的政府是神治主义的，是由他们所相信的一种新宗教制度发展起来的，是和以色列人一样的。他们自以为是受着一个人所指导，此人为上帝所高举以行施其旨意于世上者。他们相信其政治组织是受天神直接指导的，据称他们的领袖们有时被召上天，而有时天神降临附在他们的身上。

二、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其性质似乎同时具有一个属世的政体和一个属天的政体。换句话说，也许是一个既可见又不可见的机构……

三、他们的政府又是王族的专制政体……

^① 罗必芬等札谕，见《中美关系史料》，页163-164。根据邓元忠研究，由于在胡氏论文中最后所言以及裨治文所得纸条皆提出“携带译员”之事，身为译员的克陛存便抓住此机会，去胡氏府邸作非官方的拜访，以便向他解释此船属于何国，此行目的，以及尽量收集有关太平天国之资料。克陛存交给胡氏一本裨治文多年以前用中文所写的美国历史的书（应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称书中已经解释了停泊在江中的船只之所属国及其地位和性质。（邓元忠《美国人与太平天国》，页65-66）

^② 史景迁著，朱庆葆等译《“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页329。

^③ 《中美关系史料》，页164。

^④ 裨治文《苏斯奎那号的南京、芜湖之行》，载《北华捷报》，转引自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页37-51。

四、这个王族的集团，还号称为天下万王之王。至于世上各国各族究竟是怎么样的，究竟有多少，权力如何，诸王与其弟兄们无疑地是毫无所知的。然而，他们宣称统治天下的话却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天父，至高无上的主，威严而又崇高的统治者，是唯一真正的上帝，是普天之下所有国家的臣民的父亲；而天王，我们的君主，则是世间一切国家的爱和平的真正的统治者。这些，以及其他类似词句，在他们的言谈与文件中屡见不鲜。从上述正误参半的前提下出发，他们得出结论：万国既然都应当服从和敬拜独一真神，那就必须臣服天王，并向他进贡奇珍异宝。^①

在天京考察期间，裨治文等人发现，太平军将士，上至天王下迄普通士兵，对西方基督教义一无所知，在太平天国宣称的新宗教中，搀杂着异教的成分和迷信的色彩。

裨治文认为，太平军将士不仅无知，而且渎神。他在《传教士先驱报》中大肆批判太平天国的宗教说，在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中“混杂着深重的黑暗和严重的无知”，“我觉得，他们是否完整地掌握了任何关于圣灵的明确知识，是非常值得怀疑的”。^② 裨治文认为太平军也许是名义上的基督教徒，但“他们在实际上是最严格的破坏偶像者……他们的宗教思想极不完备。虽然他们公开宣称只有一位‘真神上帝’，可是关于……属于新教徒派的基督教徒一般所接受的教义，虽然在《圣经》上有明确的启示，可是他们都忽视不顾”。^③

裨治文认为，太平军将领在和外国人接触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太平天国是万国之中心的傲慢和虚骄的态度，说明洪秀全等人所要建立的并非一个基督教国家。裨治文称之为“傲气十足的主人而非基督教国家”。^④

裨治文还认为，美国政府不可能期望和太平军签订新的条约，也无法从洪秀全那里取得新的特权和割让。裨治文在报告中说：

那个列王兄弟集团和他们的朝臣们，倘使他们成为中国的主人，是否会承认清帝国与英、法、美政府所缔结的现有条约呢？可以断言，他们必定不会承认的。除非受了强迫，或者他们自愿从他们崇高的地位下降，毫无疑问，他们是不会承认的。^⑤

因此麦莲一行认为，应向天京政府重申：美国绝对不会放弃以往清政府给予的条约权利，并要求太平天国予以正式承认。正如裨治文所言：“我们决不会放弃中国。”^⑥

根据裨治文等人的报告和意见，麦莲向美政府报告说太平天国信仰和措施有着无可理喻的特征，称太平军“对《圣经》真谛的理解荒谬之极”，没有能力进行任何“平等条件”下的对外交往，所以建议美国改变对华政策，维持在清廷控制地区的和平与秩序，以便扩张商务，保持条约权利。麦莲此行的结果虽然仍是宣称中立和不干涉，但实际上决定了主要和北京打交道。

^① 裨治文《苏斯奎那号的南京、芜湖之行》页37-51；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页43。

^②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00-201.

^③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页161。转引自马大正《外国传教士与太平天国革命》，载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编《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三册，页787。

^④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45.

^⑤ 裨治文《苏斯奎那号的南京、芜湖之行》，页37-51；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页45。

^⑥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56.

第二节 裨治文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的活动

在沪期间，裨治文还与太平天国的重要人物洪仁玕相识。

1854年洪仁玕逗留上海期间（约五个月），^①结识了不少在沪工作的传教士。洪仁玕在其倡议改革的《资政新篇》“法法类”中，提及与许多外人的交往，与其“相善”的传教士有二十二人之多。其中红毛邦（英吉利）有理雅各（J. Legge）、合信（Hobson）、觉士（J. Cox），而“花旗邦”就有“罗孝全、卑治文（即裨治文）、花兰芷（John B. French）”等人。^②洪仁玕提倡向西方学习，首先是受到这些传教士的影响，当然也包括了裨治文。

在1854—1859年间，西方传教士为了适应本国政府对华政策的需要，积极参与到强迫清政府修约的活动中，所以他们对太平天国活动的关注显得相对较少，注意集中在收集有关太平天国的情报，分析运动发展的动向上。只要翻阅一下这一期间《北华捷报》就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特点。《北华捷报》当时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传教士所撰写的关于太平天国各方面的文章。^③裨治文也是继续关注太平天国的动向。

1856年发生天京事变，裨治文根据目击者的口述写了《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裨治文的这篇文章与玛高温写的《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一直被作为研究关于太平天国天京事变的重要史料。^④

1860年6月2日，太平军攻克苏州，逼近上海，上海和太平天国辖区之间的往来畅通以后，外国传教士很自然地想到太平天国占领区去了解情况。洪仁玕、李秀成对他们采取了欢迎的态度。裨治文作为其中一名就曾到苏州的太平军辖区进行考察，并带回一些太平军的布告等。^⑤

美国来华传教士不仅给予美国对华政策以重大的影响，而且他们关于中国的著述、通讯以及演讲，使中国方面的真实情况源源不断地传到美国，逐渐加强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和重视，成为美国了解中国的一条主要渠道。可以说，“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美国人是透过传教士而了解亚洲”。^⑥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裨治文继续充当美国驻华使馆的重要谋士，他在上海还频频与英、法、俄等国驻华公使接触，提出对华主张和代译文件^⑦。特别在决定英、法联军一同北上，对清政府进行战争恫吓中，裨治文“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裨治文提出的对华要求比贪得无厌的英国统帅额尔金的要求更为苛刻，使额尔金都不能不为之吃惊。对于中国的主权和完整，在他们看来却远不如比开放传播福音之门来得重要。^⑧由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与英、法、俄、美四国于1858年签订了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在《天津条约》签订时，裨治文“仍然发挥

^① S.Y.Teng,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p.151.

^② 洪仁玕《资政新篇》，载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二），页528-529。

^③ 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三），页790。

^④ 《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北华捷报》第336期，1857年1月3日。载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页72-78。

^⑤ 《北华捷报》第527期，1860年9月1日《艾约瑟等五名传教士赴苏州谒见干王和忠王的报导》，载《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辑，页112。

^⑥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页474。

^⑦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34.

^⑧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页479。

着积极的作用”，他继续充当美国驻华使馆的重要谋士，受到美国公使列卫廉（Reed）的褒奖，列卫廉致函国务卿卡斯说：

我不得不再说一句，传教士和那些与传教事业有关人们的学识，对于我国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他们充作翻译人员，公事就无法办理。我在这里尽责办事，若不是他们从旁协助，就一步都迈不开，对于往来文件或条约规定，一个字也不能读、写或了解。有了他们，一些困难或障碍都没有了。

一八四四年的情形也是如此，顾盛的翻译人员和他们在公务上的助手也都是出诸这些人之中；裨治文博士在一八五三年之于马沙利，在一八五四年之于麦莲，于一应公务上都是很主要的助手，现在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对他不时的帮助和经常最可贵的划谋献策，我得借此机会向他表示谢意，实感欣幸。^①

《天津条约》签订后，传教士最终获得深入中国内地活动的特权。裨治文迫不及待地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向他母校的全体师生报告条约的这个内容，称它是“出于耶和华之手，是上帝的旨意，使这件事取得成功。在我们的眼里，这项工作做得很出色。由于这个奇妙的开放，我们将称颂他的圣名，并鼓起勇气来”。接下去，裨治文向他的母校发出呼吁，特别向神学生们呼吁前来中国活动：“你们来吧，快点来吧，越快越好。你们大家到教堂里去，到牧师的家里去，到海外传教团体那里去，对他们说：请派遣我们，请派遣我们到中国去。”^②

当《天津条约》事项不能付诸实施时，裨治文则表现出极大的悲伤。^③但他相信“中国开放，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日子，指日可待”。^④

第三节 翻译中文《圣经》

裨治文晚年依然忙碌。当然，本来为编辑《中国丛报》所占据的时间由于1851年的停刊而未被充实。裨治文考虑到，尽管《北华捷报》偶尔会刊登一些学术性质的文章，但受其新闻报纸性质所限，不可能有更多空间发展学术性文章。另外，裨治文早在1847年就被任命为亚洲学会中国支会（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通讯秘书，此协会出版一份有关汉学研究的杂志。由于亚洲文会中国支会的大多数成员住在香港，而住在香港之外的会员很难定时参加协会会议和活动。因此，裨治文希望在上海建立一相似组织。

在裨治文的筹办下，“上海文理协会”（Shanghai Literary and Scientific Society）于1856年成立。裨治文当选为第一任会长。裨治文在开幕词中，声称中国“无论在文学和科学各个方面的成就，都远远不及基督教国家”。他提出，要以上海作为东半球的中心，把欧美的影响扩展到这个巨大帝国的最远方去。他要求所有参加学会的成员，“竭尽全力，使所作的一切工作，能立下光荣的功绩，有益于我们这一代人，在各个方面增添上帝的荣光”。^⑤

^①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页472。

^②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28-232.

^③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42.

^④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43.

^⑤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15-217.

1858年上海文理协会改属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为亚洲学会的上海分会，中文名为“亚洲文会”(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它的宗旨是考察中国的社会，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向欧美介绍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接待各国学者的来访或考察，出版学会年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创办图书馆和博物馆等。裨治文在1859年辞去会长职务。^①

裨治文晚年的主要工作还是修订出版中文《圣经》。

新教传教士翻译中文《圣经》自马礼逊起。马礼逊于1808年任职东印度公司后，根据巴黎西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巴设的《新约》译稿(部分)，翻译了《新约》。1813年译完《新约全书》，并雇人秘密出版。1814年起，马礼逊和米怜合作翻译《旧约》，1819年11月全译本译毕，在马六甲排印，1823年全部出版，取名《神天圣书》，《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称《新遗诏书》。^②1835年，裨治文就和麦都思、郭实猎、马儒翰组成四人小组，以马礼逊译本为依据而加以修订。据专门对《圣经》中译作过研究的伟烈亚力称，《新约》的修订主要由麦都思进行。^③《旧约》于1838年完成，1840年印行，大部分为郭实猎所译。郭实猎又再修订麦都思的《新约》，以《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出版。^④

虽然新的译本比旧的有所进步，^⑤但是传教士们认为“无论新旧译本都不符合(汉语)语言习惯。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越来越强烈地希望出现更好的译本”。^⑥

1843年8月22日至9月4日，裨治文出席在香港举行的一系列传教士大会，讨论联合修订《圣经》中译本。裨治文作为美部会代表，被委与浸信会差为任牧师(Rev. William Dean)讨论 Baptizo(洗礼或浸礼)之中文译词问题。会议还决定由每个传教站组成一个地方委员会，所有传教站的传教士均为成员。修订工作先由各地方委员会分头进行，再由每个创建者派代表组成“代表委员会”，对所有修订之处作最后的裁决。之后，将整个译本提交给英国和美国的圣经会。会议选举麦都思为总委员会秘书。^⑦这次会议导致了“委办本”(Delegates' Version)的出现。

为进行“委办本”中文圣经翻译，裨治文于1847年来到上海。1847年7月1日裨治文作为广东地区代表携夫人及两位中国小女孩前往上海参加修改《圣经》译本，23日到达。^⑧此后，长期居留上海，与克陛存共事翻译《圣经》。在修订过程中，由于裨治文极力主张译经原则应照原文逐字逐句翻译，而不重于文辞典雅的意译，所以与以麦都思为首的英国传教士在翻译上意见相左，如在“God”或“Theos”、“Deus”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从而展开“译名之争”。

早在1843年的香港会议上，麦都思、马儒翰等主张把“神”改译为“上帝”，但是遭到以裨治文为首的英国传教士的反对，他们主张继续使用“神”。他们最后决定，每个传教站现在可以使用

^① 亚洲文会在1871年由英国政府拨款在上海虎丘路建造永久会所。到1935年，该会拥有一个藏有一万册图书的图书馆，和收藏中国物品的博物馆，会员有852人。

^② Alexander Wylie, *Memoir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5. “遗书”为英文 Testament 的中译。该词可译为“遗稿、遗言”，也可译为“约”。根据基督教经典，译为“约”最为恰当，所以19世纪50年代以后的《圣经》译本都译作“约”，不再用“遗诏”。

^③ Alexander Wylie, *Memoir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31.

^④ 哈佛特藏，胶片 B27。

^⑤ 吴义雄前揭书，页373。

^⑥ *Chinese Repository*, vol.18, p.387.

^⑦ *Chinese Repository*, vol.12, p.551-553; vol.18, p.389.

^⑧ *Chinese Repository*, p.165.

其喜欢的中文翻译 God，留待总委员会会议作最后的决定。

从 1845 年开始，《中国丛报》就成为双方笔战的论坛，直至终刊。裨治文、麦都思、郭实猎、文惠廉等纷纷发表长篇文章，进行论战。对于这种分歧状况，卫三畏在 1850 年作了概况说明：“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所有主张使用‘上帝’为译名者都属于伦敦会，而所有美国人都站在美部会传教士一边”。^①

1850 年 8 月，《新约》修订完成，凡涉及到有争议的译名之处，都留下了空白。同日，在上海的传教士宣布组成《旧约》委员会，裨治文仍为委员之一。1851 年，麦都思等人退出委员会，裨治文被选为原来的“代表委员会”主席，克陛存为秘书。裨治文以忠实于原文，“一点不改变，一点不增加，一点不减少”为原则，使之“在风格象通行的英文本《圣经》一样忠实、简洁、平实和纯正”。^②他在克陛存和文惠廉的帮助下，继续以“神”名译《旧约》，1862 年新旧约全书译就，由美国圣经会斥资出版，^③被称为“裨治文、克陛存译本”（Bridgman and Culbertson Version）^④。裨治文翻译的版本为美国公理会在华最具代表性的圣经，^⑤一直比较流行，其中《新约》部分到 1920 年时销售量还达 1005 本。^⑥

1861 年 9 月，裨治文患痢疾，^⑦不久就卧床不起。守候在旁的，除了他妻子外，还有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和刚从日本来访的前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11 月 2 日凌晨 3 点^⑧，裨治文在上海公寓内逝世，葬于上海公墓，^⑨终年六十岁。

文惠廉在《北华捷报》上发出讣告，简单叙述了裨治文的生平，对他备加赞赏。裨治文去世的消息传到美国后，梁进德向他夫人发来了慰问信，还汇来 200 块墨西哥银元给裨治文夫人，要她在裨治文的坟上树一块“美丽而坚固的墓碑，以纪念我这位已故的父亲和老师”。^⑩

^① Frederick W. Williams ed.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 p.175.

^② E. C. Bridgman to R. Anderson, March 13, 1851, Shanghai, ABCFM Papers, 16. 3. 8, vol.3. 转引自吴义雄前揭书，页 389。

^③ 《美国圣经会在华八十三年之历史》，页 9-10。转引自李志刚《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牧师与中美早期关系》，页 29。

^④ 司德敷《中华归主》，页 1035。

^⑤ 《美国圣经会在华八十三年之历史》，页 9-10，转引自李志刚《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牧师与中美早期关系》，页 45。

^⑥ 司德敷《中华归主》，页 1040。

^⑦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57.

^⑧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62.

^⑨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67.

^⑩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269.

下编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研究

第四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写作与出版

关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①的版本情况，目前学术界说法很多，比较混乱。有认为只有两版的（1838年、1861年）；^②有认为存在四个版本的（1838年、1844年、1846年、1861年或1862年）；^③也有认为只有三个版本的（1838年、1844年或1846年、1861年或1862年）。^④笔者认为有三个版本，它们是1838年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44年的《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和1861年的《大美联邦志略》。笔者拟根据哈佛所藏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各个版本逐一论述，予以澄清。

第一节 第一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1、缘起

1836年裨治文就已经开始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他183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到：^⑤

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几乎每天都花在编写美国简史（a brief history account of America）上。这本书准备分成两卷，每卷75页。全书56章，主题包括美国的发现、地理位置和疆域，以及美国人的性格特征、风俗习惯、政治、文学、宗教和慈善机构等内容。

裨治文在同一份报告中提到了写作《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原因。他说：

我把此书的撰写作为学习语言、练笔之用，并且这样的工作非常迫切需要，另外，对一个初学者（指汉语学习——笔者注）而言，完成这样的工作，远比撰写标准的短文简单得多。

我们可以清楚理解裨治文提到的作为“学习语言、练笔”之用，也可以理解对于裨治文等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来说，撰写美国史比撰写标准的中文文章来得简单。但是关于“这样的工作是迫切需要的”（it is greatly needed），裨治文没有明说。李晓杰认为，裨治文之所以撰写《美理哥合省

^① 有些学者称之为《美理哥合众国志略》。

^② 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页50注云：“《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刊行后23年（1861年），重刻于上海。”

^③ Lazich, E.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Missionary to China*, p.154. 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页10，注释3。王家俭《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载《大陆杂志》，第38卷第6期，1969年3月（下文提及王氏的观点，均出自该文，不再作注）。王家俭把《美理哥国志略》译为 *A Brief Geography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此处 *geography* 是为不确。此标题可能采自伟烈亚力《在华新教传教士回忆录》，裨治文自述为 *a brief historical account of America*，见 *Bridgman to Anderson, Canton, Sept.7, 1836, ABCFM, reel 256, cited by Lazich, ibid. p.143.*

^④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117；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页296；刘路生点校《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页2；《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的认识资料丛编》第一辑，丁编，附录。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页32；马祖毅、任荣珍《汉籍外译史》，页695；Fred W. Drake, *Protestant Geography in China: E. C. Bridgman's Portrayal of the West*, in Barnett and Fairbank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p.101.

^⑤ *Bridgman to Anderson, Canton, Sept.7, 1836, ABCFM, reel 256, cited by Lazich, ibid. p.143.* 原文如下：For some months back I have been engaged almost daily, more or less time, in writing a brief historical account of America. The work is to be in two volumes—say 75 each: its leading topics are the discovery, situation, & political, literary, religious and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of the people—arranged into 56 chapters. I have undertaken it as an exercise in learning the language, and because such a work is greatly needed, & its execution, by a beginner, more easy than the standard tracts. The work will be published by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国志略》与郭实猎在 1834 年刊布《大英国统志》“不无关系”。李晓杰认为，裨治文虽然在其著作中对郭实猎的书未及一辞，但仍然有理由来寻找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他说：“高理文在写作《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前，见到过郭实猎的《大英国统志》，应当是没有疑义的问题。因此，以理推之，他极有可能是受此书的启发，而决定写出一部与郭实猎介绍英国具有同样性质的有关美国的书籍。”

李晓杰论文中提到的《大英国统志》共分五卷，借一个游历了英国二十年以教汉语为生的叫叶栊花的人，在返回中国后，向他的邻居与朋友所做的介绍，将英国的国体、百姓、军队、官员、礼仪、风俗、地理等做了概述。其写作方法颇似古代的话本小说，叶先生就像一个说书人。在每卷的开始，还引用一段《孟子》或《管子》等先秦诸子著作中的话，来引出本卷所要叙述的内容。因此，在撰写风格与叙述形式上，《大英国统志》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不其相同。《大英国统志》采用的是“说书体”，《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则采用了平实的专题论述的形式。李晓杰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对此，李晓杰推测：一方面，裨治文大概是向有别于郭实猎的书，自成风格；另一方面，可能与当时裨治文的中文程度有关。

笔者认为李晓杰对这个原因的阐述尚无直接证据，还须进一步证明。本人认为裨治文所说的“这样的工作说迫切需要的”是指有必要向中国人详细介绍美国。如笔者在导言中所述，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裨治文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言中提到：

予虽荒陋无闻，华人多见广识，惟合省舆地土产、人物规条，一切国中事务，尚未领悉于胸中。

而且在裨治文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前，还没有任何人用中文写过美国史方面的专著，所以裨治文要撰写有关美国的专著，“以正世之讹也”。^①梁植在 1861 年墨海书馆出版的《大美联邦志略·跋》中也曾提到：

……先生（指裨治文）……复恐华人不知美国联邦之事，于是著联邦志略一书。^②

这是裨治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向中国人介绍美国的一个旁证。

笔者认为裨治文之所以撰写此书，可能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即企图“通过事实的展示，从而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③

我们知道，《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在益智会名下出版的。裨治文创设益智会正是为了用更高明的办法显示外国人并非“蛮夷”，促使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社会的文明，从而打破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观念。这更高明的办法即为裨治文所言，“一方面收集整个西半球的现代文明和发现的最丰硕成果，另一方面把这些成果在这些东方各国的居民中广泛传播开来”，这可以使“中国人相信自己还有很多要学”，因而“表明我们西方人实际上并不是野蛮人的有效办法”。^④

裨治文“迫切需要”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应该是指迫切需要向中国人表明美国及至其他西方国家并非蛮夷之邦，而有着同中国一样甚至更高的文明，从而打破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观念，有利于基督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

^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凡例。

^② 此处提到的《联邦志略》，应该是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③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p. 186-187.

^④ Barnett and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p.95-96.

1837年11月30日，裨治文写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①

裨治文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得到了中国人的帮助。

裨治文在1844年中美谈判签订《望厦条约》时，被耆英称为“所识汉字无多”的“夷人”，而且只会讲广东话。而裨治文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时，在华六七年（1836年、1837年）之久，其汉语水平不太高。因此，该书的出版无疑有人帮助润色。现明确可知的，曾担任裨氏中文助手编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有梁植。

梁植，广东端溪人，是裨治文在广州所收的中国学生之一。他在1861年墨海书馆出版的《大美联邦志略·跋》中写道：

先生（指裨治文）爰召植曰：是书初作，尔与有劳。

序中所言，应该是指梁植协助裨治文撰写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可惜的是，梁植具体做过哪些工作，尚不清楚。

2、出版机构

1838年，《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由新加坡印刷所付印出版。新加坡印刷所，又称“坚夏书院”。

“坚夏书院”为美部会华文出版基地。^②萧令裕在《记英吉利》中曾提及坚夏书院，有谓：

麻六甲者，明史之满刺加也。不知何年建英华书院，凡英夷学汉字者居之。又于新嘉坡建坚夏书院，凡弥利坚夷学汉字者居之。经史子集，备聚其中。才秀者入院渐业，以闽粤人为导师……^③

魏源在《海国图志》卷九亦有载：

新嘉坡有坚夏书院，弥利坚国人所建。马六甲有英华书院，英吉利所建。皆外夷学习汉文，及翻刻汉字书籍之所，故所刻书皆署此两书院藏版。^④

新加坡印刷所是“益智会”成立后所建立，主要由美部会传教士崔理时（Ira Tracy）筹建。所用字模是英国伦敦会的戴尔牧师所创制的活字字模。^⑤新加坡印刷所的出版物主要是传道小册子，世俗书籍较少。第一本出版物为崔理时所编之《鸦片速改文》，^⑥世俗读物除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外，还有《新加坡栽种会敬告中国务农之人》，以及郭实猎编写的《古今万国纲鉴》、《犹太国史》等；传道书和小册子，主要有《正教安慰》、《保罗言行录》、《圣书列祖全书》、《圣书注疏》、《悔罪大略》等数十种。到1842年，新加坡印刷所共出书刊42种，成为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出版中文书刊的主要基地之一。

对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出版时间，除了个别人外，国内外学者基本上认为是在1838年。

^⑦就日前所知，尚未发现有较坚夏书院藏版更早的版本，笔者认为1838年坚夏书院出版的《美理

^① Bridgman Journal, Nov.30,1837. cited by Lazich, ibid. p. 144.

^② 澳门则为美部会英文出版基地。见李志刚《美国第一位来华教士裨治文牧师与中美早期关系》，页32。

^③ 萧令裕《记英吉利》，见《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丛编》第一辑乙编页767。

^④ 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页141。

^⑤ 1835年初，戴尔牧师报导说他正在生产四副活字，其中两副对定户为伦敦会的巴达维亚布道站与美部会的新加坡布道站，第三副为檳榔嶼自用，第四副留待下一个顾客。据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页197。

^⑥ 见哈佛特藏胶片H4。封面署名“仁爱者纂”，即指崔理时。当时新教传教编著的中文宗教或世俗读物喜欢取有道德含义的笔名。如米怜自称“博爱者”，麦都思称“尚德者”，郭实猎称“爱汉者”。

^⑦ “裨治文的《联邦志略》，初稿成于四十年代”，见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页50。裨治文在序言末尾题

哥合省国志略》应该为最早的版本。但是不少学者认为此书当年就重版，但都没有提到最初在何处出版。^① 笔者认为可能是《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封面署“藏版”的缘故。其实，从哈佛特藏的胶片来看，在新加坡出版的书籍都署“藏版”。《海国图志》也有记载：

竖夏书院……英华书院……所刻书皆署此两书院藏版。^②

3、版本

较早系统论述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版本的，当推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③ (Alexander Wylie)，他在《在华新教传教士回忆录》中说：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共 125 页，1838 年出版。……27 卷，……其修订本于 1846 年在广州出版，易名《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也是 27 卷，共 75 页，附图，文章内容迨至修订时期；较大改动后，作者又于 1862 年在上海出版，易名《联邦志略》，分上下两册，共 107 页，包括三个序言，凡例和目录……^④

伟烈亚力的这段文字写得不是很慎重，疏忽颇多，他恐怕并未亲眼看到他在文中提到的三个版本，或未仔细翻阅。但是，对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版本情况，众多学者一般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上段文字的影响。

根据哈佛特藏胶片 F34，《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封面正中为书名，右上一行“道光十八年戊戌镌”，左下一行题“新嘉坡竖夏书”，后面不明，据推测，可能是“院藏版”三个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除正文外，还有裨治文自己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一篇，目录一份，凡例十则，其目录如下：

卷之首 地輿图、地球图、美理哥合省国全图；卷之一 覓新土；卷之二 分野度数；卷之三 创国原由 附英吉利法兰西两国相争土地；卷之四 百姓自脱英吉利国之制；卷之五 开国以后史略；卷之六 原居苗人；卷之七 户口册；卷之八 山川 天时附；卷之九 土产 禽兽附；卷之十 田农；卷之十一 工作；卷之十二 贸易；卷之十三 国政一 国领内外大宪衙门；卷之十四 国政二 制例之设定；卷之十五 国政三 布政之大小官宪；卷之十六 国政四 审察罪名之制；卷之十七 国政五 刑法监狱之制；卷之十八 济贫；卷之十九 辨教邪正；卷之二十 土音本源；卷之二十一 学馆；卷之二十二 书籍 刊刷各器附；卷之二十三 各艺；卷之二十四 仁会；卷之二十五 五伦；卷之二十六 礼义规模；卷之二十七 推度将来。

凡例十则如下：

一、是书列为帙两帙，首帙统言全国之大略，次帙分省而详说之，使读者一目了然也。

“时道光十八年岁次戊戌孟夏中浣 高理文题书”。通观正文，书中内容迄至 1836、1837 年，《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六提到，“至道光十六七年间，有数排土人与合省国相斗”。所以《联邦志略》的初版早在三十年代就成稿。

^① 刘路生点校《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王家俭《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

^② 魏源著，李巨澜评注《海国图志》，页 141。

^③ 伟烈亚力，1815-1887，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汉学家。1847 年来华，在上海负责墨海书馆工作。后来转入英国圣经会，任该会驻华代理人。为推销《圣经》，走遍中国内地各省。1877 年返英，著译甚丰。

^④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p.70 .原文如下：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Mei lé ko hō sāng kwō ché lēò*. 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25 leaves. 1838 .A revision of this work was printed at Canton in 1846, also in 27 sections, with the title 亞美理駕合 國志略 *Ya mei lé kēō hō chung kwō ché lēò*, in 75 leaves, with a folding map, the information revision by the author, was published at Shanghai in 1862, in 2 books, with the title 聯邦志略 *Lēen pang ché lēò*, containing in all 107 leaves, including 3 prefaces, notes for the reader's guidance, and a table of contents.

一、而意亦住者，用一大白圈“○”。每意中又分前后，如时文一笔一笔者，用一黑圈“●”。住而词已住者，用一点“、”。句中或有暂停，而复相连者，用一小点于中“、”，以微歇之。界限分明，句读不混。

一、国名、地名、州、县、山、川等名，皆用双企，惟人名则用单企，以别清混。其中亦有不少企者，以其人所共知也。

一、分类而书者，以其外国事物，人罕见闻，历乱支离，错杂难览。

一、用小注伸言于句下，为未知者详说。

一、是书寻章择句，推古及今，皆遵本国鉴史繙绎或目击耳闻，研究其实，以正世之讹也。

一、是书称志略而不称志者，以其未定稿，而略编纂草成也。

一、读史经济，全在舆地。舆地不明，虽熟读全史，犹如说梦。故特详列于卷首。

一、地球之说，世不讲求。不知穷理博物，增人识见，自觉有味乎其言。

一、是书直道直陈，不措词华，不立注释，欲其意简言赅，以便稽考。

序言半页 8 行，每行 18 字。目录、凡例、正文等俱为半页 9 行，行 20 字。^①版口刻页码及书名“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全书连封面共 124 页，其中上篇 54 页，下篇 69 页，共约 4 万余字。^②

笔者发现此书目录、凡例与实际内容并不一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目录和凡例显示，该书至少应有三幅地图置于卷首。^③实际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全书没有一幅图。1852 年魏源增辑《海国图志》百卷本时即说，“有美理哥全图，未之见”。^④而在《大美联邦志略叙》中，裨治文提到，“并创为汉字地图”。可见，当时就不存该书卷目所列有之地图。

第二、从凡例第一则中得知，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概括全国大致情形，下篇对各州分别详述。实际上，上篇分别介绍各省，下篇才统言全国大略。

第三、从目录中可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只有 27 卷。实际上，上篇有 20 卷，下篇有 27 卷。

不少学者仅仅根据该书的目录、凡例以及上述伟烈亚力的相关介绍中得出三个错误的结论。

导致众多学者（包括伟烈亚力）误解的主要因素是《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错误的印刷装订。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两部分内容之间，有一段文字，其中开头的几句话说道：

此承上篇言及美理哥各省。前已总言全国大略，兹将各省逐一纪其上所未备者，详细叙明，并绘地图附后，使读者一目瞭然也。

分析上引文字，可以知道，这段文字应是下篇分省详说前面的一段引言，上承上篇全国大略。另外，在 1844 年香港藏版《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中，所录内容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书中卷一至卷之二十七全国大略部分，在书名后注名“上卷”。因此，可以推定，《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① 刘路生点校本通言“半页 9 行，行 20 字。”见其说明，页 2。

^② 李晓杰以为，“上篇四十四叶，下篇六十九叶”，误。

^③ 作者在正文中也有几处提及有图附之。

^④ 魏源著《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五十九“墨利加洲沿革总说”，页 5 下。

这种排列顺序，可能是错误的印刷装订所致，把原来书稿中上篇的有关全国概况的内容排在了后面，而将本应属于下篇的分省详说内容放到了全书的最前面。^①

也有学者对此质疑，但又作错误描述。比如有人提到，“虽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凡例》中说是书分为两卷，而实际上无分省（州）内容，但说明作者一开始就准备写各州情况为另一卷”。^②

由于这种错误装订以及只有反映全国大略的目录，导致不少学者在谈及此书时，直接根据目录认为此书共二十七卷，论述亦从此书的卷之一“觅新土”开始，而忽略了放在目录后，而在论述全国大略的文字之前的分省详说部分。

这种错误装订还引起学术界的两个错误认识：一、在看到比较容易获得的《大美联邦志略》一书时，发现有上下两篇，自然而然地推出《大美联邦志略》是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为基础，“增加了各州情况的介绍”的错误结论；^③二、以为1844年或1846年版所述内容与原书无大异。^④

第二节 第二版《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

根据哈佛所藏《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胶片F35），香港藏版封面正中题“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右上一行题“道光二十四年镌”，左上标明“上卷”两字，左下一行“香港藏版”。该书连封面共74页。版口内刻书名和页码。版口内书名与封面题名不同，是为“亚墨理格洲合省国志略”。

从内容看，1844年香港藏版《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上卷）一书没有目录、序言、作者署名，也没有地图，记事迄至道光十八年前，其内容基本上是抄录《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下篇。此版不见下卷。

《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改动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下篇中的个别字词，更改了长短句，以及在不改变原来意思的情况下作简单的语式调整。总体上讲，这些变动多为改进之处。使文章前后语句更协调，意思更连贯。如《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九“土产”中描述美国植物：

……又其次则有榆、栗、松、柏、杉、柳及养蚕之桑等，故亦有绸缎。至各处皆有者，则平果、葡萄、沙梨、桃、梅等果。惟甘蔗、稻谷则合省之南方有也。

对此，《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则介绍如下：

……又其次则有榆、栗、松、柏、杉、柳及养蚕之桑等，故合省国亦有绸缎。以上各种树只数省有之。至各处皆有者，则平果、葡萄、沙梨、桃、梅等果。惟甘蔗、稻谷则只合省之南方有也。^⑤

除了内容上有细微的进步外，在刻工上，《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也比《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① 该处错误装订的推测受李晓杰论文启发。

^② 吴义雄前揭书，页426。但在同一页注2中作者提到刘路生点校本，说明该学者根本没有仔细翻阅《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内容。

^③ 比如伟烈亚力上述引文，比如吴义雄前揭书页426。

^④ 熊月之前揭书，页152；吴义雄则称：1844年香港重刊时书名为《亚美利格合众国志略》，其上卷内容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同。吴义雄前揭书，页426。

^⑤ 着重号系本文作者附加，下同

有所进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七“国政五”中提及，“其犯法监禁者，道光元年则有七十一人，二年则……六人则九十六人，…”此处“六人”显然是“六年”之误。在《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中则改正之。又如，初版下卷第十九章“辨教邪正”末尾，“……如年张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此乡中之常礼也。”1844年版中也作纠正。再如，初版下卷第二十二章“书籍”中提到铅活字，“合省或以沿字摆板，或以沿字一定之板，…”1844年香港藏版则改为“铅字活板”和“铅字”。

但也有许多错误不见改正。如“鼓棹前驱”的“棹”字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误为“掉”字，《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仍存此误。

对于1844年香港藏版，顾长声称经过增订，书名改称《亚墨理格合省国志略》；^①Lazich和王家俭称香港藏版题为《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②杨玉圣称1844年版题为《亚美理格合省国志》^③；吴义雄称之为《亚美利格合众国志略》；著名汉学家恒慕义（A. M. Hummel）所编的《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第二卷第504至505页说初版修订后于1846年出版《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④。依据哈佛所藏，可知上述说法均不确切。

至于1846年版之说，考察国内外学者论述，基本上直接或间接引自伟烈亚力的著作，对该书最详细的描述就是伟烈亚力上述相关文字的译述，迄今为止没有发现任何论著对其作其它具体描述，也无人表示有看到过裨治文1846年版的著作。而伟烈亚力所述1846年版的内容和页码均与1844年香港藏版相近。笔者怀疑伟烈亚力把1844年误为1846年，而实际上并不存在1846年广州版。^⑤

第三节 第三版《大美联邦志略》

1、《大美联邦志略》的版本

1861年，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基础上修订而成《大美联邦志略》。从哈佛燕京学社制作的《早期来华传教士中文著作总汇》的胶片F36中看，《大美联邦志略》封面正中题名《大美联邦志略》，封面右上一行题“辛酉夏续刻”（辛酉年为1861年），左下一行题“沪邑墨海书馆活字板”；第二页正中题“马邦毕礼遮邑裨治文撰”；版口内题名则为《联邦志略》。全书217页，半页10行，行21字。书中有作者自序一篇，作者原序一篇^⑥，中国文人宋小宋序一篇，“发凡”九则，以及梁植写的“跋”一篇。

《大美联邦志略》仍分上下卷，但修正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错误装订。《大美联邦志略》发凡第一则写道：

^①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页32。

^② Lazich, *ibid.* p.154. 王家俭《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

^③ 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页10。

^④ 恒慕义（A. M. Hummel）编《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第二卷，页504—505。

^⑤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117；彭斐章主编的《中外图书交流史》（页204）也认为裨治文于1846年在广州，修订该书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何大进《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改革》，页149；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页474；王家俭《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载《大陆杂志》，第38卷第6期，1969年3月；等等。

^⑥ 此版原序并不等同于1838年版序，只是其中一部分，而且语句不同。相关论述详见下文。

是书订为上下两卷，上卷总括全概，历叙拓地开国之原，风土人情之要，便阅者之览其大略也；下卷按邦列国，每志附后，载方域之广狭，记物类之专产。^①

上述发凡内容切合《大美联邦志略》的实际体例。

根据伟烈亚力的叙述，国内外不少学者以为该书在上海墨海书馆出版时，易名《联邦志略》，时在1862年。^②其实，该书在墨海书馆出版时改名为《大美联邦志略》，时在1861年。

裨治文写给奥立芬的一封信中提到，

中文美国史已经出了一个新版本，其中配有50幅图。^③

此信写于1861年，即咸丰十一年。作者自序以及梁植的跋中都题“辛酉夏”，或“辛酉之岁孟夏”。因为是“夏”，所以不存在因为阴阳历之差而导致咸丰十一年是公元1862年的可能性。

熊月之认为裨著“在1846年重版十六年后，于1862年，作者对此书重加修订，在上海重版”。^④此话显然自相矛盾。他在《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前文中，已经提到裨治文“1861年病死于上海”，^⑤所以作者不可能又在1862年重修此书。^⑥

有不少学者误称《大美联邦志略》为《联邦志略》，可能是因为该书每页版口内书题名“联邦志略”的缘故。

2、《大美联邦志略》的内容、文辞等方面的变化

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相比较，《大美联邦志略》除了修正原来的错误装订外，在内容、文辞等方面都有一些变化。

文字表述上，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相比，《大美联邦志略》标题显得更为整齐、清晰。上卷标题均采用四字一句，如“觅地原由”、“天时地气”、“百工技艺”、“商贾贸易”等；下卷则均用两字，如“编邦”、“马邦”、“花邦”等。由于书中邦名、地名多用音译词，有时多至五六个字，而且译音每人不同，不利于读者阅读，所以作者特意选择首字代替。如“马泄朱些斯”名“马邦”，“干捏底格邦”名“干邦”。

对于“God”一词，1838年版译为“上帝”，1861年版则用“神”或“造物者”替代。元老院、绅董院替代议事阁、选议处。

内容上，有增有删。最明显的是增加了大量图片。这弥补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无图的缺陷。作者认为，要读此书，“宜先明地势，地势不明，则不知各邦之方位，如读之未读”。^⑦所以上卷配

^① 《大美联邦志略》发凡。

^② 除了上述提到的以外，还有：恒慕义(A. M. Hummel)称该书共107页(《清代名人传略》第二卷，页504—505)；保罗·科恩《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页641)；何大进《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变革》，页149；孙建军《近代日语对汉译西书新词的吸收和发展》，载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中日文化史论集》，页284。(意)马西尼、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对《联邦志略》出版年，有时提1861年，有时提1862年(页211)。马西尼中译本还把裨治文有时认为美国人，有时又误为英国人，不知何故。

^③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 256.

^④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117。

^⑤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98注释1。

^⑥ 熊月之先生在其《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一书第109—110页，罗列“19世纪60年代至戊戌变法以前外国人在中国介绍的西方历史、政治学说要目”中，对裨治文所著《联邦志略》的出版单位、出版时间表示不详，并备注“记美国历史，一册一卷”。但又在该书第145页注释1中提到裨治文《大美联邦志略》，“墨海书馆版，上卷”。不知何故。

^⑦ 《大美联邦志略》发凡。作者在下卷开首时再次强调“阅是书者，须以联邦全图与各邦图合看”。

有古、今地理图各一幅，东、西半球地图一幅，大美联邦全图。下卷每州都有一幅地理形势图。

书中所附地图并非一般的示意图，而是按照一定比例绘制，裨治文在《发凡》中说明这些地图的绘制原则：

书中各地图，皆列度数，有一格一度者，有一格四度、十度者，皆取其易于记里也。按一度，当中国之地二百五十里。

《大美联邦志略》中还配有“可绘者”图式“以助见闻”，比如上卷就有美国国旗、公议堂、兵船、火轮船、运船图式、四马车、火轮车、美国公羊母羊、马力耕田、乳牛、乡居房屋、救水车、地球测天镜、印书机，新屋及马车等图式。下卷“补余”一章中还配有黑人、土人图各一幅。

《大美联邦志略》上下两卷图片相加，共 60 余幅，不知裨治文为何在书信中提到的只有 50 幅图。^①这六十余幅图的增加使该书达到图文并茂的效果，使中国读者更能在直观上认知美国。

其次是章节的调整。《大美联邦志略》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下篇的 27 章节压缩为上卷十八章。《大美联邦志略》下卷则由《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上篇的 20 个章节扩展成 41 章节。

从形式上看，《大美联邦志略》上卷十八章，基本上是《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下篇 27 个章节的重新调整。基本变化可见表 2。

表 2 《大美联邦志略》上卷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下篇对照表

1861 年版上卷	对应 1838 年版下卷	备注
觅地原由	卷之一“觅新土”	
疆域度数	卷之二“分野度数”	
山川平地	卷之八“山川天时附”前半部分	
邦都道路		新增章节
天时地气	卷之八“山川天时附”后半部分	详细介绍地球五带的划分，为 1838 年版所无。
土产物类	卷之九“土产禽兽附”	
开国原始	卷之三“创国原由”	
民脱英轭	卷之四“百姓自脱英国之制”	
建国立政	卷之五“开国以后史略”	突出“费城会议”
设官分职	卷之十三“国政一 国领、内外大宪衙门”、卷之五“开国以后史略”	
理刑规制	卷之十六“国政四 审查罪名之制”、卷之十七“国政五 刑法监狱之制”、卷之十四“国政二 制例之设定”	
语言文字	卷之二十“土音本源”	
学馆书籍	卷之二十一“学馆” 卷之二十二“书籍”	

^①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p. 256.

教化说源	卷之十九“辨教邪正”	增加圣经故事
百工技艺	卷之二十三“各艺”	
商贾贸易	卷之十二“贸易”	
善举述略	卷之二十四“仁会”	
风俗人事	卷之二十五“五伦” 卷二十六“礼义规模”	

上卷各章内容所占比例并不匀称，有些专题论述较多，有些章节则非常简略，如“民脱英轭”一章共占五页半，而“商贾贸易”章则仅占一页半。作者却声称上卷篇幅较匀称，下卷详略不等。^①不知何故。

下卷 41 章主要是增加对美国新拓展的几个州的介绍。《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只提到 26 个州，详细介绍的则只有 20 个州。《大美联邦志略》则有 41 个，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原书，并每州一章介绍各州的地理位置、特产等，依次为缅邦、牛邦、花邦、马邦、洛邦、干邦、纽邦、乌邦、边邦、特邦、玛邦、费邦、诺邦、叟邦、卓邦、福邦、雅邦、密邦、禄邦、德邦、耳邦、典邦、建邦、呵邦、米邦、音邦、伊邦、默邦、爱邦、威邦、梅邦、弟部、拿部、刚邦、印甸诸部、柳部、尔部、武部、华部、安部、嘉帮^②。

章节的增加并非简单的增添几个州而已，裨治文在《大美联邦志略》中更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的统计数据，具体所述内容更加准确。比如，谈及马萨诸塞州的人口，初刻本写“居民则六十一万零十四人”，《大美联邦志略》则云“据前乙卯年（指 1855 年）核算……共一百十三万人”。在说到缅因州的面积时，初刻本讲“兹省内地之延袤，极与浙江省相似”。后书则言“计邦内之疆域与华地较，约比浙江省五分之四”。

经过二十余年发展，美国经济、科学、文化迅速发展，这在 1861 年版《大美联邦志略》的内容中无疑也有体现。裨治文在《大美联邦志略》中介绍了许多新发明、新事物。比如铁路，1830 年裨治文来华时，铁路还不存在，到 1860 年时，美国铁路行业迅猛发达，《大美联邦志略》的“邦都道路”一章中就提到美国铁路已达八万余里。

另外还有电机远报（电报）、测天镜（即天文望远镜）、传真镜（即照相机），以及显微镜，热气球等等。《大美联邦志略》新增的“邦都道路”、“商贾贸易”等章节，在“天时地气”一章非常详细地介绍为 1838 版所缺的五带知识。总之，对美国国力的介绍更为全面。

其删减部分最值得注意的是，裨治文在《大美联邦志略》书中删掉了初版中卷二十七“推度将来”整整一卷的内容。这一卷实际上是该书的结束语。我们不妨引该卷的最后部分来看一看：

^① 《大美联邦志略》发凡。

^② 以上各邦全名及今译依次为：缅、缅因州；牛、牛布希州、新罕布什尔州；花、佛蒙特州；马、马萨诸塞州；洛、洛伦州；干、干底格州、康涅狄格州；纽、纽约州；乌、乌遮尔些、新泽西州；边、边西威业、宾夕法尼亚州；特、特拉华州；玛、玛理兰、马里兰州；费、费尔治尼亚、弗吉尼亚州；诺、诺格阿利纳、北卡罗米纳州；叟、叟格阿利纳、南卡罗米纳州；卓、卓尔治亚、佐治亚州；福、佛罗里达州；雅、雅拉巴麻、亚拉巴马州；密、密苏比、密西西比州；禄、路易斯安那州；德、德过瑟斯、德克萨斯州；耳、耳刚色斯、阿肯色州；典、典西、川纳西州；建、建德基、肯塔基州；呵、呵海呵、俄亥俄州；米、米世干、密执安州；音、音地那、印第安纳州；伊、伊利诺斯州；默、默疏理、密苏里州；爱、爱约娃、艾奥瓦州（又名衣阿华州）；威、威士干清、威斯康星州；梅、梅尼所达、明尼苏达州；弟、弟哥达、达科他州；拿、拿布拉上格、蒙大拿州；刚、刚色斯、堪萨斯州；印、印甸、俄克拉何马州；柳、柳墨足科、新墨西哥州；尔、尔理瑛那、亚利桑那州；武、犹他州；华、华盛顿、华盛顿州；安、安里恩、俄勒冈州；嘉、嘉理符尼亚、加利福尼亚州。

……欲如是，则必立国法，定章程，勿横征税餉，勿刻剥小民，使农工商贾共踊跃而乐利无穷。由是百姓足而君无不足，仓廩府库可永无匱乏之忧。设书院，辨正教，感以其良心，启悟其德性而仁义礼智，虽愚夫亦眈眈争趋。即或大兵临境，而我之国富兵强，亦何畏彼哉。

然非于太平之日，预防失国之心，兢兢业业，慎始慎终，上畏上帝，下念小民，清心寡欲，敬身修德，而乃暴虐纵恣，赏罚不平，致触上帝之怒，惹万民之怨，则众叛亲离，国家解体，亦安有不失位者哉。是在乎为君者自取耳。

兹因纂合省志，故特跋数语，以警天下之为国君者，幸其勉诸。^①

该卷名为“推度将来”，好像是展望美国未来之意；但实际上，这一番议论很难分得清是在言说自我，还是在影射他者，作者似乎是针对大清时弊，在借题发挥。作者在《大美联邦志略》中去掉了这一节，显然是因为时过境迁，那一番话已经失去警策的效果，所以不再多说。

对于一些文化设施的记录，《大美联邦志略》中对文化设施的介绍不如《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多。《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卷二十一“学馆”、卷二十二章“书籍”压缩为《大美联邦志略》中的一章“学馆书籍”。裨治文在《大美联邦志略》中介绍每州概况时提到的文化设施，也不如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多。《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每州详介时，势必提及该州之文化、教会、慈善机构等。但在《大美联邦志略》中，这种倾向大大淡化。如在介绍马萨诸塞州一章中，《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曾提及全美最大的大学（即哈佛大学）：

大书院共六所，内一所自始建造今，已历二百余年矣。于二十六省之内，书院则当推他为大，又当推他为始作，其后各省方效焉。内为师者三十五位，受业者三四百人，内藏书四万本。

但在《大美联邦志略》中，仅用简单的语句一笔带过，“邦中幼学八百，大学三，又大公学三四所”。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马萨诸塞州府波士顿的文化设施描述较详，谓及：

通城文风浩盛，书房数所，内有一藏书之室，置书二万五千本，各房共计所藏公书，约七八万本，其书官员士子，皆可进观，惟不能私携回家而已。

《大美联邦志略》中则无这段描述波士顿市立公共图书馆的文字。可见，两书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另外一个较大的变化是《大美联邦志略》原序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在长度、内容以及文辞上相差较多。《大美联邦志略》的“原序”，并非初版中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大美联邦志略》“原序”为380字，较之《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656字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叙述更加简约。《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以表达“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观念的文字（73字）开场，这段内容在《大美联邦志略》版中完全删去了，代之以裨治文身世交代。^②

^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七，“推度将来”。

^② 需要提及的是，在《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五十九中，有魏源所引《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原志序”：“……今年三十有七，竟得渡海绕地而及中华。历见英吉利、法兰西、荷兰、西班牙、利未加、暹罗、日本、中华等国之上与各国之文艺，岂不奇哉？回忆少年在本国舍农业儒、登大学之堂者三年，始进会城书院而肄业，于各国古今文史、地理、天文、律例规条、四时土产悉欲博览研求……时年二十有八，家无内顾，遂欲游览异乡之风俗，兼以予国所闻传播异土。……叹华人不好远游，至我西国之光采规模，杳无闻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或者上帝之启予心乎？将使宜而播之，联四海为一家也。不揣固陋，创为汉字地球图及美理哥合省国全图，又以事迹风

两序的差别不仅仅是在长度、内容上，在语气上的差异更大。这从两序交代撰书日的结尾部分可领略一二。初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

……予时二十有八，适无内顾之忧，老父弟兄，一堂乐聚。于是欲游学于外国，以免坐井而观天，兼使异乡之言行，予得见之，予之见闻，播传异土。第斯时予也，恃己知识，如针眼之无多；富贵功名，如浮云而无有。惟善为宝，时防陷溺于恶之中；广博勤求，必究至见闻而止。今得遇华人，领略唐书七八载。每一交接，义更重乎断金。予虽荒陋无闻，华人多见广识，惟合省地與土产、人物规条，一切国中事物，尚未领悉于胸中。故予不揣庸愚，略为详说。……或百年后，流入中土，苟有不耻下观者，故欲为之击节设道。予言庸劣，幸勿扯碎而掷投。虽然，然以愚意推之，纵不可希圣希贤，第于未见未闻之辈，未尝无一小补云尔。

《大美联邦志略》“原序”：

予时年二十有八矣。是时家有诸季之托，身无内顾之忧，于是立意传道异方，旷览诸俗，以验生平所学之是，兼以予国所见闻者，播之异土，或不虚度也。既于粤东，领略华书数载，时与其地之文士相谈论，乃叹华人不好远游，以至我国风土人情，茫无闻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洲也。近日其创造者之欲启予心乎，殆欲使予宣扬圣道，联四海为一家也。爰不揣固陋，凡本国之大略，一一分叙……百年之后倘有不耻下观者，其将叹赏之乎，抑将拉杂摧烧之乎，均不得而知也。然而驰观域外之士，必不方隅自封而笑我也。

原文中比较谦逊、曲承的表达在后书原序中荡然无存。谈及来华日的时，原书只道是“欲游学于外国，以免坐井而观天”，根本没有提及传教之事；后书则直接说明是为“传道异方”。

在谈到撰书日的时，原文谦虚地表示“予虽荒陋无闻，华人多见广识，惟合省地與土产、人物规条，一切国中事物，尚未领悉于胸中。故予不揣庸愚，略为详说”，含有仰慕、曲承中国人之意；后文则毫不客气地说“乃叹华人不好远游，以至我国风土人情，茫无闻见，竟不知海外更有九洲也”，其中裨治文对中国人的鄙夷、骄傲之态暴露无疑。

从以上所述可看出，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裨治文企图塑造一个可与人清媲美的富强、广袤、文明的美国形象。而在《大美联邦志略》中，裨治文则大胆地宣扬美国在国力以及文明教化上都比中国优越。如果说《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还只是一块企图用西方文明、科学知识来打开中国人门的敲门砖的话，那么，《大美联邦志略》则纯粹是宣扬西方先进科学与基督教文明的成果展了。^①

这种措辞上的微妙变化是裨治文在华二十余年来境遇变化的反映。

在前后两个版本相隔的这二十多年间，美国在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有了飞速的发展，疆域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上的地位也直追英国。中美关系的势态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鸦片战争之前，尽管美国关于中国的记载极其少见，但大体上还是对“天朝上国”怀有敬畏与羡慕之情。

俗分类略书。百年而后流入中土，或有不耻下观者，其将击节叹喜乎？抑将拉杂摧烧之乎？虽然驰观域外之士，必不方隅自封而笑我已。道光十八年，岁次戊戌孟夏，高理文题于新嘉坡之坚夏书院。”显然，“原志序”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有不少差距，而与《大美联邦志略》的“原序”较为相近。对此，有人“怀疑魏源所引的《美理哥国志略》应该是裨治文1844年或1846年的某个版本”（尹文涓《裨治文笔下的美国形象——从〈大美联邦志略〉的前后两个版本说起》）。由于没有发现相关材料，笔者不敢妄下断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1844年《亚墨利格合众国志略》上卷没有出现任何“序言”。

^① 尹文涓《裨治文笔下的美国形象——从〈大美联邦志略〉的前后两个版本说起》。

迟至 1840 年，美国著名的《亨氏商人杂志》(Hunt's Merchant Magazine) 还认为“中国人体现在生活数十方面的工业与创造力是了不起的”；^①但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消息传到美国时，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竟然输给了曾经被美国人战胜的英国，“中国是衰微的，奄奄一息的，由过去的荣光大为衰落了。”^②。如笔者在其生平中所述，裨治文在华长达三十余年，对中外事务极其关注，并积极参与，所以他对中外之间，特别是中美关系的认识非常清晰和深刻。

对中国人而言，美国在中国的活动，特别是最初几十年在中国的活动，与主要的和好战的侵略者英国人相比，只是一个次要的“蛮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没有纯粹的中美关系。^③美国人是“外国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其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所以要使持“天下、四夷”观的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认知和接受不显眼的美国，本就困难。若是裨治文在言语上触怒中国人，其难度可想而知。

但由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激发了中国知识界认识西方、研究世界的热情，加上早前《海国图志》、《合省国说》征引该书而导致的宣传效果，所以“求者日众”。^④无疑，裨治文把握了中国知识分子主动接纳、认知美国的心态，因此无需担心因优越感的流露而受排斥。

3、修订《大美联邦志略》的华人助手

帮助裨治文修订出版《大美联邦志略》的，有梁植、宋小宋等人。

梁植在 1861 年墨海书馆出版的《大美联邦志略·跋》中写道：

……先生爰召植曰：是书初作，尔与有劳。今垂二十余年，国事日有增益，吾将重刻新之，子盍为我校乎。植重因师命，不敢辞。

由此可知，梁植不但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成书过程中提供过帮助，又为《大美联邦志略》做过校订工作。

除了梁植以外，还有宋小宋帮助裨治文修订《大美联邦志略》。宋小宋，江苏金陵人，1857 年夏天，在上海躲避兵乱，因此与裨治文相识，1859 年开始帮助裨治文修订《大美联邦志略》，长达一年之久。这些情况可以从《大美联邦志略》的“宋小宋序”中得知。宋小宋写道：

裨君者，联邦之成德士也。余初不之识。丁巳夏五，余避兵于海上，始遇之。遂相谈论，缔文字交，日以彼此所学相教益，且为余道联邦事甚详，以故余颇知之……去年，裨君有复刻邦志之意，出其初草属订之……

序中所言“兵乱”当为太平天国运动。

此外，邹振环根据王韬^⑤日记，发现管嗣复也曾帮助修订《大美联邦志略》。王韬在 1859 年 4 月 15 日的日记中写道：

^①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页 119—120。

^② 赖德烈《早期中美关系史》，页 120。

^③ (美) 欧内斯特·梅编《美中关系史论》，页 37。

^④ 梁植《大美联邦志略·跋》

^⑤ 王韬(1828-1897)，清末政论家。初名利宾，后改名韬，字紫诠，号仲弢，又号菽园老民、天南遁叟。江苏长洲人(今吴县)。1849 年在上海墨海书馆工作。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被清廷通缉，逃往香港。1867-1870，赴英国译书，并游历法、俄等国。1874 年在香港主编《循环日报》，评论时政，宣传变法。主张设议院、广贸易、开煤矿、筑铁路、兴织红、造轮船、办学校。1884 年回沪，主持格致书院。著作有《菽园文录外编》、《菽园尺牋》。

小异近于裨治文处译改《美理哥地志》，已得数卷。米利坚，新辟之地，人至者少，是编乃裨君纪其往来足迹所经，见闻颇实，倘得译成，亦考证海外舆地之一助也。^①

这里的“小异”为管嗣复之字。管嗣复（？—1860），江苏上元（今南京）人。管嗣复为清代文学家管同之子，颇有文学修养，王韬称管同父子两“先人异之先生有俊才，古文规法庐陵，可与桐城姚姬传相伯仲；小异秉承家学，造诣深邃”。^②1853年，太平军占领南京，他被任命为军中文书，一年后逃出避难于苏州邓尉山，遇上艾约瑟，两人一谈即“极其契合”，一同来到上海。后来帮助传教士医生合信译成三种医书，《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如婴新说》，“风行海内”。^③

李晓杰认为，宋小宋与管嗣复的经历颇为相似，二人都是南京人，同为避太平军而从南京迁往上海，又都帮助裨治文著书，所以李晓杰怀疑“管嗣复与宋小宋为同一人，换言之，宋小宋可能是管嗣复所使用的一个笔名”。

笔者认为李晓杰的推测比较大胆，虽然目前缺乏相关材料证明，但还有一定的可能性，因为管嗣复曾受雇于墨海书馆是可以确证的。

西方传教士来华时，他们的中文文辞较涩，不适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因此其译稿及所撰写的文字需要中国学者来润色。这是早期新教传教士著作出版特征，裨治文也不例外。或许为当时传教政策所制，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早期作品中很少提及中国助手之名号，所以很难查证当时帮助过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助手。随着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增多，一些有名有姓的华人助手逐渐为传教士们公然提及。比如墨海书馆中就有一批襄助西士编译的中国学者。墨海书馆的第一位中国编辑就是王韬。此外尚有李善兰、沈毓桂、张福信和蒋敦复等人，管小异也在其中，他们都是受雇于人，“删订文字，皆系所主裁断”。^④

4、出版机构

虽然宋小宋与管嗣复是否实系一人，尚待进一步证明。但是，对于出版《大美联邦志略》的印刷机构——上海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Press），我们还知道得比较清楚。

墨海书馆是由伦敦会传教士主办、以出版宗教读物为主、兼出一些科学知识书刊的出版机构。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后，伦敦会在巴达维亚的印刷所搬迁到上海。^⑤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和雒维林（William Lockhart）负责迁所事宜，1848年全面建成投产。^⑥成为上海第一家有铅字设备的印刷所。

有意思的是，墨海书馆给当时的中国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中国人发现印刷所内用牛拉印刷机时无不称奇。曾有浙江嘉兴诗人孙融作《洋泾滨杂诗》一首形容：

车轮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

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⑦

^① 《王韬日记》，页107。

^② 王韬《翁牖余谈》。

^③ 王韬《瀛海杂志》卷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九辑。

^④ 王韬《鼓园尺牍》，《与所亲杨茂才》。

^⑤ 胡道静的论文《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1988年第1期）对墨海书馆地址有详细研究。

^⑥ 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页104；江文汉《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上）》，《出版史料》1988年2期。

^⑦ 王韬《瀛海杂志》卷六。

海盐黄韵珊作《海上蜃楼词》咏之：

榜题墨海起高楼，供奉神仙李邕侯。

多恐秘书人未见，文章光焰借牵牛。^①

但是印刷机靠牛拉又看不到牛粪脏乱的景象，这种景象给王韬留下颇深印象。王韬 1848 年参观墨海书馆时描写馆内景致：

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版机器印书，竞谓创见。余特往访之。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观其室中，缥緜插架，满目琳琅……后导观印书，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书楼俱以玻璃作窗，光明无纤翳，洵属玻璃世界。字架东西排列，位置悉以字典，不容紊乱分毫……^②

墨海书馆先由麦都思负责，1847 年伟烈亚力来华后，接任印刷馆事务。艾约瑟牧师也曾一度负责过书馆的工作。墨海书馆的经费由伦敦会资助，主要任务是为教会出版《圣经》及其他传教宣传品。伟烈亚力和艾约瑟来到后开始译印西方科学书籍，包括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地理、植物学、医学和一些综合性科学书刊等。墨海书馆何时停办，时间不详。光绪初年的《中报》和《万国公报》上，还有它的广告，可见 19 世纪 70 年代还在活动。^③

墨海书馆的出版物，包括中英文书刊，以出版中文书刊为主，尤其是圣经和传教小册。但也印刷一些非宗教读物。正如艾约瑟所说：“我们的首要目标在于传授宗教的真理，但我们也不轻视在中国出版启蒙观念和科学主题。”^④有人曾经统计墨海书馆以科学知识为内容的出版物，总共只有 23 种。^⑤笔者以为恐怕有所遗漏，因为至少应该包括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这些包含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人文史地的书刊，是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人难得一见的科学新知，对社会的影响更大。可见，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也是为当时整体的需要。

第四节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辑录的《美理哥国志略》

裨治文的上述几个版本流传较少，今人比较容易看到的主要是《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所收的高理文著《美理哥国志略》。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收“美国高理文著”《美理哥国志略》。全文共 36 段。第一段介绍哥伦布发现美洲；第二、三段简介美国的地理位置、周边国家、英法等国在北美的殖民争夺、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掠夺、独立宣言、华盛顿至范布伦历任总统；从第四段至第二十一段介绍加入联邦十八州的建立经过、地理位置、气候、主要城市、人口、物产、商业、官制等；第二十二段讲述西部印第安人的生活与风俗；第二十三段到结尾介绍美国的人口与移民、山脉、河流、气候、矿产、机器织布业、对外贸易、政治与司法制度、慈善事业、教育、军事、民俗风情等。

^① 王韬《瀛寰杂志》卷六，“李邕侯”指李善兰，“借牵牛”即指用牛拉机器。

^② 王韬《漫游随录》。

^③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页 187。苏精认为墨海书馆于 1865 年底结束。见苏精前揭书，页 238。

^④ *Edkins to Tidman*, Shanghai, 12 April 1852. 转引自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页 235。

^⑤ 见苏精前揭书，页 234-236。

对于《小方壶斋輿地丛钞》的内容与《海国图志》的关系上，一部分学者存在分歧。吴泽、黄丽镛认为在《海国图志》中，《美理哥国志略》差不多大部分被采用了，且特别冠于篇前。^①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把《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所收入的内容视为除“序”之外的原本全文。他认为，除个别文字遗漏或删改外，魏源乃是将其全部而非有学者所谓“大部分”辑入《海国图志》。^②邹振环则认为《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所收内容大致反映了该书早期版本的面貌，与哈佛燕京学社所藏版本有着明显的区别；很可能是转抄于《海国图志》，因此两者所录书名相同，但又不同于真正原本；《海国图志》收录的个别内容未见于王锡祺书，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王锡祺的漏抄。^③通过比较，笔者对后者之说颇为赞同。

据笔者研究发现，《小方壶斋輿地丛钞》与《海国图志》版的区别在于，一是《海国图志》收录的个别内容未见于王锡祺书。《海国图志》卷九十四摘录的“西洋器艺杂志”中有两段关于西国书籍、新闻纸（即报刊）、历书、语言文字的内容《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没有抄录。二是《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没有全部抄录注解部分，但行文更加连贯、顺畅。魏源基本上照章全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而《小方壶斋輿地丛钞》对标注大多不录。例如《海国图志》载：

立首领、设国法之时，止有十三部，（见第三章）至乾隆五十六年，增华满部……通计二十六部、户约有千三百余万矣。（部落之名，即本书中亦多不同，本无定字。）

上文摘录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下篇卷之五“开国以后史略”，其中注文不见于《小方壶斋輿地丛钞》。

另外，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輿地丛钞》在收入輿地书籍时大多进行过删节，绝大部分輿地著作都是不收序跋的，对《美理哥国志略》亦不例外。

所以《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所收的《美理哥国志略》并不同于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另外附带指出的是，《小方壶斋輿地丛钞》所载各部名称依次为：缅部、新韩赛省、华满部、马沙诸些、罗底岛、干尼底吉、新约基、边西耳文、底拉华、马理兰、南驾罗连、北驾罗连、暕治亚，以及建人基部、亚喇罢麻部、美士细比部、累斯安地、典尼西。但前面十三个州并非有些学者认为的美国建立时的“最初十三州”^④。最初十三州中不包括缅部（缅因州）、华满部（佛蒙特州），而包含费治弥亚（弗吉尼亚州）、新遮些（新泽西州）。关于这点，梁廷相通过阅读，认识比较清楚：“二十六省中，先得者费治弥亚，十三省首焉。至是乃改首缅。”^⑤

^① 吴泽、黄丽镛《〈海国图志〉研究》，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② 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页314、331—332注释13。

^③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页81、页148—149注释42。

^④ 王立新认为是“最初十三州”。王立新前揭书，页298。

^⑤ 梁廷相《合省国说》卷二，页85。

第五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内容和特色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是一个美国人为了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而写的。裨治文对美国社会的介绍，反映了他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反映了他为沟通两种不同文化，在语言翻译上所作的努力。

第一节 内容

裨治文在中国生活时，中国朝野上下弥漫着“天朝上国”的观念，把外国看作“蛮夷”之邦。裨治文等早期来华传教士觉得非常有必要让中国人知道不仅中国是个文明国家，西方国家也是文明社会，而且西方国家的文明程度甚至比中国更高，还要开化。这正是裨治文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目的，因此，裨治文在书中，除去对美国历史沿革的介绍外，特别突出美国文明的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文明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社会救济制度方面、政治制度方面等等。

1、对美国史地的介绍

作为一本史地著作，裨治文对美国的地理自然着墨较多，该书上册详介 20 州的地势、山川、河流、湖泊，以及气候，下篇则专列两章介绍全国自然地理的概况。作者用简洁的语言给读者描绘出美国全国的山川河流分布图，让中国读者知晓美国也有广阔大地。

裨治文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时，美国共设 26 州，作者在上篇详细阐述其中 20 个州的建立经过、地理位置、地势、气候、特色物产、商贸、人口、官制、学校（书院）、教堂、慈善机构（仁会）等。其中 20 州的名称与现今通行译名之对比，可见下列译名对照表（表 3）。

表 3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20 州译名对照表

原文	英文	今译
缅省	Maine State	缅因州
新韩赛省	New Hampshire State	新罕布什尔州
华满省	Vermont State	佛蒙特州
马沙诸些省	Massachusetts State	马萨诸塞州
罗底岛省	Rhode Island State	罗得岛州
干尼底吉省	Connecticut	康涅狄格州
新约基省	New York State	纽约州
新遮些省	New Jersey State	新泽西州
边西耳文省	Pennsylvania State	宾夕法尼亚州
底拉华省	Delaware State	特拉华州
马理兰省	Maryland State	马里兰州
费治弥亚省	Virginia State	弗吉尼亚州
驾罗连北省	North Carolina State	北卡罗来纳州
驾罗连南省	South Carolina State	南卡罗来纳州

佐治亚省	Georgia State	佐治亚州
亚喇罢麻省	Alabama State	亚拉巴马州
美士细比省	Mississippi State	密西西比州
累斯安省	Louisiana State	路易斯安娜州
典尼西省	Tennessee State	田纳西州
建大基省	Kentucky State	肯塔基州

还有另外六省，包括呵嘻呵（Ohio State，俄亥俄州）、引底安（Indiana State，印第安纳州）、伊理奈（Illinois State，伊利诺斯州）、美苏理（Missouri State，密苏里州）、美是干（Michigan State，密执安州）、阿干骚（Arkansas State，阿肯色州）则没有专列一章详细论述，^①只是在述及相关省份时略有提及。

美国物产之丰富，在裨治文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详细介绍金、银、铜、铁、煤等矿产在美国的数量与分布，并不厌其烦地列出各种飞禽、走兽、昆虫等物产的名称，对植物种类与用处亦有提及。^②

裨治文还以纺织业为例，用细致的笔墨描绘了美国经济的发达。作者提到，美国机器织布业发达，1815年时，只需一女工监督，就可以纺数十车纱，织数十机之布。美国有一个纺织所，“有纺花车一万五千架，每日能织布四千丈”，所需工人只要八百，其中“男一百，女七百”。^③ 机器大生产使棉花的价格下跌，“自道光六年间至今，棉花日增，比之二十年前之价，则已低三分之二”，但是商人所得利润反而比二十年前高，所以织布越来越多。至于大小呢，因为用水力为之，所以愈加精巧、愈加多，并被贩卖于其他国家。

裨治文详细介绍了美国近年来的通商国家和地区、贸易货物种类、进出口船只、贸易金额等，从中展现了美国对外贸易的繁盛。^④

裨治文比较完整地介绍美国建国前的历史。在裨治文看来，北美大陆在美国建立前的情况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作者用大量的篇幅对建国前的重大事件一一介绍，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各殖民主义国家在北美的角逐，到美国获得独立战争胜利。

述及美洲，自然免不了提到哥伦布，裨治文也一样。在裨治文看来，哥伦布发现美洲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他用大量篇幅描述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经过。作者在卷之一“觅新土”中写道：

其初往寻新地者，伊大埋人，名哥伦布，原禀本国之主，求发船以往，国王不允。复奏葡萄牙国王，亦不允。后连年奏西班牙国王，延至八年，然后蒙允。许以大船一只、小船二只，三船内共百余人，于弘治五年八月初三日行。行历二十一日，不见堤岸，同舟水手人等，防有绝粮之忧，众皆欲将他抛弃赴洋，即行返掉^⑤。船督哥伦布看破斯情，惟用善言相劝。后渐见空中有鸟，远有堤矶，且岸畔青草蒙茸，由是欣然有喜色，提千里镜^⑥而远眺，乍见人烟。鼓掉前驱，船至傍岸，手执小旗谢上帝扶持之恩，同舟者方相视赫然，羞惭无地，于是众皆托足

^① 李晓杰介绍的六省中没有“美是干”，却有“费罗哩人”（Florida，佛罗里达）。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中明确列出二十六省的名称，其中并无“费罗哩人”州。可见李晓杰错了。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九“土产”。

^③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一“工作”。

^④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二“贸易”。

^⑤ 原文如此，应为“掉”。

^⑥ 千里镜，即望远镜。

于斯。后至弘治六年正月，舟旋返国。

欧洲各国角逐新大陆的景况是了解美国历史的重要渊源，所以裨治文详细介绍了英吉利人移民美洲新大陆，建立弗吉尼亚、马萨诸塞等十三州的情况。对于人们离开相对文明的欧洲大陆来到荒芜及未知的新大陆，如今的国内外学者认为大致有三方面原因：（1）经济上找生路；（2）政治上找出路；（3）宗教上找活路。作为传教士，裨治文就强调英国新教徒是出于对宗教自由的向往和逃避政治压迫而逃往美洲，建立新英格兰地区。他写道：

……泰昌年间，有英吉利人至新国北方居其地，名之曰毗理某^①。曩英吉利王严谕庶民，奉上帝者，同归画一，不得自认己意，故遵之者无罪，逆之者加刑，由是稟王而徙居新国者，二三百人，盖欲随意而奉上帝故也……^②

为后世瞩目的“独立战争”，裨治文更是大力着墨。作者详细介绍独立战争的缘起。其中对引发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之描述特别细致。裨治文认为，殖民地民众之所以倾茶，是因为英国庇护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企图让买茶的人纳税，而非卖者。他写道：

英吉利王欲加征税餉^③，故与土人勒争。斯时，英吉利土商有船数只至大清贩茶回国，例本卖者纳餉，英吉利王则谕，公司船至此^④，不向卖者收税，而令买者纳也。

所以有东印度公司船数只到“马沙诸些省城波士顿、新约基省城新约基、边西耳文省城费拉地费、驾罗连南省城查士顿”。各个城市的民众采取了对抗措施，“所有至查士顿的茶皆囤积于栈，竟无一人到买，二三年后，变为枯淡无用之物”。“至费拉地费与新约基之茶船，皆被驱逐不许进口”。而到波士顿的茶叶，“夜被土人改装，盖笑脸上船，搬茶投于海中”。自此后，殖民地民众奔走相告：“英吉利王若征买税，我们皆不买……”

波士顿倾茶事件，在郭实猎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被提及时仅有一句，

乾隆三十八年间，公司船载茶叶赴亚墨理驾海口，海关欲征税，百姓不顺，登船将茶叶投海也。^⑤

可见，作为一名美国人，裨治文认为波士顿倾茶事件比较重要。

裨治文对独立战争的经过的叙述相对简略，但这种联合法国抵制英国的做法无疑给当时忧国忧民的中国读者一定的启示。

作者还提到“合省之兵皆民也”，迎来和平之后，众人“弃甲投戈，又复为民”，连华盛顿亦“归田里矣”。而且“耕田之事，不独庶民为然，即首领及官员士子于间（闲）暇日，亦无不耕，如华盛顿是也”。^⑥华盛顿的英雄形象和平民色彩跃然纸上。

裨治文显然也认识到后世所称的《独立宣言》对美国历史的重要性，所以作者不惜笔墨，花了整整5页作介绍，这可能是第一次如此详细的汉文记载。为此，我们特将全文摘录如下：

^① 此理某：Plymouth，今译普利茅斯，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南部城市。德雷克译为Pilgrims（清教徒）。见S.W. Barnett and J.K. Fairbank edit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p.104.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三“创国原由”。

^③ 原刊本“加征”两字挖去未补。刘路生点校本据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九，认为应为“加重”。但下文出现“加征税餉”、“加征粮餉”，而1844年香港藏版中亦为“加征”两字。

^④ 公司：指东印度公司。

^⑤ 道光丁酉年五月，页231下。

^⑥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田农”。

天下之人皆同此心，心同此理。上帝生民，大小同体，生意性命，各安其分，又立国政以范围之，使民不至流于邪僻，是性命本分之有赖也。乃不持不扶，则将焉用其政。然其政非甚有害则民尚可忍而不变，乃英吉利王之凌虐我国，一而再，再而三，我众亦忍至经年屡月，而英吉利王亦复如是，故不得不议立首领，永不遵英吉利，于是合省为一国，合省之名，由此始矣。

至英吉利王凌虐我国之事，指不胜屈，今列数款余后，以共鉴焉。

- 设例欲正而不私，奈英吉利王不准行焉。

- 官民皆欲变通国政之不美者，而英吉利王不从。即有时变通了，亦不准行。

- 旧例增改律例，王须与衿者合议，乃英吉利王往往不许衿者相议焉。

- 每年各省衿者来集省城，酌量规矩，英吉利王乃驱逐之。

- 遇衿者到议厅，欲议公事，王委大宪，即驱散之也。

- 驱逐后，不许复聚酌量。

- 土人稀少，原望欧罗巴人至，乃英吉利王禁之，欲免户口日繁也。

- 旧例犯法，必严刑审判，兹王不遵行之。

- 旧例本处按察司，或先由衿者议选，或先由王择定，均要同商，兹英吉利王自主，不听衿者之谏。

- 旧例各省文武官员各有定额，职奉养廉，皆民所办，英吉利王擅加官额，不与衿者同商。

- 旧例各省弁兵，亦有定数，粮饷亦民备办，兹英吉利王擅自增设调派于各省，亦不商之于衿者。

- 旧例文武员弁，或本土，或外省人不定，有事文武必同议，兹英吉利王不然。武员，则必以京城人供职，有事不与文员商量，惟武员自持，权在武不在文也。

- 英吉利王刻剥钱粮，多于前制，禁停贸易，大异常规，察院自凭升降，衿者不与商量，往往自违法制，而累小民。

- 英吉利王自不守制，故制衰而民无以为赖，今立新政，创邦国，亦无如之何也已。

- 英吉利王所调各水路巡兵，惟有劫掠货船，及毁拆城池，纵火焚烧房屋而已，我民何能堪此。

- 英吉利王使弁兵常居民舍，以便时行欺侮。

- 被劫之良民，务令从他为贼，往劫别艘之资，如有不从，则凌虐而加害。

- 谗唆各省纷争，并唆苗人及居民，使各不相安也。

以上各款，英吉利王屡行，土人屡谏，而王益怒，加害更甚。迨后又请英吉利人助谏云：如王不从，恐国中人心不一，不能忍其害也。英吉利王愈怒，终不肯改。由是无如之何，不得不自创邦国而立新政。自新政既立，则遍示各国，使普天下闻知焉。

在这里，作者处处强调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剥削，有学者认为裨治文在试图迎合中国传统的“官逼民反”思想。^①当然，如果我们把《独立宣言》的原文与各个时期的中译本进行对照的话，可能还会发现更多的时代烙印。

^① Fred W. Drake, *E.C. Bridgman's Portrayal of the West*, p.104.

裨治文在书中还为早期英吉利移民正名。1842年前，西方各国来华之人，常在中国人前互相攻讦，有不少英国商人毁谤美国人，称他们为英国的流犯，所以裨治文特别加以解释：

或曰，合省国原是英吉利罪人，因获罪而充军至此，故在此创邦基。然其说实谬，何可信乎。不过英吉利人迁于乔木矣。

梁植在《大美联邦志略》跋中，亦特述裨治文家世，力辨其不是英国流犯：

先世本英人，因英王残害其异己者，故与诸善士挈眷避此，遂世家焉……先生且耕且读，考试屡邀上等，少登国学，国学者，犹中国之翰林也。

梁植的论述显然受到裨治文的影响。

2、对美国社会制度的介绍

作者认为美国之所以有比较发达的工业，主要是“人力”、“物本”、“知识”三者兼备，特别是知识（knowledge），即科技和工艺技术。裨治文认为知识的重要性无与伦比，认为是知识造就了西方社会的发达。三者的关系是：

独无知识而不能成器……如有物本而无知识，则可延他国知识者以教习焉；或有知识而无物本，亦可往别国运带焉；或有知识、物本而无人力，当以物力代之……^①

裨治文认为政府政策也是工业发达的一大因素，他说：

有能出巧计、作新样之物，则地方官奖励之。^②

作为一部史地著作，裨治文却花了大量篇幅（卷之十三至卷之十七，共五卷）全面介绍美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制度。

首先是详细介绍美国三大权力中心——总统、国会和司法系统。关于“正、副统领”，即总统和副总统，由各人选举而成。其权力、选举资格和在任期限等有关规定为：

统领每年收各省餉项，除支贮库，不得滥用外，每年定例酬金二万五千大元。若非三十五岁以上，及不在本地生者，皆不能当此职。例以四年为一任，期满另选。如无贤于他者，公举复任，若四年未滿，或已仙游，或自解任，则以副统领当之。副统领不愿，则推议事阁之首者。若伊亦不愿，则以选议处之首护理。设终无人愿当此职，则吏部尚书寄书与各省首领，遍示于民，迅择焉。至国统领，水陆武员固任听其指挥，即京内之文员，亦从其政令。若遣使于邻邦，或迎使于别国，皆统领治理。^③

言总统后，则述国会。作者详述参议院（议事阁）、众议院（选议处）两院议员的来源、选举、任期、权限、工作情形等，谓及：

每省择二人至京，合为议事阁；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至议事阁与选议处，皆以每年十二月内之初礼拜一日，同到京之公所，齐集会议。议事阁之职，每省二人，计二十六省共五十二人。选议处臣共二百四十三人。议毕，或回省或留京三五月，各随其便。来年亦复如是。以议事阁五十二人分为三等，以二年为期，各等轮流而退，复择新者，是以每等经六年为一任，

^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一“工作”。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三“各艺”。

^③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三“国政一”。

不过或先或后而已。又定例年未及三十以上者，不能当此职。议事处则以二十五岁以上为例，二年为一任，期满另选，以十二月初礼拜一之日，齐集京都公堂会议。因国中农务、工作、兵丁、贸易、赏罚、刑法、来往宾使、修筑基桥等例，皆此时议定。议毕，各自回家。^①

裨治文介绍国会完毕，即介绍美国的司法系统，作者写道：

国察院有三：管理京城者曰京察院；管理二三省者，曰巡按察院；管理一省半省者，曰巡抚察院。……在京城者，衙门内共有七人，其间一为正，六为副，每年以正月为期，其人齐集会审各案一次。如有因事不如有不至者，四人可审，下于四人不能审焉。京城之内若有不遵例者，亦京察院审之。若巡按察院审事不正，任其转告于京察院……有巡按察七衙门……每巡按察院审事时，如无一京察院在，则不能审。若有要事，则必有二而后可。又每年齐集二次审判。如有人在巡按察院属内犯法，则巡按察院审之而已。至巡抚察院衙门共三十三，每院内一巡抚察院。每年审事四次。若有要事，则无定矣。倘审不公，亦可以转告于巡按察院。此皆国察院也。其外，亦有数省察院，省内犯法，则省察院审之。至若府、州亦如是。凡察院内必有各科房、各差役等，听命于察院。^②

对陪审团制度亦有提及：

人犯既齐，察院在本犯地方择衿耆以助审。衿耆则以十二人至二十四人为额，多则二十五人，少亦十一人。如是犯之亲戚兄弟朋友固不能为，即先知有此事者，亦不能为。审时衿耆听原告、被告之词，照察院之例，出而会议，遂定曲直。众衿耆将情由写明，交于察院，各散回家，察院观何是何非，即照例定罪。^③

裨治文对三大权力中心的介绍，在现代人看来，也已经是非常详尽。作者还显然认识到了三大权力中心相互制衡的关系，他说：

……为审官，则不能会议制例。会议制例官，亦不能兼摄审问也。^④国内倘有人犯法，察院审判后，如审不公，统领亦可以赦之。^⑤

这种认识不可不谓深刻。

裨治文还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州长、市长、镇长等人的选举方法和程序，对镇一级长官描述如下：

县官有积仁，一则以选人为首，所有一切诸事，皆必尽知。即非其所管者，亦必周知焉。二则在县内收饷，必悉知县内人丁多寡，何人有田若干，何人有地有屋若干。三则总理县主一年收支各数，言行各事，登录书内存档，不能苟且漏入漏出。^⑥

裨治文在这里向中国读者表示美国官员非常敬业，对所管辖之事一清二楚，把所有事情原由昭之于众。无疑，其中有想与中国官吏的工作作风作一比较的倾向。

裨治文还详细介绍美国宪法，在其著作中列出《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项的十七款条例。作者

^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三“国政一”。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六“国政四”。

^③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六“国政四”。

^④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三“国政一”。

^⑤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五“国政三”。

^⑥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五“国政三”。

力图呈现给中国读者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美国社会。他在书中写道：

除此例（指《联邦宪法》）外，首领亦不能胡为。虽有贤德及富贵之人，皆不得以虚爵衔饬送，当受者亦必商之议事阁及选议处。使大小文武，皆得仿此而行。国人宜以律例为重，不徒以统领为尊。^①

第所有条例，统领必从，亦必示人格遵。如在例外，统领亦断不为之，无异于庶民焉。^②

美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跃然纸上。

裨治文认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有三个特点：

其一，视四海如一家，不可自专；其二，两国往来必同一体；其三，列国纷争，劝和为尚。

之后，作者历数与其通商之欧亚非各国，并且说美国虽然日渐强大，但与各国相安无事，皆有国使往来，只有在广州设立的是贸易领事。在这里，作者一方面表明美国虽然逐渐强大，但“视四海如一家，不可自专”^③，并无侵略别国之心，包括大清政府。这也是作者当时对中国政府的渴盼。至于“列国纷争”时，美国是否以“劝和为尚”，值得商榷。

在裨治文笔下，美国有着完美的社会救济制度。裨治文在介绍 20 州概况时，细说每州的慈善机构，还在下篇专列两个章节介绍美国社会的救济制度。

裨治文写道，对于贫穷之人，美国社会采取杜微防渐的措施，一方面设法堵住贫穷的源头，一方面接济贫穷之人。如果亲戚朋友不愿接济穷人，则地方官员接济，或者去“济贫院”。穷人在“济贫院”会得到工作，而且他们的子女有免费受教育的机会。也就是说，所有美国穷人都会得到救济。裨治文认为这种济贫方法“尽善尽美”。^④

至于聋哑人、盲人和孤儿，也会得到国家的照顾，并且有机会受教育。聋哑人可以进聋哑学校，盲人可以读盲文，孤儿可去孤儿院。

裨治文也提到了美国的丑陋现象，坦率地介绍了基督教国家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他承认美国社会中有反叛、杀人、打劫、放火、强奸、情奸、冒名伪造、盗窃、打架斗殴和酒后胡为等最基本的十种犯罪行为，相应的惩罚包括绞死、坐牢和罚款等。裨治文还以马萨诸塞州为例，把 1820 至 1834 年的犯罪原因、人数一一列出。最后又对监狱作了美好的描述：

或数人一房，或一人一房，极其洁净，亦有小窗以通风。房外西周有栏杆余地，以为散步之所。收监后，管监官务使犯人穿洁衣，食佳物，又日以善言劝戒，约束之以事业。^⑤

即便是罪犯蹲的监狱，也有着这么好的环境。

3、对文化教育方面的介绍

裨治文显然知道学校和印刷出版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所以他不厌其烦地介绍美国全国以至每个州的学校教育和印刷出版。

^① 《美理斯合省国志略》卷之十四“国政二”。

^② 《美理斯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五“国政三”。

^③ 作者在 1844 年版中改为“自恃”。

^④ 《美理斯合省国志略》卷之十八“济贫”。

^⑤ 《美理斯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七“国政五”。

裨治文在详介 20 州情况时，势必提及该州之文化设施。并且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下篇的卷之二十一“学馆”、卷之二十二“书籍”中概述美国的文化教育情况。作者写道，美国社会“无论男女，皆三四岁入学者多”；美国学校众多，每个镇有一所学校，还有“县中学馆”，而“省中学馆，每省一二所不等”，另外还有“大学馆”（即大学）。作者对大学所学内容和年限也有说明，

所学有三：一圣文，二医治，三国中律例规条。二者不可兼得。又以三年为期。^①

其中“圣文大学馆”，即神学院，“国内有三四十所，每所教圣文师约四五位，受业者七八十人”。“医治大学馆”，即医学院，“约三四十所，每所为师者约七位，其徒数十人”。“习律例之馆”，即法学院，则与医学院大同小异。^②

裨治文还介绍了有关书籍的各个方面，包括印刷方式、印刷品的内容、形式和价格等。作者提到，美国用“沿字摆板”（即铅活字板）印刷。^③印刷内容包括“经、史、诗、词、歌、赋并新闻纸”。此处“新闻纸”指报纸。作者在文中这样介绍“新闻纸”：

其纸各家不同，约千余样。初原无此也。因前有欧罗巴刊刷布告四方，由是合省日渐精巧，至今犹胜。其纸长至五尺，阔至三尺。自欧罗巴至今，约三百余载，惟自合省至今，约百五十年矣。其纸不钉装，底面皆印字，或每日一出，或七日出三四张，或半月出一张不等。每一出，多者约有二万张，少者约有五百张。每年收看新闻银一元至十二元不等。内载船只来往时日、货物价钱增减、买卖土地、租赁房屋时价，并官员士子兵丁言行，及天下一切事物。^④

可以看出，裨治文对美国报纸的介绍非常详细，连纸张的尺寸、价格都有提及。

裨治文对“新闻书”（即杂志）也有详细描述：

另外亦有每月新闻书，书内载钦天监、医生、乐工、律例、学问、劝世文等事。其书有一季一出者，约二三百篇，做书之人，将己所览前人之旨，折驳于每季书之中。亦有如中华之时宪书，一年一出者，约三四百篇，内载日月出没、日月蚀之原由，士农工商应如何做，天下各国本年人数增减。惟无吉凶趋避之日，然也不过纲健、典史、舆地志、先贤言行记略，并天文、音乐、大小学文章、劝世文等书。其书有一本为一套、数十本为一套，并有各国来者，一概价钱无定，半元数十元不等。

裨治文在此处介绍了“新闻书”的刊载内容、出版周期、出版种数、每套数日和价格等。中文撰写的第一篇新闻学专文当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新闻纸略论》一文，^⑤全文如下：

在西方各国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此样书纸乃先三百年初出于义打里亚国，因每张的价事小铜钱一文。小钱一文西方语说加西打，故以新闻纸名为加西打，即因此意也。后各国照样成此篇纸，致今到处都有之甚多也。惟初系官府自出示之，而国内所有不吉等事不肯引入，后则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闻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满如此各可随自言论诸事，但不犯律例法之事也。其新闻纸，有每日一出

^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一“学馆”。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一“学馆”。

^③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二“书籍”。“沿”字应为“铅”字之误刻，在卷之十一“工作”中刻为“铅字活摆板”。1844年香港藏版即改为“铅字活板”。

^④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二“书籍”。

^⑤ 黄时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导言，页19。

次的，有二日出一次的，有七日出二次的，亦有七日或半月或一月出一次不等的，最多者乃每日出一次的，其次则每七日出一次的。其每月一次出者，亦有非纪新闻之事，乃论博学之文。于道光七年，在英吉利国核计有此书篇，共四百八十多种，在米利坚国有八百余种，在法兰西国有四百九十种也。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也不少也。

应该说，这篇文章对“新闻纸”的介绍比较全面，包括了西方报纸的起源、发展、种类以及有关新闻自由的法律制度和英、美、法三国的种数等，但是比较简略，特别是对美国新闻纸的介绍很少，而且也没有区分“报纸”和“杂志”。19世纪近代化中文报业萌芽期的特征之一是“报纸”和“杂志”尚未严格区分，有人称之为“报纸杂志混合型”^①或泛称之为“报刊”。裨治文在此向中国人提出新闻纸和新闻书两个概念，无疑在中国近代报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裨治文还向读者介绍了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和私人藏书室。他在介绍南卡罗来纳州时就提到查尔斯顿城的图书馆，他写道：

藏书舍一座，内一书架，置公家书万余，诸色人等，皆可检阅。^②

这种介绍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上篇的20州概况中经常出现。至于私人藏书室，作者写得也不少，作者称：

为士之家，或藏一二千。书院里或藏一二万……亦有富豪家，立一书斋，置各书于内，任人观览，惟不能携回家而已。^③

裨治文不但详细描述美国的种种文化设施，还直接指出中国文化习俗的弱点，他婉转地批评了清政府禁止女子入学及新闻事业不发达状况等情况。

裨治文对美国的文化设施如此着墨，无非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着可以与中国媲美的文化，并非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蛮夷”之邦。

裨治文为了向中国人展现美国并非“蛮夷”之邦，把美国描写成了人人理想的社会。正因为裨治文刻意展示美国社会的高度文明，有意无意中淡化了美国社会的黑暗面。这种淡化主要表现在对黑人的漠视和对印第安人的片面描述。实际上，这种淡化也是裨治文思想中的民族歧视的表现。

4、对印第安人的介绍

裨治文把印第安人译为“苗人”或“土人”，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了印第安人的体貌、性格、生活习俗等。

作者提到当时的印第安人，约有三四十万，身高“昂昂数尺”，肌肤则“若红铜之色”，其眼发，则“有黑漆之光”，“其发长而粗，其身高而力，其心明且哲”，交朋友的原则是“言而有信，处仇不共戴天”。如若被人欺骗，必定“赴汤蹈火，务必雪之”。商议事情之时，年长者“严肃而恭”。如果出兵打仗，斗士们“无虚心而怯”。如果被俘虏，则宁死不屈。印第安人没有文字。生活方面，不识稻谷，也不耕织，除了打猎钓鱼没有其他事情。饮血茹毛之外，吃的只是些“果木菜瓜”而已。唱歌、跳舞或赌博为其娱乐方式。服饰方面，夏天，“白乳至膝皆围兽皮”；冬天，则“全身衣其毛”；又有“面涂五色，头插鸟翎，意示人以威也”。栖身房屋只是个“蓬寮”，“内

^① 冯爱群编著《中国新闻史》，页42—50。转引自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页5。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得罗连南省”。

^③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二“书籍”。

无一物，四壁萧条”。物品交易时用“树皮、珠石”，没有金银铜钱。没有官员，“惟立总理头日以议事”。^①

这可能是汉文书籍中第一次如此详尽地记载印第安人，这些介绍无疑对当时的中国读者了解印第安人不无作用。但裨治文在讲述印第安人与英国移民之间的关系时，则有所偏颇。

裨治文认为印第安人与英国移民当初相遇时和平相处。印第安人见“英吉利二三百人至，相与交好”，“欣然而击节”，^②甚至有印第安民族的部落首领与英吉利人交情深厚。作者还说，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印第安人渐渐开化。他写道：

迨至道光元年，有合省国人至，于是立国法，定章程，导以士农工商之事，然后风俗渐开焉。至道光十六七年，有数排土人与合省国相斗，合省劝土人相和，尤劝之讲习礼义而不可堕入恶俗焉。^③

确实，一般来说，当白人刚刚来到北美大陆时，土著印第安人对远道而来的白人移民是友好的。印第安人帮助白人移民学会了玉米、烟草等作物的种植，在关键时刻使之度过了在新大陆的生存难关。

但是随着欧洲移民的增多，定居地区不断向西推进，土地的占有成为印白关系的核心问题。白人对印第安人所采取的政策是：无情地屠杀、剿灭及强占他们的土地。侥幸生存下来的印第安人，也被驱逐到西部山区不毛之地。到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之时，原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人实际上已大部分被消灭。^④真可谓一种“实际的生物取代”，即“一个民族对另一民族有形的取代”。^⑤与印第安人的“谈判”、对他们的“说服”都不过是形式而已，而是进行惨无人道的掠夺屠杀。^⑥所以根本不似裨治文所写的如此温情脉脉的“劝”和“导”，“合省之和平”其实是“血与泪”的进程。与裨治文同时代的英国传教士慕维廉在《地理全志》下编卷十中就曾指斥欧洲殖民主义者在美洲等地的暴行：

东洲之民，已得新洲之土……新邑几不啻地狱也。

裨治文对《独立宣言》最后一条作如下翻译：

谕唆各省纷争，并唆苗人害及居民，使各不相安也。^⑦

其实作者并没有把原文完整翻译过来。作如下翻译可能更合适：

他一向煽动我们内部的叛乱，并且一向竭力勾结我们边疆上的居民、那些残忍的印第安蛮族来侵犯。印第安人所著称的作战方式，就是不论男女、老幼和情况，一概毁灭无遗。^⑧

在这里，美国人藐视、敌视印第安人的态度暴露无疑。作者对此完全可能是刻意修饰隐讳的，这样，一方面可以显示美国政府的亲善形象，另一方面，希望中国也能友好对待西方人。

裨治文的民族歧视倾向还表现在他对奴隶制度的漠视上。

^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六“原居苗人”。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三“创国原由”。

^③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六“原居苗人”。

^④ 何顺果《美国史通论》，页24。

^⑤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页518。

^⑥ 何顺果《美国边疆史》，页69。

^⑦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四“百姓白脱英国之制”。

^⑧ 《独立宣言》，译文载周一良等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页96。

第二次英美战争（1812—1814）结束后，废奴运动在北部兴起，势不可挡。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废奴运动进一步发展，越来越激进。出现不少要求主张废除黑奴制的报纸刊物。裨治文当时在美国北部的新英格兰，对这些情况不可能不知晓。但是裨治文对美国黑人的悲惨处境讳莫如深，至于奴隶，只有两处提到。一处是在计算人口数时提到：

乾隆十五年，计合省国之民，不过三百九十二万一千三百二十五人，内为奴者六十九万五千六百五十五人。^①

另一处也只有一句，而且是小注。他写道：

道光十年，计有一千二百八十六万六千九百二十丁。内为奴者约二百万。^②

“奴隶贸易”是北美殖民地发展所从事的一项重要贸易，奴隶所受的待遇也是非常残酷的。刊载于1785年7月12日《查理士顿》报的一份文件，记述了一名逃跑的黑奴被逮住后的情形。文中写道：

……立即绑赴刑场，先砍掉他一只手，他愤怒而倔强地忍受了这种酷刑。但当他那只砍下来的、血淋淋的残肢被抛进油锅时，他就好像在地狱受罪一样。此后才把他扔进油锅，最后，再把他吊起来……^③

从中可见黑奴受虐待的惨状。黑奴所受的酷刑，相对中国的刑罚犹过之而无不及。但是裨治文在他的著作中对此只字不提。裨治文之所以避而不谈，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美化其祖国。

旧中国以“天朝”自居，白视为世界上唯一的文明社会，而视中国以外的人都是蛮夷，称之为“四夷”。但是这一偏见并非中国人所独有，地球上所有进入文明社会的人都曾抱有同一偏见，西洋人也不例外。^④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就是有力的例证。

第二节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语言翻译上的特色

1、裨治文的翻译技巧

把一个文化移植到另外一个文化，需要进行语言的翻译。在这个翻译过程中可以看到译者本身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和技巧。

裨治文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在翻译技巧方面，运用了音译、意译、音意合译等多种方式。书中提及的国家、州、城市、山脉、河流等的名称多为音译，如 Massachusetts 译成“马沙诸些”，Boston 译成“波士顿”，Appalachian Mountains 译成“亚罢拉既俺”（今译“阿巴拉契亚山脉”），Washington 译成“华盛顿”。也有意译的，如 West Point，译为“西角”（今译西点）。音意合译的也不少，比如把 New York 译成“新约基”，North Carolina，译为“驾罗连北”（今译北卡罗来纳）。

裨治文等人运用的另一个翻译技巧是“中国化”的写作手法。

^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五“开国以后史略”。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七“户口册”。

^③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页101—102。

^④ 与白视为唯一文明人类这一偏见相关联的另一偏见是，视其所在地区为世界的中央。西洋人白视为唯一文明人类，也以为世界有一个中央。西洋人所认为的世界中央是耶路撒冷。

翻译的过程需要用本土原有的语言去对应、理解、转述被译的对象，包括事务、制度、思想。对新知识的理解，同样需要传统的知识和语言去表达。“中国是一个旧有传统根深蒂固的文化大国，在接受外来概念的时候都力求与中国原有的概念相适应或相联系，除非这个概念在中国完全没有一点影子，否则国人不容易接受全新与生造的新词”。^①美国民主政体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制度，如何翻译，包括用什么词汇，以什么样的口吻表达，这对裨治文等本就不深谙中国语言的传教士来说，在完全没有对应之词的情况下，要找出对应词语，既能被理解，又不被误解，可谓费了不少心机。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理解，裨治文在中国人的帮助下，对能够用中国语言或物体套用或比附的，则尽量套用和比附，从而表现出极其明显的“中国化”。对实在无法比附的知识概念，裨治文等人则创造出一些新词汇。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中国化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化的语言。譬如，在涉及年代的地方，也一律采用中国年号，记事起于“明天启六年”，迄于“道光十七年”；书中称州为“省”。

作者用与中国职官相应的名称称呼外国职官，如州长为“督抚”，称某人官职为“水师提督”。只是上下文称呼不一致。对“首领”一词含义有二。现在意义上的总统和美国州长，都曾被译作“首领”。

二是类比中国物体。裨治文以清朝为参照物，描绘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周边国家或海域。作者尽量从两国的疆域、风俗等方面的相似性或平等性来寻求中国读者对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而非“蛮夷”）的认同，如下引文：

夫合省则属新方，大清则属旧方矣，不知合省与大清，其地方实相背也。论其沿海形势、陆地长阔，则彼此皆同，惟究其人物动静行藏，则天渊迥别。若圜地而论，周围共三百六十度，故通国属七十余度，大清国亦属七十余度，若以南北圜地而计，周围亦三百六十度，内三十余度属合省国，三十余度属大清国，故大清国与合省，实似是而非焉。^②

作者在描述各州情况时经常与中国省份（其中提到浙江省最多）作比较。例如作者在介绍缅因州面积时就写道：

兹省内地之延袤，极与浙江省相似……^③

在介绍马萨诸塞州之气候时提到：

……每年不过三、四月下雪，故至四月春晴雪散，万物赖此而繁滋。土地地气，有如江苏省焉……

三是中国化的价值观。裨著对中国文化、价值观采取认可或者说是迁就的态度，以获取中国读者的信任与接受。这在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中有强烈的表现。

裨治文在序中首先介绍自己自幼好学，“四季日工而晚课，并无虚度片刻韶华”，后有“登大学之堂”、“进大院”。这简直就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农家子弟求学过程。

因为“父母在不远游”乃是宗法社会的基本道德信条，像裨治文这样远涉重洋，哪怕不出三五

^① 周振鹤《遐迹贯珍》中的一些过渡性的地理学术语，载《词库建设通讯》，第19期。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分野度数”。

^③ 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载就回，也是要受到的谴责的，所以裨治文在序言中写道：

予时二十有八，适无内顾之忧，老父弟兄，一堂乐聚。于是欲游学于外国，以免坐井而观天，兼使异乡之言行，予得见之，予之见闻，播传异土。

在这里，裨治文根本没有提自己因为传播福音而来华，只道是家庭安乐，无须照顾，所以想“游学于外国，以免坐井观天”，仿佛是极其仰慕天朝圣化，以至万里游学。裨治文以及他的中国助手显然意识到这种儒者形象较之传教士更能为中国读者所接受。

2、翻译的偏差

由于异域文化并不能通过文字完全移至本土，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一些问题，

裨治文采纳“中国化”的写作手法使中国读者能更容易地理解美国社会，但同时也容易使中国读者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因为中国读者会依据自己对中文的固有理解来认识美国，结果就产生了不少误解。这里仅以 the United States 和 president 的翻译为例说明一二。

应该说，与其它译文相比，裨治文把“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译成“美理哥合省国”，更加妥帖。

我们现在把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译成“美利坚合众国”。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则把 United States 翻译为“合省国”，在 1844 年出版的《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中，又译为“合众国”，^①此后一直沿用至今。但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出版之前，关于 United States 的称谓还有许多种，单单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就出现了兼郡、合郡、兼列国、兼合国、列省合国、列国、兼合邦、兼合列邦、统邦、总郡兼合邦等多种称呼。可见，美国的联邦制度很难为中国这样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朝野认识所理解。所以裨治文等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对 United States 一语的翻译便大伤脑筋，起先只能用中国固有的地方行政制度中的“郡”、“邦”这样的原有概念，再加上“合”、“总”、“统”、“兼”、“兼合”这样的字组成新词。显然那是由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编辑感到其译语词不达意，所以不断变化译法，最终仍未有一语用到今天，可见译语之难。但裨治文本人也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后期的编辑，所以我们大可想象，他所创制的“合省国”和“合众国”正是在上述众多词不达意的译语之后，才发展出来的。^②

裨治文解释他之所以选定“合省国”，是因为，

前各治其地，国不相联，政无专理，后则合其省而以一人为首领。

这可能是第一次对 United States 概念的比较准确的描述，对中国读者了解美国的联邦制度有一定的帮助。但是，这种译法也有负面效果。

一是间接误导，为了便于中国读者理解，裨治文使用中国人所习惯的字汇去附会美国情况，甚至还用中国的制度去硬套美国的制度。^③上文曾提及裨治文对美国总统、州长等职务的权限：美国“立一国之首曰统领，其权如国王；立各部之首曰首领，其权如中国督抚”。其实统领的权力与国王并不一样，各部之首领的权力，与中国督抚也不完全相同。这些，裨治文当然心里明白，但是，为了解释清楚，便不能不将其与中国的制度作一比附。

^① 1844 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已经使用“合众国”一词。

^② 周振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创制汉语新词方面的作用》，载《词库建设通讯》，第 15 期。

^③ 这可能是解放前介绍美国情况的书籍的一个共同点。

裨治文用“省”字表示“State”，结果出现“美理哥合省国”这种似是而非的译法。因为美国的 State 与中国的省在制度方面差别很大。美国的 State 有较大的自主权，几乎是独立自主的国。裨治文把美利坚合众国译为“合省国”，也不完全贴切，而在中国现代行政系统中，无自治省而有自治州，“州”较“省”的自治色彩似乎浓些。^①把 State 译为“省”，虽然使中国读者理解容易，同时也造成读者的错误认识，以为美国的“省”雷同于中国之“省”，直辖于中央政府，与中国政治结构相同。其时，十三个殖民地是独立个体，如果把 State 翻译成“国”或“邦”更为合适。而后世所称的《独立宣言》（The unanimous Declaration of the thirteen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全称则应当译为《美利坚十三联合邦的一致宣言》较佳。^②

二是直接误导。《独立宣言》在详列英国政府的罪状之前，有一段话解释为何被迫起来改变原来的政治体制。裨治文在结尾处翻译为：

……故不得不议立首领，永不遵英吉利。于是合省为一国。合省之名，由此始矣。^③

紧接其下一章又写道：

英吉利王知十三省合为一国，益怒，岁岁添兵入境争战……^{④⑤}

裨治文的上述语句都让人以为《独立宣言》是合众国诞生的标志。这种影响一直到现在还不能说是完全消除。^⑥

实际上，在我国通行的一些教材和文章中，往往把《独立宣言》的发表作为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但是无论从《独立宣言》的字面上看，还是从它的历史背景和当时人的记载和思想状况来看，这显然是不确切的。^⑦美利坚合众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正式出现应当在 1781 年《联邦条例》通过之时，该条例第一款明确规定“此同盟之名称为美利坚合众国”。^⑧之所以产生上述错误理解，《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恐怕得负一定的责任。

下面再来讨论 President 的译法。

裨治文最初把美国元首 President 译为“统领”、“总领”或“首领”。他在 1838 年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写道：

国法虽定，尚未有文武员弁，遂议立华盛顿为国首领，文武各员，亦议定焉。^⑨

对于裨治文将 President 译为“首领”，有些西方人认为极不恰当，表示不能容忍。1879 年，一位寓居上海的西方人写信给当时中国最有名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说是在中文里，“首领”最恰当的含义是指炮艇上的船长，通常的含义实指强盗头子，而传教士特别是美国传教士竟然首创

^① 不知何时中国将 State 由“省”改译为“州”，这个改动稍微接近英文原义。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译之为“国”，比“省”更接近其含义。

^② 杨玉圣《〈独立宣言〉史实考》；杨生茂、陆镜生《美国史新编》，页 83。

^③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四“百姓自脱英国之制”。

^④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五“开国以后史略”。

^⑤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卷七《论北亚墨利加之列国》一文中亦提到：“……此国原分为十三省……乾隆四十一年（即 1776 年），其自立国发政，而不肯再服英国。”可见误导的不只裨治文一人。只是此书在中国本土很少有影响。

^⑥ 齐文颖《〈独立宣言〉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吗？》。

^⑦ 关于这一点，下列两篇文章已作详细论述：齐文颖《〈独立宣言〉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志吗？》；杨玉圣《〈独立宣言〉史事考》。

^⑧ 《邦联条例》第一条，载 J·艾捷尔编、赵一凡等译《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页 31。《邦联条例》的全称是《新罕布什尔、马萨诸塞海湾、罗德岛与普罗维登斯种植园、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马里兰、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佐治亚诸州之间组成邦联与永久性同盟之条例》。

^⑨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五“开国以后史略”。

用“首领”翻译 President，真是荒唐透顶。这里的美国传教士即指裨治文。^①

有人以为所谓首创这一译法，是指“上文提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称美国元首为‘统领’”。^②熊月之没有提及裨著把 President 译为“首领”。其实裨著确实把 President 译为“首领”。另外，裨治文又把现在意义上的美国州长译作“首领”，而且用词明确，见下文：“各省内一首领、一副领，议拟人员无定数，民选议事者，或十余人和数十人无定。”^③不过，裨著中，“统领”的出现频率比指总统的“总领”和“首领”高得多，意指州长的“首领”出现频率也远远高于总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出现的“首领主”，则指总统。

但是，裨治文在 1861 年出版的《大美联邦志略》则将美国元首 President 改译为“国君”，内称：

军务大权，不分邦国，凡水陆之兵将，概归国君节制……行法之权，专与国君。^④

经此一改，民主国家的元首变成中文中的确定含义——专制国的君主。裨治文这么改，可能是因为当时中国普通民众习惯用这个称呼，于是就约定俗成。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报刊文章把美国总统称为“国皇”、“皇帝”。所以，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特地在报上刊文，辨析皇、王、总统之间的区别。其文如下：

外国称皇称王者，皆系世及，即称大公，亦属传位，惟称伯理玺天德（即 president，笔者注），则知为民主之国而无世及之例也。又外国皇、王之辨，如今抚有一国而无属国者称王，除本国而兼有属国者称皇……至伯理玺天德无论有无属国，俱称民主。^⑤

由此看来，裨治文在 1861 年的《大美联邦志略》中，用“国君”翻译 President，使中国人更容易理解，但是与 President 的原义的差别依然很大。

最后须附带指出的是，裨治文在介绍“七年战争”（1756—1763 年）时，把西历转换成了错误的中国历法，给后世造成一定影响。

“七年战争”对美利坚 13 个殖民地的命运有重大转折意义。^⑥这场战争在欧洲起于 1756 年（乾隆二十一年）、迄至 1763 年（乾隆二十八年）。裨治文在书中对这场战争也有描述，他写道：

自有十三省之时，有法兰西人至新地之北而居，因名其地为新法兰西，后亦名于拿大。于是渐次在北过西而至南一带，皆有民居，并建炮台，其意防虞新地内之英吉利人也。由是费治弥亚省之总制修书，使华盛顿呈于炮台内之将军。……于康熙二十年（1681 年。笔者注，所以，康熙应该为乾隆，乾隆二十年为 1755），王遣大将军带兵船数十只、军兵数千人，至费

^① “To the Editor of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March 22, 1879. 有人以为所谓首创这一译法，当是指“上文提到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称美国元首为‘统领’”。（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页 141。）熊月之没有提及裨著把 President 译为“首领”。其实裨著确实把 president 译为“首领”。他写道：“国法虽定，尚未有文武员弁，遂议立华盛顿为国首领，文武各员，亦议定焉。”（《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五“开国以后史略”。）另外，裨治文又把现在意义上的美国州长译作“首领”，而且用词明确，见下文：“各省内一首领、一副领，议拟人员无定数，民选议事者，或十余人和数十人无定。”（《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三“国政一”。）不过，裨著中，“统领”的出现频率比指总统的“总领”和“首领”高得多，意指州长的“首领”出现频率也远远高于总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出现的“首领主”，则指总统。

^② 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页 141。

^③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三“国政一”。

^④ 《大美联邦志略》上卷，“建国立政”。

^⑤ 《万国公报》，卷 311。

^⑥ 何顺果《美国史通论》，页 36—44；张雄《英国与北美 13 个殖民地关系的演变》，载齐文颖主编《美国史探研》，页 99。

治弥亚省，酌量战阵之事。……迨至二十四年（1685年，应作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笔者注），法兰西之大将军瞞荦^①、英吉利大将军名吴里富^②，两军对垒于贵壁^③，各用炮械，至两大将军皆受伤，回营后皆死，惟英吉利取胜。^④

裨治文在书中把“乾隆”误为“康熙”，致使魏源等人误以为裨著中所说的“华盛顿”不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⑤实际上，引文中出现的“华盛顿”，正是指后任首届美国总统的乔治·华盛顿（1732—1799）。

^① 瞞荦：Marquis de Montcalm，马奎斯·德·蒙卡尔姆侯爵。

^② 吴里富：James Wolfe，詹姆斯·沃尔夫。

^③ 贵壁：Quebec，魁北克，在今加拿大，是当时法属加拿大的中心。

^④ 《英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三“创国原由”。

^⑤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九“墨利加洲沿革总说”中对此作按语：“康熙二十年，英吉利与佛兰西争议时，已称华盛顿往米其间，彼时年至少亦必二十年外，至乾隆四十年新国起兵据英吉利时，华盛顿为帅，已相距百二十余岁矣。若嘉庆五年始卒，则百四十余岁矣，盖二人同名，非一人也。”笔者认为，由于康熙误为乾隆之误，所以，华盛顿为帅，只相距四十余年。若嘉庆五年始卒，则仅七十岁左右。事实上，华盛顿生于1732年（雍正十年），死于1799年（嘉庆四年），享年67岁。

第六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传播与影响

裨治文希望通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向中国人介绍美国，扩大中国人的视野。那么，这本书是否真的像作者所期望的那样对中国人产生了影响呢？这种影响到底有多人呢？我们需要对此作一全面的考察。

第一节 对中国世界地理著作的影响

1、《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海国图志》

深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影响的中国世界地理学巨著之一是魏源的《海国图志》。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官至高邮州知州。鸦片战争时，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痛愤时事。1842年，著成《圣武记》。又受林则徐嘱托，成《海国图志》。

魏源所编撰的《海国图志》是为我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巨著，该书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变法图强的思想，对近代中国社会乃至邻国日本的近代化都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该书最早为五十卷，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增补成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年）又增补成一百卷。

魏源编撰《海国图志》时，所参考和征引的文献资料数量多、范围广，涉及古今中外各类著作。该书所依史料，“一据前两江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依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①

其中《四洲志》系林则徐组织人员据1836年慕瑞（Murray）在伦敦所著之《世界地理大全》译出。^②“历代史志”则包括《汉书》、《后汉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魏书》等等；明以来岛志有叶钟进的《英吉利夷情记略》，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天下沿海形势图》，王大海的《海岛逸志》，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等等。^③其“近日夷图、夷语”即为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裨理哲（Richard Quarterman Way）所著《地球图说》、麦嘉缔（Divie Bethune McCartee）之《平安通书》、郭实猎等人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葡萄牙人马吉斯之《地理备考》、马礼逊的《外国史略》等等。

《海国图志》美国部分的介绍多采纳裨治文之《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魏源在其巨著《海国图志》中，曾明确提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且甚为推崇，认为，

布路国人玛吉士之《地里备考》与美里哥国人高理文之《合省国志》……皆以彼国文人，

^①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页1。

^② 1841年，曾有刻本，已佚。《小方壶斋舆地丛抄》再补编曾辑录。台湾出版的《近代中国对西方的认识资料汇编》（第1辑第1分册）辑有。该书把美国译为“育奈士迭国”，比较具体地介绍了美国的方方面面。包括地理位置，建国历史，政治制度和中央、地方的政府机构，行政、司法、财政、军事、邮政、交通、运输、工农业和进出口贸易情形；还介绍了美国的疆域、山川、物产、人口增长、种族来源、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文化艺术以及宗教信仰等情况；对哥伦比亚特区和当时全国二十六州和印第安人四部的基本情况也有介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誉之为“新地志之嚆矢”，“具有开创风气的划时代的意义”。其美国部分，“同仍然不确不详的《海录·咄哩干国》的内容比较而言，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必将确切了解和介绍美国的开端。”（陈胜彝《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页50-51）

^③ 吴泽、黄丽镛《〈海国图志〉研究》，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留心丘索，纲举目张。^①

其中《合省国志》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简称。魏源在另一处称此书为《美理哥国志略》，也是用的简称。

虽然在《海国图志》所征引的近百种参考书中，外人著述仅有二十种左右，但魏源在介绍各国史地情况时，用得最多的正是这些书。实际上，魏源在介绍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情况时，大多采用的是近代来华西人主要是传教士的著作。

魏源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重视可以从他对《海国图志》的编排上看出。魏源在介绍多数国家时，把《四洲志》上的材料放在第一条，并注明是“原本”。比如他在介绍越南时，他先将《四洲志》叙述越南的一段文字全部采用，放在最前面，然后将《英吉利夷情记略》、《澳门纪略》等书中的有关材料作为“重辑”，列于《四洲志》文字之后。介绍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惟有在介绍弥利坚（美国）时，则将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辑在最前面，称《弥利坚即美理哥国总记上》，而将《四洲志》原本，作为《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下》列于后。魏源为此特地写上按语：

志例当先原本，次重辑。为《美理哥志》出其本国，实校原志尤提纲挈领。^②

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大部分内容被采纳于《海国图志》，且特别冠于篇前。之所以如此，魏源在叙中讲得非常清楚，

（此书）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③

百卷本《海国图志》中关于美国的记载，主要辑自《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其中卷五十九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处摘引裨治文序言以及下篇共 21 章内容；卷六十二、六十三摘引上篇 21 处以及下卷 1 章；卷九十四引录卷之二十二、卷之二十，共引录 24 处。具体引用情况可见下表（表 4）。

表 4 《海国图志》百卷本引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情况

《海国图志》百卷本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卷	篇目	页	引自何卷·章
卷五十九 “墨利加洲 沿革总说”		4 上—5 下	卷之一
卷五十九 “弥利坚总 记上”		15 下—47 上	卷之二（后半部分）、卷之三、卷之四、卷之五、卷之七、卷之八、卷之九（关于飞禽走兽、动植物具体名目没有抄录）、卷之十一、卷之十二、卷之十三、卷之十四、卷之十五、卷之十六、卷之十七、卷之十

^①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

^② 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卷三十八，页 1。

^③ 魏源《海国图志原叙》。

			八(部分)、卷之二十一、卷之二十三、卷之二十四、卷之二十五、卷之二十六以及序。(共21个章节并序)
卷六十二 “弥利坚东路二十部”	缅甸部	3上—5下	缅甸省
	纽舍社部	6上—8上	新韩赛省
	注门部	9上—10上	华满部
	马沙朱硕斯部	11上—13上	马沙诸些省
	伦爱伦部	13下—14下	罗底岛
	袞特底格部	15上—16下	干尼底吉
	纽育部	18上—20上	新约基
	纽惹西部	21上—21下	新遮些
	宾西注尼阿部	22下—24下	边西耳文
	地那注部	25上—25下	底拉华
	马里兰部	26下—27上	马理兰
	注治尼阿部	28上—28下	费治弥亚省
	南戈罗里部	29下—30下	南驾罗连省
	北戈罗里阿部	31下—32下	北驾罗连省
	若治阿部	33下—34下	磋治亚省
根特机部	37上—38下	建大基	
卷六十三 “弥利坚西路十一部”	阿那麻马部	1下—2上	亚喇罢麻省
	弥斯栖比部	3上—4上	美士细细比省
	雷栖阿那部	4下—5下	累斯安省
	地尼西部	7上—7下	典尼西
	弥利坚国边地 土番四部	9上—10下	第六章“原居苗人”
卷九十四 “西洋器艺杂述”		11下—12下	第二十二章“书籍”、第二十章“土音本源”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以往有关外国地理的记载，大多“详于岛岸土产之繁，埠市货船之数，天时寒暑之节，而各国沿岸之始末，建置之永促，惜乎未之闻焉”。^①而裨著对美国历史地理所作介绍则是全方位的，无怪乎，魏源会大量采纳裨著。

另外，在考证有关美国问题时，魏源立足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纠正谢清高《海录》所述不确切之处：

^①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页7。

《海录》：咿里干国在英吉利西，由散爹里西少北行，约二月，由英吉利，约旬日可到，亦海中孤岛也。疆域稍狭，原为英吉利所分封，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即来广东之花旗也。

（魏源）案：咿里干，即弥利坚之音转，故言即广东之花旗。然以洲言，则其地数万里，岂得谓之孤岛？以国言，则二十七部落富强为英夷劲敌，岂得谓之疆域稍狭？盖谢清高但至欧罗巴洲，未至弥利坚洲，故传闻不确不详。^①

魏源在《外人西洋墨利加洲总叙》中不但表现出有所认识美国民主政治，而且热情称赞美国独立战争与民主政体，他写道：

呜呼，弥利坚国非有雄材梟杰之王也，涣散二十七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餽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创开北墨利加者佛兰西，而英夷横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兰西助之，故弥与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总摄之，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询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中国以茶叶、大黄岁数百万，济外夷之命，英夷乃以鸦片岁数千万，竭中国之脂，惟弥利坚国邻南洲金矿充溢，故以货易货外，尚岁运金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弊，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②

这“武、智、公、周、富、谊”一连六个字表达了魏源对美国政治、经济，乃至外交的推崇之情。他在《海国图志》百卷本的《后叙》中更是宣称：

……至墨利加北洲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③

魏源认为，正是有了这种“可垂奕世而无弊”的联邦制度，才造就美国的进步与优良。

早在鸦片战争前，一些涉及域外情况的地理学著作就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有零星的介绍。1834年叶钟进在其《英吉利夷情记略》中指出，美国“有大、二、三、四等头人以理事。一酋死，复公举之，必众服而后立。故其人最重行宜，无梗化，无崔科，有军事方治赋”。不过，这类记载在当时极为少见，而且非常简略。

《四洲志》及《海国图志》征引的其它西方著作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介绍远不如《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详细，魏源发出这些感慨当是阅读裨治文的著作后而来。

2、《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海国四说》

受裨著影响的还有梁廷枏的《合省国说》与《兰仑偶说》。

梁廷枏（1796—1861），字章甫，号藤花亭主人。广东顺德人。副贡生，咸丰时赐内阁中书，加侍读衔。为道光、咸丰年间广东的名儒和学者。学问广博，注意研究西方国家政治、历史状况。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六十，页1669—1670。

^② 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九，页1611。

^③ 魏源《海国图志后叙》，页7。

曾赞助林则徐、邓廷桢禁烟运动，并支持广州人民反对英军入城的斗争。著述颇丰，有《海国四说》、《夷氛闻记》、《粤海关志》、《藤花亭诗文集》等。

《海国四说》杀青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①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兰仑偶说》、《粤道贡国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取材于作者当时所涉猎到的基督教宣传的各种书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批驳基督教教义，并论述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粤道贡国说》记述清代广州中外通商的情况。《兰仑偶说》是关于英国史地的著作。兰仑即指英国首都伦敦，此处泛指英国。《合省国说》就是指美国简史。

梁廷枏撰写《合省国说》是受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启发。梁廷枏在编撰《粤海关志》时感到有关美国的资料相对缺乏，后发现，“米利坚人有以汉文白志其本国事者曰《合省国志略》”。^②因此引发了他写作《合省国说》的愿望。他在《合省国说》序言中谓及：

予奉纂《粤海关志》，分载贡市诸国……独米利坚立国未久，前贤实缺纪载，彙牒所存，又多系市易禁令，间有得与通事行商所口述者，亦苦纷杂，难为条绪，欲专著一篇不可得，则仍置之……有以其国人新编《合省志略》册子见示者……因合以前日书局所采记，稍加考订，荟萃成帙……^③

之所以取此书名，是“仍其今称”。^④

梁廷枏自称《海国四说》是“以中国人述外国事”，似乎与其他诸书相反。实际并非如此。《海国四说》的主要内容都取自外国人的报章杂志和著作，只是在摘录之后，在字句上时有调整，然后重新组合编排，尤其是《合省国说》，只是对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体例略加改造、内容稍加考订而成，不仅保存了原书的主要内容，甚至保留了其名称。

《合省国说》共三卷。卷一，先介绍西方地理观念，然后依次叙述美洲大陆的发现，环球绕行的成功，南北美洲地理概况，英、法两国在美洲的争夺，以及英国在北美洲殖民统治地位的确立；卷二，论述美国独立战争经过，立国以后各项制度以及美国不断扩展的情况，对美国议会制度的产生、总统制和任期制的原则，均有具体、详细的叙述；卷三，介绍美国的宗教、文字、出版、新闻、图书馆、风俗习惯，以及农业、工业和物产等。

梁廷枏撰写《合省国说》时，参考了多种中文资料，除了他自己参与编修的《粤海关志》外，还有叶钟进的《寄味山房杂记》、谢清高的《海录》、徐朝俊的《高厚蒙求》、南怀仁的《坤輿外纪》、郭实猎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等。但从全书内容安排看，《合省国说》基本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下卷所述内容及先后顺序相同，只是梁书并无章目，甚为笼统。

《合省国说》所引内容，均未超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一至卷之二十七的内容，对美国各州的具体情况，则都无涉及。其中具体引用情况见下表（表5）。

表5 《合省国说》引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情况

《合省国说》	所引《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出处
--------	----------------

^① 骆驊《〈海国四说〉前言》。

^② 梁廷枏《〈合省国说〉卷一》，页53。

^③ 梁廷枏《〈合省国说〉序》，页51—52。

^④ 梁廷枏《〈合省国说〉序》，页52。

卷一	《合省国说》卷一的内容主要来自《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卷之一、卷之二、卷之三；
卷二	主要采白《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卷之二、卷之四、卷之八、卷之十三、卷之十四、卷之十七；
卷三	则主要录白《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卷之七、卷之八、卷之九、卷之十二、卷之十八、卷之二十、卷之二十二、卷之二十三、卷之二十四、卷之二十五、卷之二十六等

从表格中可以看出《合省国说》最主要的参考资料还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这在《合省国说》的行文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比如，梁书卷二所载“时新议国例十七条”，^①

- 岁征粮饷，所有动支各项皆于饷内拨发。
- 国帑不敷，议拟及民选各臣相议，预为筹办，勉致拮据之虞。
- 宜与各国贸易，并与各省相交，即本土苗人皆同一体。
- 流民准其寄居入籍，以免流离失所。
- 设局铸银，务权衡轻重多寡，以归画一。
- 严禁伪造番银。
- 设驿传递公文书信，时常修筑基桥，以便往来。
- 出使谕人学六艺，如六艺中有能超众者，则示以奖赏，并能于各器用众，自创新样，发前人所未及，为今人所乐效者，亦奖赏之。
- 在省立察院，以判民间之事，或三省立一，二省立一，看省分之大小酌议。
- 宜海贼剿劫，如有捕获，无论本国外邦，必照例治罪，或有谋反叛逆，及在外国滋生事端，尤必照例严办。
- 如遭外国欺凌，统领必先晓谕万民，倘未便请和，致有干戈之变，务必踊跃向前，若两相盟会，即可载兵而奏凯。
- 当以钱粮招民为陆路之兵。
- 当以钱粮招民为水路之兵。
- 水陆兵士，务守范围，不得放肆。
- 大兵临境，万民务必踊跃效劳。
- 万民肯为国出力，即议给口粮。
- 宜专设法以治京城。

以上 17 条，就是 1787 年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项关于国会权力的 18 条规定中的前 17 条。

^②梁廷枏悉数照抄裨著下篇卷之十四“国政二 制例之设定”。

再如，《合省国说》在述及华盛顿及其继任者之状况时，虽时已 1844 年，但所涉及总统只推至道光十有七年正月二十有八日，^③这完全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内容吻合。

^① 梁廷枏《合省国说》卷二，页 77-78。

^② 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也有介绍第 18 条关于总统权力的规定，但是与前面十七条的格式不同。

^③ 梁廷枏《合省国说》卷二，页 81。道光十有七年正月二十有八日为 1837 年 3 月 4 日，是美国第八任总统马丁·范布伦宣誓就职日。也是《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出版时的最新新闻。

梁书还立足禅氏著作来求证真伪。譬如，作者述及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经过、亚美利哥再次航行到美洲证实哥伦布所到之地为新大陆并被命名为美洲的原由，以及麦哲伦环球航行时，不但内容直接来自《合省国志略》的“觅地原由”一章。而且凡有争议，也一般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准，认为《高厚蒙求》等书中所提及的相关内容“不及《志略》以本国人述本国事尤为亲切”。

①

梁廷相在引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时，并不盲从，而是有所鉴别，遇到后者行文有误时，不忘及时更正。如在卷二有关美国官制部分，《合省国说》云：各省“巡抚按察院一岁集审二次，巡抚则岁审四次。”然后，梁氏加注曰：“按，《志略》称：‘巡按七人，每年会审四次’。又云：‘二次审判’。语自相矛盾，今更正。”在发现后者在某些地方记载不够完备时，也明确指出。如卷二载，美国在独立战争结束时，“谢遣法兰西兵”。然后加注释云：“《志略》特不载其事耳。”

梁廷相在个别地方也有误读禅著的情况。《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述及马理兰州建立时，谓：

崇禎五年（1632），有英吉利人稟王，欲居新国之极南。王果准奏，遂名其地曰马理兰。^②

不知何故，梁廷相误读为“万历年间”（1573—1619），^③所以他在注释马理兰州确立之年份时，多了一番思量。

通过阅读禅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梁廷相对美国甚或美洲的认识大大加深。他说：

六合之内……莫不奉一君主，柄其赏罚禁令而齐之……予盖观于弥利坚之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④

就是说，梁廷相原先以为，君主专制是天经地义的，知道美国不行此制后，不但动摇了原来的看法，甚至很赞赏美国的政治制度，他在序文中写道：

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据其地，而群听命焉。盖取所谓视听自民之茫然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中，殚精竭神，求足以生去后之思，而无使覆当前之餽斯已耳。又安有奢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⑤

梁廷相认识到美国是法治而非人治、是民治而非君治、统领是任期制而非终身制。正因为如此，统领才能尽心尽责，社会才能稳定。这种认识在当时不可不谓深刻。可见，梁氏通过阅读禅著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运作、防止权力泛滥的作用以及法制的特殊功用都有所洞察。梁氏还从地理环境、政治、民情等方面探讨美国民主共和制确立的原因，这在近代中国是第一次。^⑥

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合省国说》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提及禅治

① 梁廷相《合省国说》卷一，页60。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三“创国原由”。

③ 梁廷相《兰仑偶说》，页127。

④ 梁廷相《〈合省国说〉序》，页50。

⑤ 梁廷相《〈合省国说〉序》，页50。

⑥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页71—72。

文的这本著作对梁廷柟《兰仑偶说》的影响。《兰仑偶说》卷二中，明确提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又几次出现《亚墨理格志略》、《亚墨理格合省志略》等书名^①。而在《合省国说》卷一中，作者有谓：

米利坚国人以有以汉文自志其本国事者曰《合省国志略》，或自称合众国。

又梁廷柟撰成《合省国说》是在1844年，可能作者在《海国四说》杀青（1846年）之前，不但有《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还看到了1844年版《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不过，笔者发现从梁廷柟的上下行文看，他似乎又不确知《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系《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半部而已。

……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所云禁额加及加特力教异。按：英俗弃加力尊波罗教已久，其说与亚墨利格合省志略合，从之。

……按：美理哥志略万历年间奏准女王往辟地名马理兰。而亚墨理格志略则事在崇禎三年。

。

如此一部征引《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书，裨治文在《重刻联邦志略叙》中为何并未提及？或许与梁廷柟的《海图四说》不及《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著名有关。

3、《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与《瀛寰志略》

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影响的另一部世界史地著作是徐继畲的《瀛寰志略》。

徐继畲（1795—1873），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人，出身于以诗礼传家的书香门第，道光六年（1826）进士。道光十八年（1838）后，在闽、粤沿海任职十余年，官至福建巡抚。咸丰初因故去职，同治初年复出，五年（1866）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十二年（1873）去世。

《瀛寰志略》是徐继畲1843年任福建布政使时着手编写的。他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访问西人，耳闻笔录，披阅旧籍，推敲考订，第二年便写成《瀛寰志略》的稿本《瀛寰考略》。其后，徐继畲以《瀛寰考略》为草本，窜改增补，易稿数十次，历时五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最终有《瀛寰志略》成书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共十卷。

该书是继《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后又一部较有影响的舆地学著作。如果说《四洲志》乃完全从西人杂志和书籍中翻译而来，《海国图志》则主要是一部西方史地资料汇编（魏源加少量按语），而《瀛寰志略》是中国人自己编撰的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知识的研究著作。^②书中所用材料，不管是得自书本，还是来自访问，徐继畲都经过认真研究，咀嚼消化，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出来。该书叙述全面系统，重点突出，时代感强，全书以近一半的篇幅叙述欧美情况。作为世界史地著作，其成就超过前两种著作。

关于该书的写作起因和材料来源，作者在其自序中言道：

道光癸卯因公驻厦门，晤弥利坚人雅裨理……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识其字，因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

^① 梁廷柟《兰仑偶说》卷二，页126—127。

^② 梁廷柟《兰仑偶说》卷二，页126—127。

^③ 参阅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页321。

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才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①

从中可见，徐继畲撰书的资料来源有二：一是会晤美国人雅裨理和其他“泰西人”所得；二是西人出版的地图和“泰西人的汉字杂书”。关于欧美各国情况完全取之于这两条途径，徐继畲在《凡例》中再次明确表示：

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事实则多有可据，诸说间有不同，择其近是者从之，亦有晤泰西人时得之口述者，凑合而敷衍成文，期于成片断而已。^②

西方资料来源如此五花八门，因而在书中就“不复注其出于某书也”。^③

徐继畲所得泰西人的汉文杂书，以及所得新闻，应为早期来华传教士出版之书籍及报刊。雅裨理在1844年1月27日的日记中也写道：

不久前，厦门来了一位帝国的布政使，派遣他来的目的主要是为外国人的活动限制一个范围……一天下午，我们带了尽可能收集到的一般性资料送给他，我们答应送给他一些有关基督教的书籍。昨天已为他捆了一包，其中就有《新约全书》和其他一些书。^④

徐继畲认为新教徒出版物讲述的事实“确凿可据”，而较早的耶稣会士印刷品多“夸诞诡譎之说”。^⑤这众多资料中就包括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裨治文在《重刻〈联邦志略〉叙》中曾提及：

是书初稿……乃海内诸君谬加许可，如《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及《大地全图》等书，均蒙采入。^⑥

许多学者强调雅裨理对徐著的重大影响。殊不知徐继畲并不认识西文，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的交往确切的只有三次之多。所以他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作转述的。只是他跟雅裨理有直接接触，所以他能把在书籍中所看到的内容加以验证。陈庆偕在该书跋中讲徐继畲如何“反复询译，参以史录所记，订其舛误”，确定最恰当、最合适的字眼来表达异域的文化、制度。因此，徐继畲的描述不是第一手的翻译，而是在其他汉语著作基础上一种精心的重新描述。^⑦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名未曾在《瀛寰志略》出现，但从《瀛寰志略》卷九“亚墨利加”的“北亚墨利加米利坚合众国”一节的行文内容及结构安排来看，不难看出裨著的痕迹。

在其中，徐继畲共提到了他所知道的一都、二十六国及三部。在列出这些名称时，也还列出了同时代的对一地的多种不同译名。其中，出现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的二十六省的名称，均能在其中找到，说明徐继畲当时是看到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一书的。

虽然《瀛寰志略》没有像《海国图志》那样大段照录原文，并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书名列出。但我们在其行文中，依然可以找到部分字句转录裨治文一书的痕迹。已经有学者以缅甸州为例作过一些论述，现在笔者以纽约州为例再做分析。

^① 徐继畲《瀛寰志略》，页6。

^② 徐继畲《瀛寰志略》，页8。

^③ 徐继畲《瀛寰志略》，页8。

^④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3, p.236.

^⑤ 徐继畲《瀛寰志略》，页8。

^⑥ 《重刻〈联邦志略〉叙》，载《大美联邦志略》。

^⑦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页37。

《瀛寰志略》在说到纽约州的地形时说“地形三角，幅员如中国之福建省”，这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所述“其大有如福建省也，通省图形如三角”，如出一辙。

在述及纽约州的历史时，徐继畲写道：

前明中叶，荷兰人寻新地初辟此土，名曰新荷兰。嘉靖年间，意大利殖民者至，为荷兰佣。万历年间，英吉利人亦至其地，经营开垦，日益富盛。顺治年间，英吉利王命其昆弟名约者主之，以兵力逐荷兰，尽有其地，名曰纽约尔。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则云：

明嘉靖二十四年，意大利人始至新约基觅土寄居。后万历三十八年，有英吉利人活得逊者，亦至寄居，为荷兰复议，此际地属荷兰，故称之为曰新荷兰。其后顺治年间，英吉利人逐而之他，由是英吉利主得其地而分封于昆弟名约者。后英吉利与荷兰久战争其地，终为英吉利所得，故兹名之曰新约基。

可以看出，《瀛寰志略》中的这段文字，只是对裨著略作改动而已。又如，在论述马萨诸塞州的文化设施时，《瀛寰志略》称：

有大书院六所，藏书楼数处，一楼藏书二万五千册，官吏、士子皆许就读，惟不准携归。

而《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写道：

书房数所，内一藏书之室，置书二万五千册。各房共计所藏公书约七八万本。其书官员士子皆可进观，惟不能私携回家而已。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所述内容基本一致。相关例子在《瀛寰志略》中还有许多。

另外，《瀛寰志略》的叙述方式，也有仿照《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影子。《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记载每个州的各自情况时，采用的顺序是先简要说明这个州成立的历史，然后是该州的地理位置、幅员、自然环境、物产、鸟兽、商贸、人口、行政区划、省城、官员设置、行政机构、学校、慈善机构等方面的情况介绍。而《瀛寰志略》所采用的叙述次序则是地理位置、幅员、自然环境、历史、物产、商贸、会城（即都城）、学校、官员设置、人口等方面。虽然二书所记述的方面不尽相同，但《瀛寰志略》所论及的内容都未超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所记的范围，且在细节上亦没有后者详尽。可见《瀛寰志略》应是以后者为蓝本来确定论述的内容的。

在徐的著作中，对美国给予异乎寻常的注意，分配给美国的篇幅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共10128字，与它最接近的英国只有7488字）。这表明，作者对裨治文的历史著作——更全面的资料，十分信赖。^①

《瀛寰志略》对世界各国政治平实记述，但对中国最新奇的西方议会制度和美国的民主制度，则详述其政治运作状况。

徐继畲论美国政治制度：

（华盛顿）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主，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每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副统领有一员者，有数员者。以四年为任满，亦有一年、二年一易者，集部众议

^①（美）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页118。

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别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匭中，毕则启匭，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齐民齿，无所异也。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华盛顿至今。顿以嘉庆三年病卒，开国六十余年，总统领凡九人。^①

徐继畲发现裨治文著作中关于美国革命最为兴奋。在中国无力抵挡英国的船炮后，徐继畲认为华盛顿如同中国古代圣贤，高于中国的曹操、刘备和陈胜、吴广，是西方古今人物之首，而且气概绝伦，是一位伟大的英雄。作者盛赞华盛顿：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驳驳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②

徐继畲论华盛顿的这段文字是中国人首次评价美国总统和美国政治。现在看来，仍然是比较中肯的，它比较公正地概括了华盛顿一生的功勋和品德，同时也反映了在封建专制末期，中国人对民主政治的向往之情。

在《瀛寰志略》一书中，徐继畲清晰而准确地告诉国人，在大清之外，地球上另有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崭新世界，一个富强民主的近代世界。徐继畲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赞赏、对华盛顿个人品格的钦佩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是绝无仅有的，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美国社会的最高评价。因此该书“甫经付梓，既腾谤议”，但在大洋彼岸引起不小的反响。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③的推动下，美国政府于同治六年（1867年），特将一幅华盛顿的画像赠给徐继畲，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4、对其他人的影响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前人对裨治文著作对《海国图志》、《合省国说》、《瀛寰志略》等书的影响关注较多，也发现了王韬对该书的高度评价。但是《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影响的研究，尚有深入分析的余地。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地理学逐渐向近代地理学转变，但是文献考据仍然是中国学者研究地理的主要方法之一。笔者发现不少学者就是以《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底本校释其他史地著作，特别是有关美国地理知识。

林谦的《国地异名录》在考证土耳其、西班牙、美国、墨西哥等国时多次引证裨著的说法。^④特别是在讨论“土耳其”国名时，作者通过分析比较，认为与《四洲志》等书相比，还是裨著可信。^⑤

^① 徐继畲《瀛寰志略》，页276。

^② 徐继畲《瀛寰志略》，页277。

^③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1820-1870），美国外交官，曾为美国美国众议院译员。1861-1867年任美国驻华公使。对于中国，向表同情。1867年被聘为出使英、美、法、普、俄等国大臣。其与各国交涉着重不干涉中国内政，中美友好关系，蒲氏有奠基之功。1868年订立《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

^④ 林谦《国地异名录》称《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美理哥国志》、《美理哥志》或《本国志》。

^⑤ 林谦《国地异名录》，页41。

清代继杨柄南之后专门注释《海录》的学者吕调阳，注释“咩哩干国”一条时大量摘引《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内容，而且明确提及裨著。吕调阳本^①为删改本，几与原著相等。吕调阳本对《海录》的研究比较深入，注释（包括摘引他书）文字数量很大，为《海录》研究中最重要版本之一^②。从下表（表6）可见裨著在该书中应用之广泛。

表6 吕调阳注释的《海录》引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情况

吕调阳注释本内容	注释本摘引《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之章节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曰美理洲处极西，古无人至。明宏（弘）治五年始有伊人里人哥伦布觅地到此。十年复有船主美理哥至此久住。后人即以其名名此地焉。	卷之一“觅新土”
后各国至者渐众，辟地渐广。及雍正十年有十三部落，人口百数十万，皆归英吉利管辖。	卷之三“创国原由”
至乾隆三十九年，新国各部众衿耆，因英吉利妄勒加税饷，弗忍其虐，会议密约各部出壮丁，整战舰，立华盛顿为帅。于乾隆四十一年檄告各国，与英人拒战。	卷之四“百姓自脱英国之制”
至四十九年英吉利王知新国终不可胜，遣大臣讲和罢兵。乃于乾隆五十三年会议，定立一国，之首曰统领，其权如国王。四年一代，不世及。	卷之五“开国以后史略”
各部之首曰首领，其权如中国督抚。一部中复分中部落若干，如知府。再分小部落若干，如知县。其国都内立六政府，如六部尚书，唯无工部，而有驿部，皆数年一代。凡公选公举之权不由上，而由下。都城有议事阁，有选议处。统领任满，如无贤可代者，公举复任。或身没，或自解任，则以副领当之。不愿则推议事阁之首。不愿则以选议处之首护理。设终无人，则吏政府移文于各部首领，遍示士民速举焉。其本省之官各由本省之民选择公举焉。举人之法，各书所欲举，置甌中，临时启之，举多者为入选。举人者非本地之人。二十一以上不得与。选议之任，非三十岁以上不得与。其统领以三十五岁为例，议事阁以二十五岁为例。	归纳卷之十三“国政一”、卷之十五“国政三”

吕调阳还利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考证出“绥亦咕国”即为瑞典。^③

李慎儒撰写《瀛环新志》一书，在考证华盛顿的生卒年月时，特别拿出裨著来核对，称“彼国人所著《美理哥志》曰，顿以嘉庆五年卒，国人呼之曰国父”。^④

叶子佩在1845年绘制的《万国大地全图》，以裨著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为重要参考资料。

叶子佩，字圭绶，河北沧州景县人，先后绘有《山东全省考古舆图》、《水经注今山东境内水道

^① 吕调阳注释本，同治庚午（187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有藏本。

^② 安京《海录校释》绪论，页12。

^③ 谢清高口述、杨柄南笔录、安京校释《海录校释》，页257—258。

^④ 此处当引自《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五“开国以后史略”。（清）李慎儒撰《瀛环新志》，页2上—3下。

图)、《海江险厄黄河穿运夺济图》等。^①

《万国大地全图》以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和南怀仁《坤輿全图》二图为底图绘制，是日前海内外发现较早的中国人亲绘的世界地图，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初刻，1851年（咸丰辛亥）重刊。

《万国大地全图》中的注记文字和地名取自多种资料，其引用史料之广泛，在中外舆图史上亦很罕见，充分体现了该图的珍贵价值所在。北半球第一条幅引用的著作就有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万国大地全图》北半球第一条幅中注释“米利坚”时提到：

华盛顿以十三部之地，析置两京二十六部。北畿旧都城北极出地五十二度。南畿新都北极出地三十八度，具见其国人高理文著《米理哥合省全志》。核诸南怀仁等各图，迥异者什有八九，乃古今沿革之所致也。

此处《米理哥合省全志》是叶子佩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别称。之后，叶子佩又列出二十八部名称，其中大多包含《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的用语。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经过重新修订，在1861年由墨海书馆出版了《大美联邦志略》。《大美联邦志略》出版后，先后辑入《西学大成》、《西史汇函》等丛书中，受到中国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的推崇，笔者还发现中国最早被清政府派遣出去游历或出使的中国官员，包括斌椿、志刚、傅云龙等人，在国内就通过《大美联邦志略》获知美国的信息。

斌椿——第一批由清政府派遣的亲白去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的代表——对近代文化知识的了解，就曾得益于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一书。

1866年，在担任中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组织下，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赴泰西“游历”。斌椿一行在欧洲游历时间尚不足四个月。但是正如他自己所云：“愧闻异域咸称说，中土西米第一人。”^②斌椿此行记事抒情之作，有《乘槎笔记》，诗稿《海国胜游草》、《天外归帆草》二种。

斌椿曾经作诗叙述《联邦志略》、《地球说略》等书，帮助他改变“天圆地方、天动地静”的老观念，使他懂得“地球如球，自转不息”的科学道理。诗云：

卫公来京师，赠我《联邦志》（美国使臣卫廉士，驻北京六年，前载赠予《联邦志略》，所言疆域政事甚详）；才士丁玮良，著书讲文艺（美国文士丁玮良，学问甚优，以所著《地球说略》等书见惠）；初如井底蛙，开编犹愤愤。书云地形方，主静明其义；岂知圆如球，昼夜如斯逝……^③

正是有此基础，斌椿出使欧洲与美国使臣交谈过程中，才能发现对方所述美国地理“与《联邦志略》诸书相符”。^④

志刚——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代表之一——在出国之前就已研究《大美联邦志略》。

^① 李胜伍主编《万国大地全图》。

^② 斌椿《天外归帆草·晓起》。

^③ 斌椿《海国胜游草》，页181。

^④ 斌椿《海国胜游草》，页181。此处卫廉士即指卫三畏，丁玮良即为丁韪良。

1868年，清政府向西方派出第一个外交使团。使团由三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组成，他们是：前任美国驻华公使，此时受聘为中国政府服务的美国人蒲安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花翎记名海关道志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道衔繁缺知府、礼部郎中孙家谷。使团在1868—1870年期间历访美、英、法、普、俄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志刚在1870年蒲安臣死后，接任使事。他在美参观华盛顿墓地时，提到“其人其事”在《联邦志略》和《瀛寰志略》中记载“颇详”。无疑他也曾阅读裨氏著作。^①

中国文人黄乃裳^②亦深受《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影响。黄乃裳浏览中文西书颇多，在阅读完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之后，发出感慨：

传子之天下，易而传贤，且君位有四年限制；君主之天下，易而民主，或曰总统，令士庶皆有，举主举官及议政之权，是推陈出新之一大创局也。

他认为美国的政体是“驾欧洲英、俄、德、法、意、奥、西、和、比、葡、瑞、挪诸国而上之也”。由于裨著之叙述至开国后四五十年为止，因而黄氏萌生把美国开国后六七十年事迹逐一叙述的愿望，^③后来就为蔚利高撰写的《大美国史略》属文。

傅云龙——第一批钦派游历使之一——在出国之前也受《大美联邦志略》的影响。

1887年，傅云龙和顾厚焜等人，通过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考试，以钦派游历使身份赴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等国考察。

傅云龙不似一般出国游历官员那样游山玩水、走马看花，以了解一些异邦风情为满足，而是深入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各国史地形势。他每到一个国家，即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风俗和物产等方面的资料。在游历期间就撰写了《游历日本图经》三十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三十二卷，此外在游历各国的过程中又写了详细的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记》。

其中《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一书中多次提到《联邦志略》。傅云龙还根据《联邦志略》作些名词翻译。比如提到“外交部长”根据《联邦志略》可翻译为“文书院长”。^④作者认为有关美洲的书籍可分为三类，第一是“述纪美利加事之书”；第二是“述美利加人书”；第三是“述美利加人译书”。^⑤傅云龙把《联邦志略》列入第一类，置于冈千仞的《米利坚志》和谢卫楼的《万国通鉴》之前，并向读者突出介绍该书作者。^⑥可见，傅云龙对裨著的重视程度。

傅云龙一行游历日本、美洲，时间长达两年，行程不下三万里。他认为，“所游诸国，以美利加为富国之翘楚，而不得不以日本为中外之枢纽”。^⑦这种认识，一部分无疑源于对现实的了解和比较，一部分可能是受到详细描述美国国力强盛的《大美联邦志略》的影响。

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对后世的影响，也可以从以下几个条目中看出。

^① 同治七年（1868），五月二十一日日记。（清）志刚《初使泰西记》，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3辑，页55。

^② 黄乃裳（1849-1924），福建闽清人。字绂臣，号慕华。参加康梁变法，失败后逃难新加坡。1900年往沙撈越，召集家乡子弟千人在泗务地区垦殖。1904年离泗后投身于民主革命。他率先响应武昌起义，领众光复福建。曾向南洋华侨募款支援革命政府。1920应孙中山之聘到广州元帅府任高等顾问。

^③ 黄乃裳写其所读为“裨治文先生六十年前所著”，叙述内容仅为“开国后四五十年事”。蔚利高在《凡例》中亦称“裨治文在六十年前所著之《大美联邦志略》”。由此推断，蔚利高和黄乃裳看到的可能是1838年版的著作。

^④ 傅云龙《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卷三十，页10上。

^⑤ 傅云龙《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卷三十一，页31下—32上。

^⑥ 傅云龙《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卷三十一，页33上、下。

^⑦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后编。

最早注意西方地理学译著的清末学者王锡祺，从《海国图志》中摘录《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内容，辑成《美理哥国志》，置于他编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十二帙。

1889年孙维新在“泰西格致之学与近刻翻译诸书详略得失者为最要论”一文中认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地理学译著应该包括裨治文的《联邦志略》。^①

1897年唐才常主编的《湘学新报》连载《史学书目提要》，其中有一条专门介绍《联邦志略》。

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列有此书，^②《读西学书法》的专史类又把此书列为西史专史的代表作之一。^③《西学书目表》收录了鸦片战争前后所译西学各书，并通过学、政、杂三类的区分而达到对西方学术的一个初步总结，其中识语和《读西学书法》对部分图书作了评价，这些加上圈识及《序例》中的一些话构成对西书的推荐。

1902年徐维则称此书：

凡四十邦皆十三邦所分，纪联邦故事及开国缘由，一一胪载，足以考见米人之治体，公会之渊源。^④

可见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该书仍是中国人了解美国地理历史文化等资料的重要来源。

王韬对《大美联邦志略》极其推崇，认为裨治文的这本著作“自创国至今，原本具备，于一邦之制度事实，有所考证，中国史册中所必采也”。^⑤王韬在赞赏来华西方人的著作时也特别强调此书，他说：

自泰西诸儒入旅中国以来，著述彬彬后先竞美……靡不辑有成书，言之有要。而其中尤切于事实者则若慕维廉之《大英国志》、裨治文之《联邦志略》，即以其国之人，言其国之事，不患其不审而实，可以供将来考索。^⑥

怪不得后人把裨治文的地志与汤若望、南怀仁、伟烈亚力等人的天算物理，合信的医学等相提并论，称“足补我国旧有学术之不足”，而“另辟一新途径”。^⑦

而现代人编撰《续修四库全书》时，还把《大美联邦志略》收入其中，^⑧称之为“《四库全书》未及收入的乾嘉以来著述之重要者”。^⑨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和《四洲志》一起，构成了中国人早期了解美国的主要资料来源。^⑩而深受裨著影响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两书“在今日诚为刍狗，然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¹¹而且，犹如裨治文自己在《中国丛报》上对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所作的评语：我们认为，这本书（指《瀛寰志略》），会改变中国学者和官员的自负心理以及对外部世界

^① 王韬编《格致书院课艺》，上海书局1897年石印本。

^②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

^③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载（清）于宝轩辑《皇朝蓄艾文编》卷七十二“学术四”，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官书局铅印本。

^④ 徐维则《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石印本。

^⑤ 王韬《翁牖余谈》。

^⑥ 《与法国儒莲学上书》，王韬《弢园尺牍》卷七，页308。

^⑦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页141-142。

^⑧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中外交通》，页122。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未把裨著列入其中，该书称译作入选的标准是“译本的社会影响”，按此标准，笔者以为裨著入选是当之无愧的。

^⑨ 《续修四库全书凡例》。

^⑩ 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观》，页10。

¹¹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页391。

的漠视，向他们证明他们的国家并不是地球上唯一的国家。^①

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一方面向中国读者展示了美国社会的繁荣昌盛，另一方面表明学习外国对外贸易和机器人生产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而这些正是当时清政府强烈排斥的。不过这些思想却启发了魏源、徐继畲等人，并成为后来洋务派自强新政的主要内容。从裨治文的论述中约略可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对待外强的方策，即“师夷长技”和互市通商。无怪乎有学者评论说：“裨治文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发展现代经济的简便可行的指南。”^②

第二节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近现代汉语形成的作用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地理知识上扩大了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在思想上使中国人了解了美国民主制度。不仅如此，在语言上，《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对近现代汉语的形成也有影响。

近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研究，在汉语语汇史、西学东渐史、中日欧文化交流史和中国科技史等学术领域，都是极有意义的工作。几十年来学界对近现代汉语外来词的研究有了一定发展。1997年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意大利学者马西尼所著、黄河清翻译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追溯了500个词语的源头。1993年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创办《词库建设通讯》，为外来词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论坛。在此基础上，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合作编写《近现代汉语新词源词典》（在以下正文中简称《词源词典》），收录5275个条目，进一步推动汉语外来词词源的研究。其中提到一部分词语就首见于《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但是还有个别词语实出《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而被误认为出自后世著作。

起初人们以为一部分近现代汉语新词的产生是由日本学者将西文词语用汉字翻译出来，再由中国方面接受现在的这些词语，结果有许多汉语新词被认为借自日本。其实，新词产生的其中一条途径就是“从西洋到中国（但在中国没有流行开来）再到日本，而后返回中国”。^③比如，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裨治文用过以下这些词：学校（日语读 gakko，即 school）、政府（日语读 seifu，即 government）、选举（日语读 senkyo，即 to elect）、保障（日语读 hoshōk，即 to protect）、刑法（日语读 keihō，即 penal law）。从这些词的使用中，我们可以证明它们在古汉语中已经存在，后来在1838年由裨治文重新启用，然后这些词传入日本后，在明治早年很快被日语吸收，最后作为来自日语的借词，又传回中国。^④

另外，如贸易、文学、法律、火轮船、火轮车、火车、公司等词，裨治文等人的著作在未收入《海国图志》之前，可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它们所包含的新词可能也不为人们所常用。所以这些词的命运随着裨氏著作和《海国图志》等书在中日两国的传播而改变。可以说，裨著对于现代学者研究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提供了很大帮助。笔者下面试对《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所出现的和重新起用的新词略作探讨，有些地方与《近现代汉语新词源词典》相比照，加以说明。

日常生活类：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20, p.193.

^② Fred W. Drake, *Protestant Geography in China: E. C. Bridgman's Portrayal of the West*, p.105.

^③ 周振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创制汉语新词方面的作用》，载《词库建设通讯》第15期。

^④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页101。

架非，即咖啡。例如：饮食则每日三餐，早膳或饭或面饱（包）或猪、羊、烧、烩不等，亦有牛奶、鸡蛋、牛油、茶、架非。架非是将青豆炒焦研末，水煎或白滚水冲隔渣各物^①

从现有的资料看，最早解释咖啡的可能就是裨治文。后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把“架非”转抄为“架非”，《小方壶斋舆地丛抄》中的《美理哥国志略》几乎完全抄录《海国图志》，所以仍为“架非”。^②所以时人以为“架非”一词第一次出现于1838年的《美理哥国志略》。^③

礼拜，即星期。例如：“每七日一礼拜，是日惟养心教人已矣。”^④《词源词典》（页153），早期例证为1852年《海国图志》。

礼拜一，即星期一。例如：“以十二月初礼拜一之日，齐集京都公堂会议”。^⑤《词源词典》（页154），早期例证为1876年葛元煦的《沪游杂记》。

新技术类：

棉子风柜，即轧棉机。例如：“棉花价不高昂，因有棉子风柜也。棉子风柜可以去棉子而取棉花，且每柜能当数百人之工。”^⑥

扭榘，即自来水龙头。例如：“……街中、家里另各竖一管以截其水，管上一扭榘。如欲放水，则扭出其榘，欲止其水，则扭入其榘也。”^⑦黄河清在检索 tap（英语）一词时提到5个词目，^⑧但没有提及裨著中出现的“扭榘”一词。

火车，例如：“其外更有火车，不用马匹，内以火力旋绕，日可行千余里。”^⑨

烟柜，即蒸气机。例如：“其烟柜在车则云火蒸车，在船则曰火船，此皆赖水蒸之力旋转而行。”^⑩《词典词源》对烟柜、火轮车（即火车）、火轮船（即轮船）的早期例证都举《美理哥国志略》，“烟柜在车则云火轮车，在船则曰火轮船，此皆赖水蒸之力旋转而行。”¹¹经对照，《小方壶斋舆地从钞》所载《美理哥国志略》与原著有出入，1838年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并无“火轮车”、“火轮船”两词出现。

寒暑针，即测量气温的一种温度计。例如：“欲知土地之美恶，必先知寒暑风雨之候，故设一寒暑针，用年月日较之可知其寒暑。”¹²

铅字，指用铅、锡、锡合金铸成的印刷或打字用的活字。例如：“书板则极多，盖不用一定不易之板，而用铅字活摆板也。故用铸字、制纸、印书三等人甚多。”¹³

电机远报，即电报。例如：“又有电机远报，安设水陆，用以飞传一切音信，不论军国政务，虽千万里，弹指可通。”¹⁴

^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六“礼义规模”。

^② 高理文《美理哥国志略》页15下，载《小方壶斋舆地从钞》再补编，第十二帙。

^③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近现代汉语新词源词典》，页119。

^④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九“辨教邪正”。

^⑤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三“国政一”。

^⑥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八“累斯安省”。

^⑦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九。原文为“扭准”，应为扭榘之误。

^⑧ 《汉语外来概念词库》词条选刊（11），载《词库建设通讯》第11期，页59—60。

^⑨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上篇“马沙诸些省”。

^⑩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上篇“边西耳文省”。

¹¹ 《进现代汉语词源词典》，页303、116、117。

¹²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八“山川”。裨治文在其1841年出版的《广州方言中文文选》（页145）中有一句提到该词，“寒暑针到几度”。

¹³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一“工作”。

¹⁴ 《大美联邦志略》“邦都道路”。

文化类:

博物院,即博物馆。例如:“省城内有一博物院,广聚天下出类拔萃之人。”^①“博物院”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十分常用的词。

大书院,即大学。例如:“大书院共六所,内一所自始建迄今,已历二百年矣。”^②马西尼以为裨治文用“大书院”指哥伦比亚大学,举例:“纶备亚……教会约二三百,大书院二所”。对“大学公堂”和“大学馆”的解释也是如此,以为裨氏用这两个词特指伦敦大学。^③马西尼所述并不全面,可能是因为没有看到裨氏原著全文,只知摘录裨著部分内容的《小方壶斋舆地从钞》本。其实裨治文在介绍每州概况和全国学校中,对应“实施高等教育的学校”这一概念,用词较多,如“大书院”、“大学公堂”、“大学馆”和“大学”等,并非特指何所大学之义。

大学公堂,即大学。例如:“建大基部……教会约四五百,大学公堂五所,各处小学馆亦不甚多也。”^④

大学馆,即大学。例如:“另有大学馆,惟许已中举者进焉。”^⑤《词源词典》(页44)中,“大学馆”的早期例证为1872年志刚的《初使泰西记》。

律例院,即法学院。例如:“共计国内律例院有数十余间,每间有一师掌教,进院习读者,以三年为满,皆不过训告规条律例而已。”^⑥

演武馆,即军事学校。例如:“国中有一演武馆,在省内活得逊河傍,地名西角。”^⑦其他表示军事学校的名称如兵法馆、兵学校、韬略馆、武备学堂、武备书院等,首次出现时间都比“演武馆”迟。^⑧

凸字,即盲字。例如:“盲者即有凸字书,使他以手揣摩而读。”^⑨

公项书,即公共图书。例如:“(费治弥亚省)……书院有四,内共为师者几十位,从学者几百位,公项书数千本。”^⑩

新闻书,即杂志。例如:“另外亦有每月新闻书,书内载……。其书有一季一出者,约二三百篇,……亦有如中华之时究书,一年一出者,约三四百篇,……”^⑪

文凭,原指用作证明的官方文件,后指学校发给学生的毕业证书。例如:“在内四年,每岁逾等,文凭给领。”^⑫《词源词典》(页272)举例1890年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

统领,即总统。例如:“京都内有一统领为主,副领为佐。正、副统领,亦由个人选择。”^⑬

总领,即总统。例如“……此时有合省货船尾西班牙人所劫,合省国总领知之,起兵反讨于西

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上篇“边西耳文省”。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上篇“马沙诸些省”。

③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页197—198。

④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上篇“建大基部”。

⑤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一“学馆”。

⑥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六“国政四”。

⑦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上篇“新约基省”。

⑧ 分别根据《近现代汉语新词源词典》页16、17、251、273、273。

⑨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四“仁会”。

⑩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上篇“费治弥亚省”。

⑪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二十二“书籍”。

⑫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

⑬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三“国政一”。

班雅王。”^①

首领，一指总统。例如：“国法虽定，尚未有文武员弁，遂议立华盛顿为国首领，文武各员，亦议定焉。”^②一指州长。例如：“各省内一首领、一副领，议拟人员无定数，民选议事者，或十余人和数十人无定。”^③

公议堂，即议会。例如：“中建公议堂、君主宫室、百官部署，以及民居咸在。”^④《词源词典》（页90）举1891年林乐知所著《三得惟枝岛纪略》为早期例证。

议事阁，即众议院。例如：“每省择二人至京，合为议事阁；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⑤《词源词典》（页317），释为“议会”，举例1852年《海国图志》。

选议处，即参议院。例如：“每省择二人至京，合为议事阁；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⑥

议厅，即议会。例如：“遇衿耆到议厅欲议公事，王委大宪即驱散之也。”^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所载《美理哥国志》抄录为“议事厅”（页2背），而《词源词典》（页317）对“议事厅”的早期举证为1875年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

察院，即法院。例如：“……欲人遵守，则有审理犯例者，此察院所由设也。”^⑧《词源词典》（页29）举例林鍼1847年的《西海纪游草》。

国例，即宪法。例如：新国制例有三：一曰国例，为二十六部所通行；二曰部落例，各部不同；三曰府例，每府亦不同……四曰县例……；五曰司例……^⑨

公司，特指东印度公司。例如：“英吉利王则谕，公司船至此，不向卖者收税，而令卖者纳也。”

^⑩ 18世纪就已出现，不同时期指称范围不同。

其它：

管理，表示监督和管理某些特殊事务，作动词用。例如：“国中察院有三：管理都城者，曰京察院；管理二三部落者，曰巡按察院；管理一部半部者，曰分巡察院。”¹¹根据高名凯《外来词研究》（页93），这是一个来自日语的原借词。

会议，原义是“聚会论议”，后指有组织有领导地商议事情的聚会。马西尼认为白禅治文始将它当作名词来使用。¹²马西尼理解错误。禅氏原著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所载《美理哥国志略》中，多次出现“会议”，但都是作动词使用。例如：“设与外国相争，外邦求和，统领必会议，然后如其所请。”¹³

法律：这是一个来自日语的回归借词，而不是来自日语的借词。因为它在汉语中古已有之。《职方外纪》中就已出现，1838年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用过。例如：“……京都有一察院，院内

^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上篇“蹉治亚省”。

^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五“开国以后史略”。

^③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三“国政一”。

^④ 《大美联邦志略》上卷“邦都道路”。

^⑤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三“国政一”。

^⑥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三“国政一”。

^⑦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四“百姓自脱英国之制”。

^⑧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六“国政四”。

^⑨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四“国政二”。

^⑩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四“百姓自脱英国之制”。

¹¹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六“国政四”。

¹² （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页216。

¹³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五“国政三”。

共七人，以每年正月齐集究人因何不遵法律之故。”^①

第三节 对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影响

虽然裨治文当初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时，是给中国人阅读的，但是笔者发现 19 世纪后半叶的在华美国人甚至美国当局也极为看重此书。

1854 年 5 月 22 日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带领裨治文等人乘“色斯奎哈那”号前往南京太平天国总部，5 月 27 日到达。^②美国人曾要求与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见面，被拒绝。美国人收到太平军的拒绝信后，对太平军相当失望，他们觉得此信“语气和体裁都极怪异，令人惊诧”。为表明美国与太平军接触并非为了向其纳贡，“色斯奎哈那”号舰长布嘉南便立即回信并附上一本美国史著作及一幅美国国旗图案。布嘉南在照会中称：

……又着本军门达知，在我国国家向来与别国交往，从无纳贡，即使纵有自大之过，我合众国亦总未有尊之为上者也。兹付去本国纪略一本，旗式一纸，乃我钦差送上贵国首相细阅，以免日后恐有错误，认别邦为我国之差也。^③

这里的“本国纪略”据说就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④

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还成为美国人赠送中国政府的珍贵礼物。1862 年，美国使臣蒲安臣赴京呈递国书时附带呈上汉文版《圣经》和新版《联邦志略》，^⑤可见美国政府也相当看重此书。1863 年卫三畏在京城担任美国驻北京使馆参赞时，曾把此书作为礼物赠送给斌椿——第一批受清政府派遣赴美接触和了解西方文化的代表之一。^⑥

1868 年时，《大美联邦志略》在上海还有出售，可见此书在当时仍有一定的需求和影响。^⑦同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⑧主编的《教会新报》^⑨还在向读者介绍“花旗国人，有名望之裨治文先生”的《联邦志略》^⑩。编者认为《大美联邦志略》对美国的介绍“原原本本，颇极详明”，并摘录其中有关美国交通的一章内容以飨读者。^⑪

直至 19 世纪末，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还被美国史家作为撰写中文美国史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1899 年，美国作家蔚利高于福州美华书局出版《大美国史略》一书，还在直接参考裨氏

^①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三“国政一”。

^② 相关内容于生平部分述及。

^③ 《中美关系史料》，页 164。

^④ Spence, *God's Chinese Son*, p. 207, cited by Lazich, E. 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n'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p. 334; (美)史景迁著，朱庆葆、计秋枫等译《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页 329。但是，我们至今没有看到相关的英文材料，史景迁的中译本中也没有注明出处。

^⑤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页 833—834。

^⑥ 斌椿《海国胜游草》，页 181。

^⑦ 《教会新报》（一），页 33。

^⑧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美国监理会传教士。1860 年来华，在杭州、上海一带传教。1863 年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1868 年在上海创办和主持《教会新报》。曾先后在苏州开设博习书院、中西书院，在上海开设中西书院，并于 1901 年将以上三校合并改组为东吴大学。提出将基督教义与儒家礼教相结合；主张将印度的殖民统治“一一移而治华”。编著有《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等书。

^⑨ 《教会新报》于同治七年七月（1868 年 9 月）创刊，每周一刊，每刊四张（八面）。至同治十三年改为《万国公报》，其组织更加扩大，内容也更加充实。《教会新报》（一），页 33—34。

^⑩ 原文为《联邦志略》。

^⑪ 此内容摘自《大美联邦志略》下卷“邦都道路”一章。

著作。作者在《白序》中提到，此书之所以能完成，所得力的汉文著作即裨治文的《大美联邦志略》^①。作者声称“久耳其名，嗣于友人处得之”，而且“取资特多”，为表示不“掠人之美”，又在《凡例》中说明有采裨著内容。

种种迹象表明此书在美国人心目中有较高的地位。连美国人自己也认为此书，至少在当时是全面而正确地描述美国历史的最佳版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日本也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由于叩开日本国门的是美国人，所以，日本人首先迫切希望了解的，是有关美国的知识。《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其中美国部分的内容就成了他们的重要参考资料。仅1854年，翻刻、译解《海国图志》美国部分不同名目的选本，就有八种之多。^②随着《海国图志》的广为流传，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也受到日本人的注目。

裨治文在《重刻联邦志略叙》中提到“又有日本人以其国语译者”。^③梁植也提到有名叫“可行者”的日本人从“林本”（指《海国图志》）中摘出《联邦志略》的内容，加以翻译。^④

1862年6月，日本一艘从长崎出发的贸易船“千岁丸”到达上海，船上除了幕府任命的官员外，还有后来在日本政界、军界、财界赫赫有名的高杉晋作、中牟田仓之助、五代才助等十几名藩士。这些藩士在上海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在各大书店、书摊大量收购中国有关中国地理、历史、政治等方面的书籍以及汉译西书。一部分人还专程造访有关新学书著者，求取著作。高杉晋作就数访慕维廉，求得一些新学著述，其中就有《联邦志略》、《上海新报》、《数学启蒙》、《代数学》、《地理备考》等。^⑤

这些书籍传入日本后，很快受到日本有识之士的欢迎和充实，纷纷加以翻译、训点、评论和刊印，成为当时日本人吸收西方文化的重要启蒙书籍。

《大美联邦志略》传入日本后，就有学者箕作阮甫^⑥加以训点，在其去世后翌年，即元治元年1864年正式刊行。^⑦从哈佛—燕京学社所藏的箕作阮甫训点的《联邦志略》来看，与墨海书馆1861年版相比，该版只有细微的改动。一是古今地理图和大美联邦全图等图横竖颠倒；二是把梁植的“跋”从原著的最后面移到最前面，^⑧从中告知读者有关裨治文的生平。^⑨

而风行中国的《米利坚志》，就是因为日本学者冈千刃和河野通之认为美国人格坚勃斯的原著过于简略，从而依据《联邦志略》、《瀛寰志略》、《万国公法》和《格物入门》等书补充之而编成

^①（美）蔚利高撰并译（清）黄乃裳属文《大英国史略（附中美约章撮要一卷）》。原文为《大美联邦志略》。

^②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页33。

^③ 《大美联邦志略》白叙。

^④ 梁植《大美联邦志略·跋》。但笔者未发现有日文本，据说，当时的日本人根本不需要通过翻译来阅读中文。

^⑤（日）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启乾译《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页22—23。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页116。

^⑥ 箕作阮甫是日本“蕃书调所”（即西洋书研究所）成员。蕃书调所1855年成立时叫洋学所，从1856年2月起改称蕃书调所。1862年又改称洋书调所，不管名称如何改变，它是幕府直辖的洋学所、洋学校。

^⑦ 有人认为，在1861年，日本已印行了《联邦志略》的日译本（Pittau, Joseph, S. J. *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Meiji Japan, 1868-1889*.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 1967. 转引自（意）马西尼著，黄河清译《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的研究》，页101。这好像不可能，至少不会是1861年墨海书馆的《大美联邦志略》。

^⑧ 裨治文撰述，箕作阮甫训点《联邦志略》，江左老皂馆藏梓。哈佛特藏，胶片F37。

^⑨ 日本学者鲇泽信太郎认为《联邦志略》的初本是“林则徐《四洲志》的原本”。见鲇泽信太郎《锁国时代日本人的海外知识》，页162。又有日本人石山洋认为“《海国图志》之基础——《四洲志》——的原文亦为裨治文所写”。见沼田次郎等编《洋学史事典》，页631。

的。^①

除去内容参照《联邦志略》外，《米利坚志》在写作手法方面也模仿禅著。比如，关于美国的邦名，如“马洩朱些斯”简略为“马邦”，“牛含布什尔”简称“牛邦”，作者明确提出这是仿照《联邦志略》而来。^②

^① 冈千仞《翻译米利坚志·例言》，载（美）格坚勃斯撰（日）冈千仞和河野通之合撰《翻译米利坚志》。1896年有新学书局仿日本板刊行的石印本《米利坚志》二册，此后，中国人多采用后者为书名。梁启超也把它列入《西学书目表》中。

^② 冈千仞《翻译米利坚志·例言》。

结 论

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在1844年12月刊登了一篇题为《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的文章，文内写道：

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以往中国人由于语言上的障碍，无法直接了解到外部世界的发展变化。传教士来到中国后，不仅带来了西方世界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也带来了科学文化和他们国家的历史。^①

这个评价用在别的传教士身上，也许并不过分，但是用在裨治文身上，是不够的。因为，在早期中美文化交流史上，裨治文所做的远远不止这些。

裨治文在华三十余年，不但给中国人带来了西方的知识，还向西方人介绍了中国文化，对中西文化交流，特别是中美之间，有着不非的贡献；由于裨治文是少数了解中国语言、习俗的在华西方人中的一个，所以他对美国政府介入中国事务，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或改变，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从他在鸦片战争、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太平天国运动等期间的活动可以看出。

在我看来，裨治文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1832—1851年），记载了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各方面情况，被誉为美国第一本“中国学”著作。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成为后来各国史家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发轫和早期中外关系史的第一手资料。

在教育方面，裨治文组织发起了“马礼逊教育会”。马礼逊教育协会对后人的影响比较大。马礼逊教育会设立的图书馆和遗留的基金，泽被后世；在马礼逊教育会名下建立的马礼逊学校，培养了不少对晚清社会比较有贡献的人物，如容闳、黄宽、黄胜等人；马礼逊学校使一部分中国人改变了对西方人的印象，间接地为后来中国的教会学校铺下坦途。

裨治文还组织发起了“中国医药传道会”。中国医药传道会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医院的发展，而裨治文在医药传道会的形成、组织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裨治文组织的“益智会”出版了一些宣扬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中文书刊。裨治文的《广州方言中文文选》就是在益智会名下出版。《广州方言中文文选》是西方人与中国人进行个人交往的工具，它的编排形式及内容不但有助于欧美人士学习中国语言，更有助于他们从中认识中国文化，并且有助于在中国人中传播英语知识。

在宗教上，裨治文的《圣经》译本成为近代中国的通行版本之一。

裨治文的在华活动，在客观上向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出版、印刷和医学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不过，裨治文的在华活动并非都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他也做过一些不利于中国人的事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裨治文希望通过武力来打败中国，迫使中国开放，他的言

^① *Chinese Repository*, vol.13, p.642.

论起了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最终使西方国家采取了战争的手段迫使中国开放。二是直接参与制定中美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望厦条约》。

来到中国传教后，裨治文之所以专以译经、出版、教育、医疗等文化事业展开工作，是因为限于时势，目的是为了改善他们作为“夷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从而“征服中国人的灵魂”，他之所以活跃于中美外交舞台上，目的同样是为了改善新教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外部环境，从而有利于基督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应该说，裨治文为其信仰而奋斗的精神是可嘉的。

从裨治文在华活动中也可以看出，英美两国在华的传教活动从马礼逊来华开始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裨治文在华活动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他在1838年出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裨治文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目的是，向中国人表明美国及至其他西方国家并非蛮夷之邦，而有着同中国一样甚至更高的文明，从而打破中国人的天朝上国的观念，有利于基督教教义在中国的传播。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共有三个版本。第一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1838年由新加坡坚夏书院出版；第二版《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在1844年由香港印刷所出版；第三版《大美联邦志略》，在1861年由上海的墨海书馆出版。

从写作第一版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起，裨治文就陆续得到了一些中国人的帮助。这些中国人中，确切可知的有梁植、宋小宋和管嗣复等人，其中宋小宋和管嗣复可能是同一个人。

裨治文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中介绍了美国的史地、社会状况，展现了美国社会的高度文明。正是为了展现美国的高度文明，裨治文掩盖了对美国社会的阴暗面的介绍，主要表现在对印第安人的介绍有所偏颇，对奴隶制度更是避而不谈。

裨治文在语言翻译上，作了很多努力，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裨治文在中国文人的帮助下，创制了一些新词，来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有的制度、文化、科技、日常生活等概念。这些新词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另一方面，裨治文采用了“中国化”的写作手法，包括语言和价值观等方面。“中国化”的写作手法为了让中国读者能了解完全陌生的美国，同时也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裨治文对 the United States 的翻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问世后，受到当时放眼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重视。魏源在《海国图志》、梁廷枏在《合省国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都提到了这本书，并有大量引用。这是大家所熟悉的。此外，我还发现，梁廷枏在他的另一部著作《兰台偶说》中也多次提到了裨著；叶子佩、林谦、吕调阳、李慎儒、斌椿、志刚、傅云龙、黄乃裳等中国人也都有受到在《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或《大美联邦志略》的影响；甚至日本人和美国人都很重视《大美联邦志略》。

有学者说，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所奠定的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准备了初步的、但却是大批的中文基督教书籍。^①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作为第一本中文美国史地著作，正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美国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打破了中美两国之间的隔绝状态，对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重视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

^① 保罗·科恩《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载（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页604。

裨治文和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中国人认识美国的历程是非常艰难的。

笔者在撰写全文时，特别是在梳理《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传播过程时，在不算少的中文著述中，找到了一些资料。有人可能会感到，也许《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的影响非常之大。其实不然。

魏源、梁廷柎、徐继畲等人放眼看世界，虚心学习西方，这些人非常重视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接受了其中一些观点。我们只有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才可以看到裨著的影响，但是更多的中国人在那时依然闭目塞听。例如，鸦片战争期间，国中权贵琦善甚至以此为荣。林则徐从政治需要出发，“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新闻纸”。琦善却说：“我不似林总督，以大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①更可悲的是，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九个月之后，1845年4月10日，道光皇帝还问两广总督耆英：“米利坚立国甫六十年……是否确实？”令耆英“就近查询”。^②所以，裨治文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不可能、也没有对这些人产生什么影响。

这样，要想探究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需要在浩如烟海的中文文献进行艰苦的发掘。笔者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努力，希望这种努力能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早期中美关系史，以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

^① 《鸦片战争》（六），页142、144—145。

^②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三。

参考文献

(一) 主要中文著作(含译著)

- (美)丹特涅著,姚会
虞译 《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8年
- (美)德雷克著,任复
兴译 《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
- (美)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 (美)格坚勃斯撰(日)
冈千刃和河野通之合撰 ①《翻译米利坚志》,光启社、博闻社刻本,日本明治六年(1873)
- ②《米利坚志》,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新学书局石印本
- (美)韩德著,项立岭
译 《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前的美国与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
- (美)赖德烈著,陈郁
译 《早期中美关系史》,商务印书馆,1957年
- (美)欧内斯特·梅编 《美中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吴象婴等译 《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1992年
- (美)威廉·C.亨特著,
冯铁树译 ①《广州“番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 ②《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 (美)蔚利高撰并译,
(清)黄乃裳属文 《大美国史略》(附中美约章撮要一卷),福州美华书局铅印本,清光绪二
十五年(1899)
- (清)傅云龙著 ①《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清光绪十五年(1899)铅印本
- ②《游历日本图经余记》,清光绪十五年(1899)铅印本
- (清)林谦 《国地异名录》,同治十年(1871)无所住斋刻本。
- (清)王之春 《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
- (日)增田涉著,由其
民、周启乾译 《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
- (日)沼田次郎 《洋学史事典》,雄松堂,1984年
- (瑞典)龙恩泰著,
吴义雄等译 《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
- (意)艾儒略 原著 谢
方校释 《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
- (意)马西尼著、黄河
清译 《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汉语大词典出版
社,1997年
- J·艾捷尔编、赵一凡等
译 《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海南出版社,2000年
-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
会编 《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二辑),中华书局,1983年

- 高理文（即裨治文） ①《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新嘉坡坚夏书院，道光十八年
②《美理哥国志略》，载《小方壶斋舆地丛抄》第12帙
- 裨治文 ①《亚墨理格合众国志略》，香港藏版，道光二十四年
②《大美联邦志略》，上海墨海书馆，1861年
- 裨治文撰述，（日）箕作 ①《联邦志略》，江左老皂馆藏样，1864年
- 阮甫训点
- 刘路生点校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近代史资料》（92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 斌 椿 ①《海国胜游草》，岳麓书社，1985年
②《天外归帆草》，岳麓书社，1985年
- 陈邦贤 《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1年
- 陈 垣 《陈垣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0年
- 大庭修著，戚印平、王 ①《江户时代中国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
勇、王宝平译
- 邓元忠 《美国人与太平天国》，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台北，1982年
- 邓之诚等编 《太平天国资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6辑
- 方 豪 《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
- 高 沂 《中国高等学校简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
-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龚纓晏 《鸦片的传播与对华鸦片贸易》，东方出版社，1999年
- 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 顾卫民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广东、广西太平天国史 ①《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三十周年》，广东、广西
研究会编 人民出版社，1983年
- 广东文史研究馆译 《鸦片战争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
- 郭实猎 《大英国统志》，英华书院藏版，1834年
- 何大进 《晚清中美关系与社会改革》，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 何顺果 ①《美国史通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
②《美国边疆史》，北大出版社，1992年版
- 洪仁玕 《资政新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II）神州国光社，1952年
- 胡逢祥、张文建 《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
- 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 ①《中日文化史论集》，中华书局，2002年
论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 黄时鉴 《插图解说中西关系史年表》，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 蒋国珍 《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民国丛书》第三编，1991年
- 李定一 《中美早期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李慎儒 《瀛环新志》，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思轩石印本，
- 李胜伍主编 《万国大地全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
- 李志刚 ①《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 ② 《基督教与近代化中国论文集》(二), 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 台北, 1993 年
- 利玛窦 《坤輿万国全图》, 禹贡学会, 1933 年影印本
- 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东方出版社 1996 年
- 梁廷枏 ① 《海国四说》, 中华书局, 1993 年
- ② 《夷氛闻记》, 中华书局, 1959 年
- ③ 《粤海关志》,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81-184 辑)
- 林乐知主编 《教会新报》(一), 台湾华文书局, 1968 年
- 林乐知主编 《万国公报》(合订本第九册), 台北华文书局, 1968 年
- 林治平 《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90 年
- 刘锦藻 《清朝文献通考》,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6 年
- 陆坚、王勇主编 《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 马士、宓亨利 《远东国际关系史》,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 年
- 马士著, 张汇文等译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三联书店, 1957 年
- 马祖毅、任荣珍 《汉籍外译史》, 湖北教育初版社, 1997 年,
- 麦都思 《东西史记和合》, 巴达维亚, 1829 年
- 麦沾恩著, 朱心然译 《梁发——中国最早的宣教师》, 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98 年
- 茅家琦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 米 怜编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马六甲, 1815—1822 年, 哈佛特藏胶片 A75
- 鲇泽信太郎 《锁国时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识》, 乾元社, 昭和二十八年(1958)
- 彭斐章主编 《中外图书交流史》,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 齐思和等整理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咸丰朝), 中华书局, 1964 年
- 齐文颖主编 《美国史探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年
- 乔明顺 《中美关系第一页——〈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
- 容 闳 《西学东渐记》,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 阮 元主撰 《广东通志》, 上海印书馆, 1934 年
- 史景迁著, 朱庆葆等译 《“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 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年
- 司德敷 《中华归主》(下), 中国社科出版社, 1985 年
- 苏 精 《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 台湾学生书局, 2000 年版
-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① 《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2 年
- ② 《中美关系史料》,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68 年
- 唐才常主编 《湘学新报》, 1897 年
- 王立新 《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 王庆成 《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 王韬 ① 《王韬日记》, 中华书局, 1987 年
- ② 《弢园文录外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2 年
- ③ 《弢园尺牍》,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 100 辑

- ④《瀛寰杂志》，《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9辑。
 ④《翁牖余谈》，《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06辑
 ⑤《漫游随录》，岳麓书社，1985年
- 王铁涯编 《中外旧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
 王锡祺编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台北，1962年，62卷本
 王晓秋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年
 魏源 《海国图志》，岳麓书社，1998年
 吴义雄 《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 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 《近现代汉语新词辞源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
 谢清高口述，杨柄南笔录，安京校释 《海录校释》，商务印书馆，2002年
 熊月之 ①《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②《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 徐继畲 《瀛环志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徐维则 《增版东西学书录》，1902年石印本。
 许地山编 《达衷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辑，文海出版社
 续修四库全书编辑委员会 《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 杨生茂、陆镜生 《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
 杨玉圣 《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叶再生 《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华文出版社，2002年
 叶钟进 《英吉利夷情记略》，载《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乙编
- 于宝轩 《皇朝蓄艾文编》，上海官书局，光绪二十九年刻本
 张廷玉等 《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六），神州国光社出版，1954
 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编 《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三），中华书局，1981年
- 钟叔河 ①《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2000年
 ②《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岳麓书社，2002年
-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齐鲁书社，1999年版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商务印书馆，1983年
 朱士嘉 《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57年
 卓南生 《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2年
 邹振环 ①《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②《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

(二) 重要参考论文

- 陈中如 《英美传教士破坏太平天国“拜上帝教”的阴谋活动》，《江海学刊》，1963年第3期
- 胡道静 《印刷术“反馈”与西方科学第二期东传的头一个据点：上海墨海书馆》，《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1988年第1期
- 李晓杰 《十九世纪早期在华传教士所描绘的美国：高理文及其〈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未刊
- 王家俭 《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大陆杂志》，第38卷第6期
- 吴泽、黄丽镛 《〈海国图志〉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
- 尹文涓 《裨治文笔下的美国形象——从〈大美联邦志略〉的前后两个版本说起》，载《国际汉学》第八辑，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 周振鹤 《〈遐迹贯珍〉中的一些过渡性的地理学术语》，《词库建设通讯》，第19期
- 周振鹤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创制汉语新词方面的作用》，香港中国语文学会《词库建设通讯》第15期

(三) 西文著作

- The Chinese Recorder*
- The Chinese Repository*
- American diplomatic and Public Pap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 Alexander, W.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to the Chinese*, Tai Pei, 1967
- Benson L. Grayson *The American Image of China*, New York, 1979
- D.MAC GilliVar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1807-1907*, Shanghai, 1907
- E.C. Bridgman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Macao, 1841
- Edward V. Gulick *Peter Pa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Eliza Bridgman *The Life and Labors of Elijah Coleman Bridgman*, New York, 1864
- Eliza, A. Morrison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obert Morrison*, London, 1838, 2vols
-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The Life and Labors of Samuel, W. W., LL.D, Missionary, Diplomatist, Sinologue*, New York and London, 1972
-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Taipei, 1975
- Latourette
- Michael C. Lazich *E.C. Bridgman (1801-1861), America's first missionary to China*, Lewiston, N.Y., 2000
- Murr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The Scarecrow Press, 1996
- Ride Lindsay, *Robert Morrison, The Scholar and the Ma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7,
- Roswell, S. Britton *The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1800-1912*, Shanghai, 1933
- S.W. Barnett and J.K. Fairbank edit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Y. Teng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Oxford Univ. Pr., 1971
- W.A.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New York, 1900
- William Milne,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alacca, 1820
- 恒慕义 (A. M. Hummel) *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1944

道光十八年戊戌鑄

美理哥合省
國志略

新嘉坡皮卷三集

1838 年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

美理哥合省國志畧序

從來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是則宇宙之士，肢骸膚體，莫不皆同也。故凡天下者，亦如一人，各國分據一方，亦如人身一竅。古之鄰邦通好，易地皆然，故有邂逅相逢異客，萍水忽作知交。予生於美理哥合省國，馬沙諸些省中，與中華有天淵之隔，熱河於地球之上，倣省依於球底，兩者相

裨治文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序》

馬邦裨治文 撰述

大日本箕作阮甫訓點

聯邦志略 全部

江左老臬館藏梓

箕作阮甫訓點的《聯邦志略》

道光二十四年鐫

亞墨理格合
眾國志略

上卷

香港藏板

1844 年的《亞墨理格合眾國志略》



辛酉夏續刻

大美聯邦志畧

滬邑墨海書館活字板

裨治文与《大美聯邦志畧》

刘路生点校本勘误表

刘路生点校本（页·行·正文）		哈佛特藏
7·8	故以其南北极东西极言之	而言之
8·4	所以贸易置货	所有
40·14	英吉利王欲□□税饷，故与土人勒争（原刊本挖去未补。刘路生注，根据魏源《海国图志》卷五十九，“加重”）	下文多次出现“加征如“于是奏王云：请不税饷……”，“不意英王加征粮饷，……”。年版中也是“加征”。
43·8	视四海如一家，不可自传	自专
44·18	论其□（挖去一字未补），则昂昂数尺	貌（根据 1844 年藏
49·9	次则枫树，高而且茂，其汁甘甜，或以煎糖，每年糖数千担。	可以
49·27	囊开国始，民不谙农务……	开国之始
50·12	黛，所销亦不少……	青黛
51·28	有一家之内，亦用人力为之，留自用……	留以自用
53·6	每年所卖，约有一千三百万之多。	一千三百万元
57·2	统领将一年收支各项、言行各事情和盘托出，以示并本年示行各事，亦示之于各省官。	未行
57·10	议事人例无二十岁者不可。	二十一岁以上
57·16	读于众知	与
60·21	即贫之后，常防愈贫之忧。	既
61·18	飞禽走兽、鳞介昆虫，	鳞鲎
65·26	又有地理、山水、等画工，最为民所尚。次则是雕工。	为世、则
66·4	今天下疾□（挖去一字未补）困穷而无告者……	疾苦（根据 1844 年藏版）
67·25	各首领之动静起居、饮食衣服，亦不外乎平民，但皆恭敬而已矣。	恭敬之
68·3	本即立，则其末可举而措之矣。	既

刘路生点校本把原书中关于“累斯安”省和“建大基”部两个章节的部分内容合并为一章（第 31 至 32 页），还漏掉介绍“典尼西”省的内容。今把刘路生点校本所缺内容补上，因为内容较多，所以不放在上面表格中。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本章介绍累斯安省）

……

东以美士细比省为交界，北界倚阿干骚，西界墨息哥、德和师国，南【以下为刘路生点校本所缺】界墨息哥海。内地延茂，与直隶省大同小异。东南地土皆平，西北峰小不峻。又省内河海，多且大焉。南有数海岛，省内地气暑热，间有烟瘴气，则土人染病者多。其东之美士细比河，水常涨溢，漫及省中，如美士细比省焉，即南方亦难免其渗淹也。

农圃之物，则以棉花、甘蔗为盛。二十六省内，未有过是者也。农夫独力，可种甘蔗十五亩，得糖五千斤。棉花价不高昂，因有棉子风柜也。棉子风柜可以去棉子而取棉花，且每柜能当数百人之工。贸易，则赖乎美士细比河，盖本省为此河之止径。过此以往，则洋洋乎无际焉。是故上流各省洋舶，皆云集于斯，又通省分为三十一府。居民二十一万五千五百七十五人，省城在东南方，离河口三百里，名新珂凉土焉。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本章介绍典尼西）

原典尼西之始，仅有驾罗连北省，与费治弥亚等人至。后生齿日繁，户口业集，嘉庆元年，则立为一省，以驾罗连北为东界，费治弥亚、建大基为北界，美士细比河为西界，美士细比、亚喇罢麻、蹉治亚三省为南界。通省内地延袤，有如浙江省焉。惟东南地长，图形四面皆斜，东有峻岭，过数百里而至省中，其山自北而南，横压其省，与押罢拉既俺山相连属，河流则遍省相通，故内地悉皆膏腴，地气不寒不暑，周岁晴霁调和，故地土甚腴，而五谷果实树木等产物、无一不滋长而繁盛。即金、铅、铁、盐、煤炭等皆有、惟煤为盛。农圃之物，除橙及无花果外，余皆茂盛。工作则有铁器、棉、夏布等，其余各物皆备，不多不寡。省内分为二巡道，六十二府。居民六十八万四千八百二十二。省城名拿实城，建于省中，官员则有首领、议处、众议等。教会二三百，书院则有三焉。

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本章介绍建大基部）

建大基省，原属费治弥亚。乾隆三十有三载，有单爷利蓬者徙家而居于此，建一舍，四围皆木，独自而居。三十有八年，复有至者，立一邑，名暇律士邑。四十有四年，与费治弥亚分茅列土，不作附庸。四十六年，则与邻并立而属合省焉。

计其内地延袤，则与浙江无异。惟此省独居二十六省之中，东连费治弥亚，东北则呵噜呵，西北则引底安、伊理奈等，西有美苏哩，南有典尼西，东界则【以上为刘路生点校本所缺】有押罢拉既俺山，故东南连峰入省，地土稍高，其中瀑布流注，或南或北，或贯北而西往也。……

后 记

本文完稿之际，追昔抚今，有些许伤感，但更多的是感恩之情。

感谢龚纓晏老师的指导和鼓励，龚老师对本文论题的确定、资料的收集、结构的编排，直至词句的润色，都花费不少心血；感谢包伟民老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从包老师多次的指导下，我感受到了浓浓的师生之情；感谢计翔翔老师对本文的精心修改，以及五年多来对我学业和生活的关心；感谢楼均信老师、黄~~成~~鉴老师、严建强老师、吕一民老师带我进入历史学的殿堂；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何老师，在她的帮助下，本人才能方便地获取一些重要资料；感谢浙大外哲所的戚印平老师、浙大日本所的江静老师，以及日本京都大学博士生钟翀对本文的日文资料的收集、翻译和确证等方面的帮助，特别是戚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让我深受启发；感谢傅年锋老师、孔陈炎师兄、何兆泉同学、吴玉雅同学给予的宝贵意见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许多我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对我和我家庭的帮助，感谢先夫曾经工作的上海铁路局的领导和同事，你们不但在先夫患病期间给予很大的帮助，还在先夫走后，把对先夫的关心延续到我和我儿子身上，让我觉得无以为报，只能在此说声“谢谢”！感谢杭州铁路分局的领导和同事，感谢金华的朋友和同事，你们提供的良好条件让我们一家在金华享受了最后的短暂快乐；感谢顾光明、陈炜、谢亚男、郭均、周春燕、沈锡飞、陈双满、郭非斐、张静霞、胡木木、邵旭东……众多好友，在你们的关心下，这灰暗的生活有了一些亮色。

我还要感谢我的公公、婆婆和赵翠玲阿姨，你们几年来帮我抚育小孩，真可谓“含辛茹苦”，对你们的感激之情，永存在心；感谢我的哥哥、嫂嫂、姐姐、姐夫，你们十几年来的支持，才让我的学业和生活得以继续，在先夫患病期间，你们不顾非典肆虐，还频繁地奔波于上海、金华、杭州等地，特别是姐夫还经常熬夜替我照顾先夫，这种亲情世上少有，而大哥的贴心话语经常让我知道，在宁波有一个温馨的避风港，永远欢迎我。

最后，还要感谢我可爱的儿子，你的存在让我感受到许多生活的乐趣！

对于先夫，我想说，嫁你，不悔。

生活给了我一些苦难，也给了我不少安慰。感谢生活！